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汪宏倫博士

題目

**論 1949 年以後國民黨政權的僑務政策：
從流亡政權、在地知識與國際脈絡談起**

An analysis of KMT's homeland policy after 1949: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asporic regime, local knowledge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

研究生：范雅梅

民國九十四年七月

摘要

長期以來，「僑務政策」不是被視為國民黨為延續與海外華人的革命情感、「反共復國」的重要號召力量；便是將之看作是國民黨為了保衛政權、合法化其為正統中國的主要手段。然而，這樣的看法如果不是重述了官方所認定的政策說辭；便是誇大了海外華僑在國際政治秩序中的影響力。本論文試圖跳脫長期以來的論述視域，分別從「流亡政權的內部消費」與「冷戰結構下的族群性管理」兩個分析角度，試圖回答：僑務政策，對於國民黨政權來說，具有何種象徵秩序上的功能，其又在什麼樣的結構脈絡下，得以完成？為了回答上述的問題，本文可分兩大部分，首先說明政策的研究背景，其後在針對特定時期的政策發展進行分析。

首先，第二章和第三章乃是以交代僑務政策的歷史背景，第二章的部分乃是將研究視域上溯至十九世紀中期以降，說明大量的移民現象與海外的政治活動如何促發了僑務政策的誕生，而其又留下了什麼樣的海外政治遺產。第三章則把焦點集中在國民黨在 1949 年前後，如何將僑務組織與相關政策移植到台灣之上，其經歷了什麼樣的調整，又擁有什麼樣的基本特性。

其次第二部分則分別討論上述的兩個分析角度。第四章乃從「流亡政權下的內部消費」出發，試圖論證：僑務政策對於遷台之後的國民黨政權來說，只是一個歷史所遺留下來的方便手段。由於長時期處在不確定的變動情境之下，流亡政權握著手中的權杖，大量地複製種種過去與未來式的象徵符碼，用來抓住混亂的真實，建立可預期和掌握的象徵秩序，因此形成了流亡情境下一種特殊的補償與防禦機制，並提供政權「內部消費」為主。到了第五章則進一步將僑務政策放在更大的國際脈絡下來檢視，以「冷戰結構下的族群性管理」的角度，試圖說明：即便國民黨與華僑具革命歷史的淵源，但「華僑為革命之母」並不能解釋戰後僑務政策何以能夠推行成功，而必須同時參照海外僑社的「在地知識」如何銜接了祖國的政治，並且應該對照當時的「冷戰結構」，如何在意識型態的圍堵策略與族群性的原生不滿之間，取得了國際間的巧妙平衡。

關鍵字：僑務政策、華僑、國民黨、流亡政權、在地知識、國際脈絡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個人困惑的浮現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問題意識	4
第三節 對既有研究取徑的反省	7
第四節 研究取徑與章節安排	11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12
第二章 歷史與政策源起：海外民族主義與其遺產	14
第一節 僑務政策的緣起和建制	14
第二節 傳統的發明：從拓境殖民、推動革命到反共復國	16
第三節 遠距民族主義的限度：以星馬華人為例	20
第四節 1949年以後的殖民獨立運動與國族化	25
第五節 本章結論	28
第三章 當革命尚未完成：僑務政策在台灣的移植	29
第一節 遷台之後僑務委員會的組織發展	29
第二節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海外黨務	34
第三節 外圍組織：中國僑政學會、民族與華僑研究所、華僑協會總會	37
第四節 僑務工作的基本形式－「讓僑胞高高興興的來，源源不斷的來」	39
第五節 本章結論	42
第四章 流亡中的祖國：僑務政策的意識型態	44
第一節 「萬惡共匪」vs.「愛國華僑」：流亡政權的摹擬性複製關係	46
第二節 讓它看得見：僑務統計、國家儀式與生產「問題」	50
第三節 民族「邊」織：從僑胞到僑生	55
第四節 回溯性的僵固指涉：「華僑」一詞的使用	61
第五節 本章結論	66
第五章 代理祖國？：國際政治中僑務政策開展的結構條件	67
第一節 東南亞華人問題：國家體系下的族群性（ethnicity）管理	68
第二節 選擇性的國族建構與單邊的同化主義：以馬來西亞例	75
第三節 從冷戰自由主義到自由的多元主義：以美國為例	80
第四節 代理祖國？：國家體系中的僑務政策與少數族群	86
第五節 本章結論	92
第六章 結論：	94
第一節 解答問題意識與主要論點	94
第二節 分析取徑與研究方法的反省	97
第三節 未來的研究展望	99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個人困惑的浮現

批判論證的起始點便是意識到個人真正是什麼，而這種『知道你自己』是歷史過程的產物，它有無限的軌跡存放在你身上，但卻沒有留下任何的目錄。因此，在最初就絕對需要去編纂這樣的一種目錄¹。

一如往年的每個九月，桃園的中正機場上開始陸續的出現了一批批來自各地的高中畢業學生，那一年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甫過兩個月，我循著前人的步伐踏入舊澀的白色機場，「記得，通關時就說是僑生回國讀書！」，學姐一邊指引我們排隊通關，一邊提高嗓子叮嚀著。從那一刻開始，我們開始瞭解，在這裡我們正確的身份是「僑生」，而非一般的留學生。接下來三天的迎新參訪，從中正紀念堂到士林夜市、從台大到僑大，「因為這句話」，學長指著豎立在僑大學園內的一座紀念碑說著，「華僑為革命之母，所以我們才可以來這裡唸書」，迎新活動便在這充滿疑問的思緒中匆匆結束。帶著入鄉隨俗的念頭，我們開始「再社會化」成為「僑生」，逐漸適應這裡的「華僑文化」所帶來的衝擊和認知的調整，帶著過去維護華文教育、救亡圖存的民族教育，那依舊清晰的記憶，眼前朦朧的國族召喚，看似陌生，卻又極為熟悉。

作為東南亞華人的第三代移民，祖父在我還未意識到何謂死亡以前，便已躺在病床上孱弱地看著前來探訪的兒孫們，默默不語，使得記憶中唯一能與真實的祖父所相聯繫的，便那張在酷熱的天氣裡依然冷冷的組合鐵床。然而對祖輩記憶的想像並不會因此而停冰封在那裡，小學畢業後在幾翻考慮之下進入了由華社「私人興學」所辦的獨立中學，為了確保華人子弟能夠接受母語教育，這些獨立中學多半採取低廉的學費政策，使得經費的短絀必須要仰賴每年發動的籌款運動來平衡赤字。從沿街募捐、擺攤義賣到洗車義演，身體的力行實踐漸漸地將個別的靈魂與「民族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打造出一批批的「華教」尖兵，集體而悲憤的傳頌著祖輩南來的記憶與真實。而我，從那時候開始，自傳的書寫不再以熟悉的棕油小鎮為始，而是浪漫地、近乎想像的記述著：「祖父祖籍廣東海豐縣，在乘風踏浪南來以前曾是引人渡江的擺渡人……。」

然而，九〇年以後的台灣，是一個不斷地拆解過去政治神話、建立新文化論述的年代。在我尚未能自然地以「僑生」自稱時，上課第一天第一個進行交談的

¹ Gramsci (1975)《獄中札記》，轉引自 Said (1999)《東方主義》。台北：立緒。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同學，在獲知我來自馬來西亞之後，便以一種近乎鄙夷地口氣說道：「僑生？加分進來的喔！」情急之中連忙否認的我，心中卻只能暗自自忖：「應該不是那樣的……。」自此，在我還未來得及回頭「編纂」過去所接受的民族教育的「目錄」時，面對當下不時的身份指控，讓我不得不去面對所謂的「僑務政策」²。

如果翻開台灣解嚴之後的歷史，「僑務政策」事實上長期就已備受爭議。1987 年行政院成立專案小組研擬新的「行政院組織法」，在座談會中有人建議將外交部和僑委會合併為「外務部」，統籌辦理對外之商務、領務和僑務³。此舉卻引起僑選立委們強烈抗議⁴，認為在此時國家「戡亂」之時，不僅廢除之議不合時宜⁵，甚至應擴大其功能⁶。1988 年僑務委員長曾廣順駁斥僑胞「白吃白喝」的指控，並強調僑胞雙十回國之機票、食宿都是自行負擔，同時就經濟價值而言，僑胞總支出估計約達新台幣十餘億元，乃是國內各業受惠⁷。1989 年 7 月，民間團體包括教權會、主婦聯盟等於全省發送傳單，公開質疑自「僑生回國就學」政策，要求一個真正公平的大學聯考，引發立法院議事堂上的激烈辯論，要求行政體系加強對僑生素質和名額之監督和控制⁸。1990 年，一百二十位「增額」立委為內閣閣員施政表現打分數，僑務委員長曾廣順得分「敬陪末座」，但從海外返國的僑胞卻頻頻為他叫屈喊冤，並強調如果到僑務會議中讓五百八十一名僑胞為閣員打分數，曾廣順的政績一定「躍居前茅」⁹。1991 年，民進黨立院黨團鎖定在審查年度預算時，擬將「僑務委員會」列為首要裁撤目標¹⁰，卻引起其他立委的反對抵制。隔年四月，七位在海外居留年數總和超過一百年的民進黨立委召開記者會，再次主張裁撤僑委會¹¹；但同年五月，總統李登輝在接見北美洲、歐洲的華文新聞傳播人士時，則強調「不可能」裁撤僑委會，甚至強調政府對華僑的照顧只有更為加強。1997 年，世界台灣人同鄉會發表聲明，公開要求廢除僑委會，以拔除「統獨」、「省籍」紛爭的根源；但隔年七月，來自全歐洲各地的代表在舉行第二十四屆年會時，則一致表示「堅決」反對僑委會裁併，並呼籲政府應更加

² 六年（2003）之後當我因論文的關係開始對台灣民族主義產生極大興趣時，在出席一場主題為「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與敘述」的國際性研討會時，一位聽眾在發言時便似乎以受害者的身分敘述當年「僑生」如何依附在國民黨的權勢之下而「作威作福」，而顯得極為氣憤不滿。雖然同樣也只是聽眾的我，並不需要回應這樣的質問，但這尷尬的經驗卻也促使了去反省這樣的一種政策。

³ 青年日報（1987）〈外交部與僑委會合併，僑選立委認此時不宜〉。九月十八日第 3 版。

⁴ 聯合報（1987）〈蒙藏與僑務兩委會，立委反對歸併裁撤〉。九月二十四日第 2 版

⁵ 台灣日報（1987）〈僑務委員會併不得〉。九月十八日。

⁶ 中國時報（1987）〈僑務委員會不應撤銷並應擴大功能〉。十月十八日。

⁷ 台灣新生報（1988）〈誰說僑胞白吃白喝？〉十一月八日。

⁸ 李明儀（1991）《僑生回國就學政策研究》。國立中山大學。

⁹ 中國時報（1990）〈他的「票源」在海外？僑胞代表為他「喊冤」！〉。四月二十八日。

¹⁰ 聯合晚報（1991）〈民進黨擬迫僑蒙兩會裁撤〉。四月五日。

¹¹ 中時晚報（1993）〈民進黨決裁撤僑委會〉。四月二十日。

重視歐洲的僑務發展。

到了 1999 年 11 月 28 日，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發表「跨世紀外交政策白皮書」，進一步提出了「廢除僑委會，成立專責機構來整合全球台灣人社團和組織力量，效法猶太人動員遊說之模式，共同營造台灣的外交空間」¹²，將民進黨長期所主張的「廢除僑委會」的立場，具體的發表在選舉政策白皮書上。戲劇化的卻是當 2000 年 3 月 18 日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在激烈的選戰之中贏得了最後的勝利、完成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之後，卻開始委任原監察委員張富美為僑務委員長，對於原有「廢除僑委會」的主張，則表示那只是政黨白皮書上的一個政策說帖，僅能將之當作一個政黨的政策宣示¹³，並在 5 月 20 日總統就職的僑胞茶會中，公開讚揚「華僑不僅是革命之母，也是臺灣民主改革之父」。同年 6 月 5 日，張富美在接受「宏觀新視界特別報導—張富美談僑務」的節目中更強調：「我不會是僑委會的終結者」。雖然在 2002 年政府進行大規模的組織改造時，多位執政黨和台聯立委仍然主張廢除僑委會¹⁴，但過去長期主張撤除僑委會的行政院秘書長李應元卻發言表示：民進黨的長期主張雖然是廢除僑委會，但孫中山先生說「華僑為革命之母」，他個人在擔任駐美副代表期間，也更瞭解華僑的歷史背景、重要力量，廢除僑委會雖然可以少掉一個部會，但確有很多爭議與困擾，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因此他主張維持現制¹⁵。不僅如此，同年元月，僑委會更進一步積極輔導成立「全僑民主和平聯盟」，來自全球六大洲 69 個國家成立了 69 個「支盟」，再以各洲為界成立六大「分盟」，強調其為一個「不分畛域、黨派，團結一致，組織一個關心台灣福祉的全球性組織」¹⁶。10 月，民進黨立委蔡同榮更著手連署，準備提案將僑委原有的一百七十一人的名額大幅度增加為五百名，以改善僑界人士積極爭取擔任僑委的「擠破頭」現象¹⁷。

究竟什麼是僑務政策？為什麼會鬧得如此沸沸揚揚？其又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構作下產生的？又為何會延續到現在？將來又會往什麼方向前進？筆者希望藉由對僑務政策的歷史、意識型態和其所處之結構條件，以進一步解開「僑生」的身世之謎。

¹² 廖書賢（2003）〈陳水扁政府的僑務政策（2000～2002）〉，見張啓雄編，《近二十年來的海外華人》，頁 63-80；具體內容見 <http://www.abianfamily.com/whitepaper/externalaffairs.htm>。

¹³ 宏觀電子報（2000）〈張富美將加強推動國民外交，期使僑委會發揮更大功能〉。六月十五日。

¹⁴ 例如民進黨立委林濁水表示：「僑委會沒有裁撤，仍維持部會級單位，就是奇怪的事」。見中央日報（2002）〈民進黨立委：整併四不像〉。三月三十一日。

¹⁵ 中國時報（2002）〈僑委會可望保留，勞工業務獨立〉。三月二十五日第 4 版。

¹⁶ 見相關網站 <http://www.gadp.org.tw/>

¹⁷ 聯合報（2002）〈蔡同榮提案：僑委應增為五百人〉。十月二日第 4 版。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問題意識

在台灣，一般人對「僑務政策」的理解往往僅止於片面的認知，對華僑的想像的也只停留在「愛國華僑」、「華僑為革命之母」之刻板印象之上。在實際的生活當中，和華僑進行直接的接觸也很少（顏國裕 1991），即使少數有所接觸者，也主要是因為在求學過程中班上有所謂的「僑生同學」始有初步的認識，只是這種認識不免夾帶對「特權」份子質疑態度（李哲禧 1985）。事實上，僑務作為作為中華民國遷台以來的國家政策之一，對於許多來自「僑居地」的人來說，也同樣是一知半解¹⁸，許多時候只能懵懂的接受承襲已久的既定腳本¹⁹，直到面對身分的質疑時，才開始反省政策背後的政治因素²⁰。

究竟什麼是僑務政策呢？在目前文獻討論中，絕大多數仍停留在資料排比和事實陳述的階段²¹，或是將之細分、套用各種政策模型對其進行評估和建議²²，而少有進一步分析其政治意涵和歷史意義。但如果進一步從研究者寫作視角來看的話，則大多數的文獻資料都是以「國共內戰」的延續作為主要的參考架構，認為戰後國共兩黨分據兩岸，除了五零年代零星的衝突之外，兩黨之間仍然針鋒相對，雙方都亟欲打倒對方，以取得最終代表中國的發言權。在此情況下，五、六零年代的僑務政策乃是國民黨打擊共產黨之手段，藉由動員各地僑胞之反共聲浪、經濟投資與僑匯的制裁，以打壓中共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僑胞的向心力更被視為是辨識何者為「正統中國」的重要指標，到了七零年代隨著雙方勢力的消長，國民黨為避免陷入孤立狀態，以血緣民族為後盾的僑務政策，則更亦發顯得重要。因此，從「反攻」、「反共」到「抗共」的動員歷程，林若雱（2000）便認為「海外僑務政策五十年來的發展史，也就是一部海峽兩岸相互爭取海外華僑、

¹⁸ 這裡筆者並非意味「所有」來自各地的僑生都是在「無知」的情況下來留學的。

¹⁹ 例如自稱為「僑生」，把自己的祖國稱為「僑居地」。見〈大馬僑生『台灣化』的心路歷程〉，中時晚報時代副刊 1990 年 3 月 8 日。

²⁰ 見大馬青年社（1989）《大馬青年》第八期。台北：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

²¹ 嚴格來說，是停留在政策運作的描述和再現。例如毛松年（1981）現階段僑務政策概述；王思嫻（2002）1971 年以來的僑務政策；李明儀（1991）僑生回國就學政策之研究；李盈慧（1997）1949 年以來中華民國的華僑教育政策；林若雱（2000）從優勢到競爭：臺灣的僑務政策（一九四九-二〇〇〇）；柯玉枝（2000）中華民國對拉丁美洲的僑務政策；郁漢良（2001）華僑教育發展史；陳月萍（2003）美援僑生教育與反共活動（1950~1965）；廖書賢（2003）陳水扁政府的僑務政策（2000 ~2002）；趙林（1998）近十五（一九八四—一九九八）年來中華民國的華僑教育政策；蔡先容（1992）中山先生僑務思想與當今僑務政策之研究。

²² 例如朱宏源（2000）中華民國僑務政策重建芻議；杜巧霞（1993）海外華人在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與前瞻；康高挺（2001）四十年來僑匯對國內經濟發展之影響；陳文峰（1986）我國當前僑務政策與措施之研究；陳柏壽（1984）吸引華僑回國投資之研究；陳樹強（1991）民國以來僑務政策之研究-三民主義僑務政策之實踐與評估；管訓美（1982）現階段我國僑務政策之研究；劉興漢（1993）華僑教育與海外華人經濟發展之探討；鄭啓城（1977）鼓勵華僑回國投資政策之研究；顏國裕（1991）我國僑務政策之研究—民國六十年以後之發展分析。

華人的鬥爭史」；中國學者任貴祥等（1999）也以「第二條戰線」來說明海外華僑在國共內戰所扮演的腳色；Ng（1991）將僑務政策視為是偏安國民政府的一種危機管理，在強烈的缺乏安全感的情況下，尋求生存的權宜之計。Hughes（1997：105）則指出，海外華僑是國民黨政權在其「國際孤立」的處境下，必須要拉攏的群體。

然而，儘管「反共復國」的海外動員確實是官方所認定的主要目標，但如果把五十年來的僑務政策僅視為「國共外戰」的一環，則似乎也簡化了政策背後複雜的政治意義。因為如果對照中共建國以來對於海外華人所抱持的態度，自1955年萬隆會議之後，中共已務實地鼓勵海外華人歸化當地，以此作為取得各新興國家外交信任的條件（Fitzgerald 1972；Suryadinata 1985；莊國土 1989）。同時，中共與海外華人的淵源遠比國民黨來得薄弱，其內戰之勝利亦與非仰賴海外華人（麥留芳 1985；William 1966），一直到八零年代以前，中共也無能力在海外爭取華僑的支持，更無意藉此來打壓國民黨政權的生存空間（Chang 1981）。另一方面，戰後的二十年間，東南亞各地先後獨立，華人生存問題開始受到威脅，使得華人社會必須開始為自己爭取政治空間，同時面對兩岸的對峙，華人與兩地政府的聯繫，多半也取決於當地政權的國家政策，而分別和兩岸政府建立邦交（陳鴻瑜 1991）。換句話說在冷戰結構下，不僅海峽兩岸直接作戰的衝突被「冷卻」下來，在海外各地僑社除了零星般且地下化的衝突之外，兩黨之海外黨務亦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²³，而由不得兩岸政府有任何置喙的餘地。因此，如果只是將僑務政策從「工具化」的角度視之，只不過是「重述」官方所認定的顯性目標罷了。

另一方面，隨著台灣政治上的解嚴與台灣意識的檯面化，越來越多的研究視域開始從本土的角度出發，打破長期以來為國民黨所壟斷的歷史觀點，試圖去理解戰後以來國民黨的統治對台灣社會的各種政治效應。在此觀點之下，僑務政策自然被視為是國民黨「大中國意識」下的典型產物。因為從本土觀點來看，戰後國民黨長期維持嚴格的一黨專政、以外省人為最高的統治、以中國意識為主的政治格局，並全面的抑制本土文化，僅開放地方選舉給予有限的自治，並且透過黨政軍警特將政治異議全面消音。因此從被統治者的角度來說，國民黨長期保持外來性、其不願意在本土生根，又以警察國家的方式全面控制本土社會。因此，國民黨無異於是一種「無母國的外來殖民政權」²⁴，舉凡政治制度、教育內容、文化政策、法律條文等等，無一不是直接從其母國直接搬用並強加在「殖民」本土之上。因此在這裡，僑務政策不過就是透過將海外華人都視為僑民、僑胞，都是

²³ 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則由於反共的因素，則僅打壓共產勢力。

²⁴ 黃昭堂語，轉引自楊聰榮（1992）。

中國人，便能夠「教育」台灣人，不管是四百年前移民到台灣的大陸移民，或是上個世紀初大量移植到南洋各地的中國移民，自然也同樣都是中國人（Tseng 2002）；陳杰認為僑務是國民黨努力將台灣建立成爲理想「大中國」的必要建制（Chen 2002）。相較於前者重述了僑務政策的「顯性」功能，後者的分析則是試圖從「殖民/後殖民」的參考架構，分析政策背後所具有的「隱性」功能：對外，將台灣建立成爲大中國的代表；對內，將台灣人教育成爲「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但事實上從歷史來看，國民黨政權不管有沒有實施僑務政策，其仍然會被視爲是中國人所掌控的政權，而其能夠偏安於台灣，是在美國圍堵政策下，由美國所扶持並利用作爲聯合國裡「代表中國」的政權²⁵。儘管國民黨難以稱得上是美國一手操弄的傀儡政權，但在七零年代以前，國民黨政權在「自由世界」的陣營中，是「中國」的代表，更是「反共」的最前線，此種地位是公開且被默認的。在此情況下，與其說僑務政策是一種讓國民黨政權「看起來」代表中國的政治魔術，倒不如說，是因為國民黨「暫時」被認定為是自由世界中「代表中國」的唯一政權，因此才容許僑務政策的存在。

其次，國民黨在台灣所進行的「中國化」政策，早在 1945 日本放棄台灣主權、國民政府代表戰勝國接管台灣之時，便試圖以「剛性的推行」來扭轉日本皇民化的影響，重新將台灣人民予以「祖國化」。爾後流亡政權退守台灣，除了奉「三民主義」作爲國家意識型態的正統論述之外，其對中國符碼進行積極的生產和散佈、予以國家制度化的扶持，往往是對應於另一個所謂「破壞中國文化」的巨大他者—中共，而刻意地將文化以聲張旗鼓的方式膜拜一番，建立一套充滿的國民黨體味、但操弄鑿痕卻斑斑可考的「中國文化」，透過國家教育體制的大力推行，達到全面的「中國化」。但無論如何，僑務政策在這裡所扮演的角色始終是邊緣的，即便沒有僑務政策，國民黨對於台灣的「祖國化/中國化」政策，仍然極具強制力。因此，僑務政策在國民黨一系列的中國化過程中，只是一種陪襯物，僅對其作爲正統中國的形象具有一定的補光作用。

如果回到老問題：爲什麼遷台之後的國民黨政權延續和實施僑務政策？或許也有人會認爲，中國作爲一個擁有長期移民史的國家，正所謂「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國人」，中國對於領土之外的中國人予以適當的保護措施、制訂僑務政策，是很自然的事。加上自晚清到民國以來，儘管海外華人身在異鄉，但對於祖國的政治發展、經濟建設、現代技術的引進等等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且和國民政府維持了長期的政治聯繫。因此儘管國民黨退守到台灣，建立在過去的革命情誼之上，國民黨當然會延續僑務政策，是很自然的事。

²⁵ 有關美國對國府態度的決策過程，可參考趙綺娜（1991，2001）、張淑雅（1998）。

但如果檢閱中外歷史，儘管早在十八世紀中葉已有大量沿海居民出洋，但早期清廷對於他們不僅不聞不問，甚至下令將海外歸來者予以斬首，也將在海外遭遇大規模屠殺事件之僑民視為「天朝棄民」而無意理會。在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具有長期的移民歷史的還包括墨西哥、印度、土耳其、愛爾蘭等，這些國家有的直到八零年代末期才開始制訂相關政策，有的曾積極的運作；有的已走入歷史²⁶。因此，儘管大量的移民是執行僑務政策的必要條件，但卻不是充分條件。

其次，儘管中國近代的僑務政策與海外革命運動有著直接密切的關係，但這並不意味歷史的結構條件不會改變。事實上從戰後以來，全球性的民族國家體系逐漸形成。在新的主權意識思維之下，僑務政策對於各國來說，已挑戰了國家的主權，也會影響國族打造的各項工程。因此，除了將一些參與祖國政治的意見領袖驅逐出境之外，大多數國家都要求其境內少數族裔在居住地和原居地之間，進行二擇一的國籍選擇。在此趨勢之下，僑務政策作為針對「海外公民」為主的國家政策，勢必也會受到影響。因此王賡武便認為，從辛亥革命到二次大戰以前可謂為「華僑時代」；但是到了二次戰後，隨著移民在當地社會地位的全面提升，移民本身也開始不再自視為「僑民」，在此情況之下，華人移民也就「不再是華僑或華人」，最終將會逐漸變成各國的華裔民族 (ethnic chinese)，因此意味著「華僑時代」的結束 (Wang 1991: 246、2001: 157)。

但如果按此邏輯發展下去，則矛盾的狀況開始浮現：如果真的如王賡武所認為的，二次戰後各地政治局勢的發展，意味著「華僑時代」的結束，則為什麼國民黨仍得以實施「僑務政策」？每年回國的僑生從哪裡來？回國參訪、回國投資的僑胞為何源源不斷？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僑務政策得以開展並延續至今？在過去有關僑務政策的討論，除了對此複雜的現象進行許多資料的排比和描述之外，對於政策的解釋也往往停留在國家所認定的顯性目標、或是嘗試去揭露其背後可能的隱性功能、或將之視為是移民現象之下的自然產物，但這些解釋幾乎都程度不一的患上短視的毛病，而未能將僑務政策放在海外的在地歷史知識和國際脈絡中進行解釋。另一方面，從海外華人的觀點視之，則片面地認為「華僑時代」已結束，僑務政策已不再可能，忽視了國民黨政府在戰後所扮演的積極角色。因此，本論文嘗試克服上述的侷限，試著回答下列的問題：如果就王賡武所認為的，二次戰後代表著「華僑時代」的結束，則為何戰後國民黨政府仍實施僑務政策？其如何可能？

²⁶ 這方面的討論近年來由於 transnationalism 概念的盛行而開始注意到過去與現在的各國經驗，相關討論在這裡略舉一二，如 Foner (1997)；Smith P. (2003)；Smith R. (2000;2003)；Østergaard-Nielsen (2003)。

第三節 對既有研究取徑的反省

爲了解答上述的困惑，本文試圖重新建立新的研究取徑，以取代過去以「政策制度」爲中心研究旨點。此種新的研究取徑，乃是建立在下列三項對既有文獻的批評之上。

3.1 在歷史認定上，僅止強調「祖國」為中心的歷史，忽略「僑社」歷史發展。

在既有僑務政策的研究文獻裡，大多數討論的焦點乃集中在「祖國內部」的政治與制度形成的範圍內，鮮少以比較的觀點，從僑居地所處的政治結構出發，以理清僑務政策所處特殊的結構條件與政治思維。就以李盈慧（1995）的重要著作《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來說，「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被「理所當然」的視爲是一體之兩面，即使全書內容主要集中在處理各祖國政府實施的各類「華僑政策」，以再現其形成和變化、華僑參與過程等等。但在這裡，僑居地政府和當地政治氣氛是完全缺席的，海外華人更被視爲是「中國史」的一部份，因此也就難以進一步評估「海外民族主義」的特質和其對僑務政策的影響。當然，要求同一本研究著作必須同時處理不同的角度是過於苛求的，但此種研究取徑卻具體的表現了現有文獻的研究旨點。即便已有少數研究作品開始注意到海外地區的政治變化趨勢，但多半仍以背景畫布的方式處理，未能夠跳脫出國家的政策思維，並進一步追問：在什麼樣的 political 結構下，僑務政策得以奏效？其對於海外僑社的影響又是什麼？

另一方面，如果嘗試跳脫「祖國效應」，把華人歷史拉回到當地政治脈絡下思考，則多半仰賴各僑居地的「土生學者」的努力居多。例如享譽國際學界的王賡武、廖建裕，長期以來便致力於倡導以「民族國家」爲主的歷史研究，將海外華人史放回到個別的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軌跡之上，探討華人在當地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尤其在二次戰後隨著個別的民族國家獨立，研究視域的轉換乃是國際政治趨勢使然。因此在此視域下，海外華人成爲歷史分析的主體，同時也能更全面的觀照群體之間的多樣性與利益衝突的面向，對於評估「祖國因素」對當地社會的影響亦有所幫助。

然而，如果僅一味地認爲戰後各國主權已獨立，跨國性的族裔動員已成爲過去，卻容易將問題遺留在歷史廢墟當中，逐漸被埋沒遺忘。就如 Wimmer & Schiller 所指出的，二次戰後各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在國家官僚影響之下，都程度不一的犯上「方法論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問題。以「貨櫃模型」

（container model）進行社會科學的思考，往往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歷史向度，形成研究上的旨點（2002：319）。同樣的，McKeown（2001：343）也認爲，僅

強調以當地脈絡爲主的歷史研究，反而同樣落入自身所批評的「祖國中心」的限制中，認爲移民社群必然被限定在「民族國家」的結構中，而忽略了其與祖國的政治聯繫。在此情況下，戰後國民黨的「僑務政策」研究，同樣是掉落在民族國家之間，被遺忘的歷史片段。儘管其曾經被視爲是國家重要的政策而被仔細的評估，但大體而言，多數研究僅能稱得上是政策宣傳品，對於海外僑社的瞭解也嚴重不足（或忽略），因而多數研究往往顯得千篇一律，難以突破。在此情況下，本論文的研究取徑，乃是同時對照祖國和海外僑社的政治結構處境，理解海外華人在民族國家體系中所處的位置和互動關係。

3.2 在政權界定上，僅強調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忽略其亦是一「流亡政權」。

1949年，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政權，帶著一百多萬的技術官僚、軍人家眷、民意代表、故宮文物、檔案卷宗等等，撤守至祖國海隅的台灣，伺機而動，聲稱要反攻大陸，剿滅共匪。結果這一撤，便是四十年，一直到1987年解嚴之後，政治格局才開始轉變。

在學理上，我們究竟該如何對國民黨政權進行定位？是流亡政府？還是偏安政府？是移民政權？還是遷佔者政權？抑或無祖國的殖民政權？面對這些不同的概念界定，使用者往往會因爲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歷史經驗的差異，而有不同的選擇偏好。但無論如何，在目前的學理討論中，將國民黨政權視爲一種介於極權和民主之間的「權威體制」，已成爲最大的公約數。但如果更進一步比較分析的話，則如林佳龍（1999）將國民黨界定爲：相對於一般「威權統治」政體來得更能穿透社會進行控制，故接近列寧式的黨組織；但相較於「極權統治」政體，國民黨卻又缺乏系統性地思想指導、加上官方意識形態上對民主的擁抱，使得其仍然在基層維持了「多元主義」的政治市場。因此，林佳龍把國民黨界定爲「一個由準列寧黨控制並利用地方選舉統治的強勢威權政體」，並且透過雨傘的譬喻，說明政治強人如何透過雨傘末端輻射出去的枝幹，穿透國家社會，撐起威權統治的傘面。

在比較的觀點下，林佳龍細緻地勾勒出國民黨對台灣社會的統治手法，以及其所依附的統治論述。但無論如何，此種概念界定仍是立基在西方民主傳統中的政治概念進行對照比較，透過和古今中外不同政權類型的個案比較，比較出國民黨的統治特性。但這樣的分析卻容易忽略政權所承載的歷史記憶、文化軌跡與政治特性。以國民黨政權來說，長時期的革命運動、追求現代國家主權獨立的集體目標，造就了其特殊的歷史性格。其後整個政權上下多達一百萬的軍民集體遷移，依附在國家機器的獨佔暴力之上，使其能順利地「遷佔」台灣，並形成足以

自給自足的次文化社會，在國家所強力支撐的歷史論述下，形成特殊的族群風貌。無法否認的是，其所經歷的也同時是一種特殊的「流亡經驗」：在全球冷戰思維下所撐起的反共論述，暗示了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的神聖使命，更指向了非志願性政治難民的歷史情境，形成了反共=反攻大陸=政治難民=流亡的敘事順序，也造就了一種「無法依附既存指涉體系，且難以對應於流亡地的象徵秩序，因而形塑了特殊的流亡敘事。」（趙彥寧 2002：48）。

本文在研究取徑上採取上述的流亡觀點，認為儘管「僑務政策」在官方論述上是維護政權國際地位的重要手段，但同時也是國民政府建立其「象徵秩序」的重要一環。透過大量的華僑論述與政治意識型態，國民黨長期維持了內戰與戒嚴的政治格局，鞏固其統治上的正當性，卻同時抹除了流亡的政治情境，而形成了特殊的流亡情境。

3.3 在國際脈絡下，僅強調「內戰結構」，忽略了「冷戰結構」的影響。

二次戰後台灣在政治發展上，大體而言是結合了「冷戰」、「內戰」與「內部殖民」的三重結構所共同譜出一齣精緻和複雜合奏曲。冷戰結構的加持之下，內戰格局被延長鞏固；在內戰的思維中，內部殖民得以根深柢固；同樣的，當冷戰結構開始鬆動，內戰格局轉化為政權的保衛戰；政權為尋求內部社會的支持，內部殖民開始鬆動，反抗論述試圖擺脫內戰格局，持續擴大內部社會支持，而帶動一波波的本土化和民主化。因此，若要分析戰後台灣的政治發展變化，不管是放在前景或是背景，這三種不同的政治都是必須要考慮的結構層面。

但是在既有的學術討論來說，在政治解嚴以前，面對國家暴戾的監控機制下，唯有「內戰格局」符合國家所圈選的正統論述，使得整個論述場域上至國家法律體系、下至民間的概念稱謂，無不獨尊「內戰話語」為支配性的參考體系²⁷。一直到解嚴以後，伴隨政治上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過去被系統性遮蔽的本土歷史和社會逐漸浮出檯面，新的理解架構帶動了新的論述與政治能量，並回頭逼問過去的內戰視域，究竟讓我們付出了多少代價？其是否只是延續了過去日本的殖民結構，成為另類的「內部殖民」？少數的外來政權究竟如何統治？如何分配利益？如何鞏固政權？這一連串的逼問宣佈了「後殖民」結構的來臨，透過對本土歷史的重新挖掘與論述，挑戰過去長期獨佔的論述視域。

但另一方面，過去政權所依附的「冷戰結構」，卻未能夠得到相同的挖掘和處理，儘管大多數分析研究都不會忽略美國在韓戰以後對國民黨政權存續的關鍵角色。例如王振寰（1989）便將七零年代以前，國民黨為何能夠順利統治對自身

²⁷ 例如中國被稱為「大陸」、台灣被稱為「自由地區」、分析汪精衛政府必須要加上「汪（偽）政府」、談宋慶齡必要加上「宋（逆）慶齡」等等。

含有敵意的台灣社會，歸因於美國在軍事、經濟與國際地位上的強烈支持。汪宏倫(2001)也不斷地提醒我們，外部因素在如何關鍵性的影響了台灣的政治發展。但就如趙彥寧(1999)所指出的，真正將「冷戰結構」拉至前景，評估其對台灣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到目前為止較具深度者多半集中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以探討美援對台灣經濟的關鍵影響和國民黨對此結構的依賴性格(cf. 吳聰敏 1988；文馨瑩 1990；陳玉璽 1992；劉進慶 1995)。但無論如何，近年來情況已有所改變，例如王梅香(2004)便試圖理解「美援文化」對於戰後國民黨的「文化中國」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陳光興(2001)在討論「大和解」的「可能/不可能」問題時，也不斷地提醒我們：「冷戰結構」在東亞還沒完全結束，去冷戰絕非意味簡單地脫離冷戰意識，而是要進一步開啓過去無法述說的論述空間，認知冷戰對人們的龐大效應，以捕捉歷史所構築的多重文化政治效應。

毫無例外的，「僑務政策」也座落在上述三重的政治結構當中，在不同的結構層次上佔據不同的角色。以「內部殖民」來說，爲了「緩和」政治自由化對既有利益結構的衝擊力道，國民黨便以「遴選」方式，徵召海外地區的忠貞僑胞回國「代表」民意，事實上則是要弱化本土增額立委的力量。另外在「內戰」格局中，僑胞由於被視爲是三大「反共力量」之一，因此也正當化僑務政策和特權結構。最後，在冷戰思維中，挑戰民族國家主權界線的僑務政策，在美國主導之下，竟化身爲領導全球華人對抗共產主義的自由旗幟，並且奠定了日後僑生政策的發展條件。

第四節 研究取徑與章節安排

建立在上述對既有文獻的反省之上，本論文的章節安排，乃是沿著上述三個面向的研究取徑(一)僑居地的在地知識，(二)流亡政權的象徵秩序，(三)冷戰結構的影響來進行本論文的鋪陳與論述。因此本論文可分爲下列幾個部分：

第一章乃是導論部分。首先從個人困惑出發，透過回顧既有的文獻，釐清問題的觀看視域，找出可能遺漏的研究盲點，並進一步說明現有觀點的缺點和限制。其次，通過反省三種與僑務政策相關的研究取徑，以建構出本論文的方法與視角，以補充過去研究的不足。最後則是說明章節安排、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

第二章則以歷史敘事爲主。首先先說明何謂僑務政策，以界定研究主體的範圍。其次，回顧清末以來的海外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說明流亡海外的政治異議份子，如何透過歷史境遇的重新書寫，框構了海外僑民政治行動的可能性。其三，藉由對新馬²⁸一帶的民族主義歷史發展的回顧，重新評估「海外民族主義」與「僑

²⁸ 指新加坡和(西)馬來西亞半島地區。

務政策」對於當地華人社會的影響，並進一步說明華人社會的複雜性。最後，以東南亞和美國為主要的參考點，說明二次戰後國際政治的變化趨勢，及其如何僑務政策的可能性。

第三章的部分主要說明僑務政策在台灣延續/移植的過程。由於僑務政策所牽涉的層面極為複雜，因此本章主要從「組織」面下手，分別討論「僑務委員會」、「國民黨海外工作委員會」和其他外圍組織的移植過程、其內容和扮演之角色為主。最後，在從政策內容的不同面向，包括回國參訪、回國投資、回國升學、回國參政等面向的說明，以進一步掌握僑務政策的基本特性。

第四章以討論僑務政策的意識型態為主。在這裡，國民黨被界定為一「流亡政權」，同時「意識型態」也被定義作是人們在慌亂之中「抓住」真實的一種努力。因此本章將「僑務政策」視為是國民黨在流亡之中，建立其象徵秩序的方便手段，以提供政權「內部消費」為主。在此情況下，藉由對「萬惡共匪」和「愛國華僑」的比較分析，本文試圖說明象徵秩序的建立過程。此外，分析官僚機制如何「再現」了華僑人數、華人愛國與華僑問題，以折射出象徵秩序的操作方式，並且進一步以「僑生」主體經驗的說明，瞭解「僑生教育」中的政治意識型態如何「製造」了新僑胞。最後更進一步藉由符號學對「能指」與「所指」的分析，一方面與華僑學中的「稱謂問題」進行對話，另一方面也試圖說明「意識型態」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結構位置。

最後第五章主要將「僑務政策」放在「國際政治」的發展脈絡下進行檢視。首先，在東南亞的區域格局下，本文回顧了中國（共）的華人和外交政策之間，不同階段的互動關係，並進一步比較中共與台灣在僑務政策上的異同點。其次，將鏡頭轉進個別民族國家的政治結構，本文分別以馬來西亞和美國為例，說明不同的建國意識、少數民族政策和國際位置如何影響了其對台灣「僑務政策」的反應和策略。最後再藉由 Brubaker (1996) 所建立的三種相互關連的民族主義模型，以進一步釐清遷台之後的國民黨政府在國家體系之間的相對位置，如何使其成為了「代理的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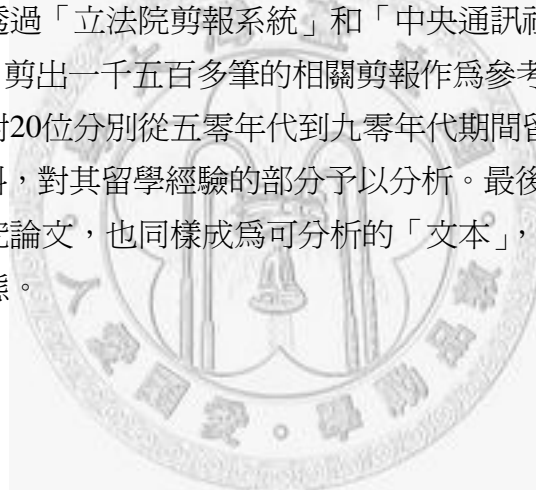
到了第六章則是結論部分，本章將分別說明本論文對問題意識的解答、其在理論上的反省，並進一步說明資料與研究方法上的限制，以說明未來的研究展望。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本論文主要的問題意識，乃是沿著1949年國民黨遷台以後「僑務論述」出發，試圖理解在何種歷史結構、流亡意識與國際政治的條件之下，僑務政策得以長期的延續下去。因此，在資料收集上，可依序分為兩個部分。

(一) 有關清末以來「海外華人民族主義」與「僑務政策」的歷史研究，本文主要是參考各類二手的歷史研究材料為主。其中關於戰前的僑務政策主要參考李盈慧翔實的歷史分析；在海外華人社會史的部分，則以顏清煌、王賡武對新馬社會的解讀、以及麥禮謙、David Wu（吳燕和）、Wang Ling-chi（王靈智）等人對美國僑社的分析作為參考。另外在國際政治方面，本文主要以既有的移民研究、政治社會學和國際關係等方面的二手研究為主要參考材料。

(二) 針對國民黨的「流亡意識」分析部分，本文在研究取徑上深受趙彥寧的啟發，資料收集的來源亦更為多樣。首先，本文以「僑」作為關鍵字，利用「中央研究院」（主要在近史所）以及「台大圖書館」的館藏目錄進行地毯式的搜尋工作，得出的各項「文本」包括政府的政策研究報告、政治宣傳資料和刊物、官方統計、紀念特刊、人物言論輯要、政黨內部流傳的報告書、半官方的研究論文和人口地圖等等，並透過對上述資料的檢視，以理解僑務論述的形成與操作方式。其次，本文也透過「立法院剪報系統」和「中央通訊社剪報系統」，同樣以「僑」作為關鍵字，剪出一千五百多筆的相關剪報作為參考文本。其三，本文也利用2000年暑假針對20位分別從五零年代到九零年代期間留學台灣的馬來西亞「僑生」的訪談資料，對其留學經驗的部分予以分析。最後，許多以評估「僑務政策」為出發的研究論文，也同樣成為可分析的「文本」，以理解其背後所代表的國家政治意識型態。



第二章 歷史與政策源起：海外民族主義與其遺產

僑務政策的歷史緣起，與中國近百年來逐漸從「王朝帝國」轉變為西方意義下「民族國家」的發展歷程息息相關。因此在分析戰後僑務政策的發展之前，我們仍必須回到十九世紀中葉到廿世紀初期的歷史，以瞭解僑務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運動的關係，方能了解在如何的歷史趨力下，僑務政策在戰後仍然能夠持續下去。

首先，本文將說明何謂僑務政策？透過分析其制度、內容和發生的政治脈絡，以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範圍和性質。其次，從兩個角度對中國「海外民族主義」進行解析：第一，針對以中文作為書寫語言的歷史敘述進行分析，說明流亡海外的政治異議份子和民族主義者，如何透過對僑民歷史境遇的書寫，或「傳統的發明」，予以遠離祖國動亂的僑民一種新的歷史和意義感，鼓勵其投入祖國的肇建運動。第二，分析「海外民族主義」在中國近代建國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基本特性，再討論其對海外華人社會的影響。最後，1949年之隨著全球政治勢力的改變，美國取代西方各國在亞洲的政治勢力，各殖民地也在美國「民族自決」的口號下紛紛獨立。據此，本節將分析其如何影響海外民族主義和其對僑務政策的影響，並以兩個重要的僑區——美國和東南亞各國的戰後發展為主要分析對象。

第一節 僑務政策的起源背景及其建制

中國僑務政策濫觴於近代中國人大量的移民海外。然而，大量移民現象的產生，則必須在西方殖民歷史的擴張、中國面對西方列強之長期積弱不振，以及全球市場和經濟網絡向東亞擴張等背景下來進行理解（McKeown 1999）。

1842年隨著南京條約簽訂了五口通商和香港之割讓，開始了現代中國移民的大量出洋。當時清廷積弱不振、國內經濟蕭條，境外西方帝國環伺、虎視眈眈。因此在國內農村破產、百業凋零的「推力」下，加上西方殖民者為了開墾殖民地、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所形成之「吸力」，大量東南沿岸之人民以「華工」、「苦力」或「豬仔」的身份，被販運到世界各地，遠至南美洲如古巴、秘魯，近則漂流到南洋各地，為殖民者進行墾殖等經濟活動（Chen 1967; Campbell 1970）。

清廷對於海外移民，一向採取不聞不問、或視之為天朝棄民、叛國刁民。直到面對越來越多華工出洋、以及在西方帝國之壓力下，到1877年才開始施行駐外領事制度。第一個駐外單位，便座落在大批華工、華商移入的英屬新加坡，對

華工採取消極的保護。1893 年清廷正式取消海禁，對於移民態度開始轉向積極經營，不僅取消對回國僑民之罪責，同時更進一步鼓勵具厚實經濟基礎之海外華商，以捐納封爵的互惠方式，慷慨解囊以籌賑鄉里。一時之間「鬻官賣爵」之風氣極盛。到 1903 年更設立「商部」，系統性的招攬雄厚之僑資，以促進中國近代民族工業之發展（黃建淳 1993）。1905 年兩廣總督派劉士驥到南洋一帶查學，清廷才開始正視僑民教育之問題。

然而，清廷對海外僑民之「招安」，事實上也同時是著眼於海外保皇黨和孫中山所領導之革命事業逐漸壯大下，所採取的積極回應。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前，這三股勢力分別在海外主要僑社進行積極動員和相互競爭（Duara 1997），不僅激發了一股海外民族主義之浪潮，也使得海外僑民經歷「再中國化」的可能（cf. Yen 1995; 王賡武 1986a）。因此，僑務政策從一開始就與國家動亂，苦難的人民與政治異議份子被迫流亡海外息息相關，而一旦透過海外的成功動員建立新政權，則很自然的，對於這些建國英雄予以參政權利的保障，照顧其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便成爲了新政權的政策。

「僑務政策」在國民革命成功之後，便開始進行各種「建制化」的工作，包括設立統理各項僑務的專職委員會、在各個重要港口設立僑務局、制定保育與文化教育等各項措施，以協助僑民移植發展（李盈慧 1997）。但從革命成功到二次大戰結束以前，各時期之僑務發展往往也就隨著國家是否遭遇立即的威脅或明確的對抗對象，而有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優先的議程。因此「僑務政策」可謂是一種將祖國和移民之間的「聯繫互動」加以制度化的結果，同時也是一種「生產」祖國和僑民聯繫互動的機制。從歷史上來看，其在初生之時，就與就是祖國需要僑民的財力、物力、人力等各種奧援；而僑民需要祖國適時之保護、增加各種文化、象徵資本的雙重關係下產生的¹。自 1926 年國民政府成立「僑務委員會」之後，便奠定了往後政策大致的內容方向；同時從國民革命成功一直到抗日戰爭結束，期間政治動盪不安，**僑務運作幾乎與國民黨海外黨務互為左右**，以政黨帶領僑務凝聚國內外各方力量，包括海外資金和人力的強力挹注，來進行北伐、抗日等活動（李盈慧 1997）。

中國僑務政策內容可分爲「移植護僑」和「政經動員」兩大類。前者包括保護僑民在外的人身財產安全、保障國內外基本的政治、社會權益、協助僑民教育發展、僑生回國讀書、輔導僑團經營等等；後者則包括獎勵僑民回國投資、管理僑匯納捐、號召政治支持行動等等。政策的服務對象，即「僑民²」的認定，長

¹ 在這裡，並不是意味著說兩者之間的聯繫乃經過「理性計算」之後達成的，之中當然亦牽涉各種血緣、文化、政治認同等情感因素，惟理性和感性往往糾結在一起，難以區辨。

² 一般而言，「僑民」一詞乃用在憲法、法律等高階的條文中，即「僑居國外之國民」。在二次大戰前的政策脈絡下，「僑民」幾近等於「華僑」。而「華僑」一詞的使用，根據王賡武（1987）對

久以來多半以血統為原則，只要未曾辦理「放棄國籍」手續，即便擁有他國國籍，仍然為政策服務之對象³。這樣的政策準則在二次大戰以前，世界史上尚屬於「殖民的年代」裡，亦即公民資質/權利（citizenship）的概念尚未普及的年代中，大體而言並不會構成任何爭議。甚至在西方殖民者的民族國家想像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乃是某種未成文的共識。在這種情況之下，殖民者按照自身的需要，大量的引進「外勞」作為開墾荒土的廉價勞力，又基於統治成本的考量之下，任由這些外勞者自辦民族教育而少加干涉，甚至與清政府頻頻交涉，建議其設立駐外使館「管理」海外僑民，奠定了戰後東南亞各地特殊的族群風貌。

總結而言，僑務政策作為一個針對海外國民所制訂的政策，事實上與國家政治危急具有高度的關連。在內容和性質上，與主權國家對於境外公民的法律義務和責任，有著明顯的差異。因為僑務政策的制度源起，與海外民族主義（遠程民族主義）息息相關，透過強調超越國家界線的血緣文化上的關連，透過國家制度性的介入，完成各種政治行動方案。因此，「僑務政策」非單不是中國近代史上特殊的個案，同時隨著「民族國家」政體模型的全球散佈，「祖國化⁴」的現象此起彼落，全球資本與人力的流動，落後國家開始學習如何將僑民轉化為國家資產等等，僑務政策不僅不應視為中國獨特的經驗，同時更是世界史的一環。

第二節 傳統的發明：從拓境殖民、推動革命到反共復國

設若民族國家確如眾所公認的，是「新」而且「歷史的」，則在政治上表現為民族國家的「民族」的身影，總是浮現在遙遠不復記憶的過去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時延伸到無限的未來之中。這正是民族主義的魔法，將偶然化成命運。⁵

前文提到，僑務政策的緣起與海外民族主義是一體之兩面，在國民黨官方的版本中，國父孫中山推展革命事業四十年，就有一半的時間在海外宣揚革命，足跡踏遍全球，受助於海外僑胞，在海外策動十一次的武裝革命，終於推翻了「五千年」的專制政體，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中華民國。因此，華僑

其起源的研究，乃與十九世紀末孫中山等同盟會會員廣泛傳播極為相關，而逐漸取代了「唐人」、「華民」、「華工」、「華裔」等稱謂。戰後有關「稱謂問題」一直以來都是相關學術討論一個熱門的主題，多數往往集中在討論何種「稱謂」較為妥當，卻少有人去分析「稱謂」背後的「符號政治」的問題，見本文第四章第四節。

³ 此原則乃根據 1929 年所訂立之「國籍法」而來，戰後國民黨遷台之後仍然沿用此原則（直到 1999 年修改條文），中國大陸共產黨則在 1955 年宣布放棄「雙重國籍」政策，並鼓勵僑民歸化當地，不願意歸化者可選擇回中國。

⁴ 見 Connor（1986）、Kaiser（2002）。

⁵ Anderson（1999）《想像的共同體》，頁 18。

被譽為革命之母，其愛國之心自然也就無庸置疑。

但事實上「華僑」一詞被廣泛應用來指涉海外華人，乃是上世紀初的事。作為一個能強調民族主義意涵、含納不同時期移民⁶、不同地域文化與血緣團體的意識形態呼喚，其究竟是如何克服地理上的限制，號召散居各地的僑民共同投入建國運動？我們會發現，不管是革命派的同盟會，或是改革派的維新派，除了透過魅力領袖到處游說宣傳之外，藉由「辦報」來控制當地輿論、撻伐時事、宣傳政治理念，是達至動員效果的最佳工具。但在宣傳政治行動以前，必須要先打破過去中國「安土重遷」的文化傳統，透過對歷史的重新改寫，將僑民個別的際遇和祖國國內政治聯繫起來。

王賡武（1994a：15）在一篇探討華人移民類型的文章中，指出二十世紀初的「華僑型」模式挽救了美洲以「華工型」為主的華人社群，讓他們能夠在來自祖國的積極拉攏之下，得到了民族尊嚴的一體感和崇高的政治目標，而能熱烈響應來自祖國的關懷，脫離了作為「天朝棄民」的恥辱⁷。事實上關於華人脫離土地、到海外謀生，一直到十八世紀末，整個清代都幾乎沒有這方面的記錄⁸。而祖國開始「發現」海外僑民、為之立傳頌揚，乃是晚清以來，民族論述和國族想像中的一環。沈松僑便確實的指出，晚清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除了重要的神話人物——黃帝的編造之外，另一個讓人「埋首故紙」、「上下求索」的敘事建構，便是「民族英雄」的「光榮系譜」。不滿於過去以帝王為歷史主體的傳統史學，晚清的民族主義者不僅大唱「史界革命」，同時也身體力行，將過去「蒙塵」的民族歷史洗滌發揚，作為中國民族想像之模範（沈松僑 2000：89）。

1904 年梁啟超在日本橫濱的《新民叢報》發表了一篇〈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便深入地發掘十五世紀以來中國人在南洋所創造的豐功偉業。文中梁任公不僅驚嘆道：「孰知我黃帝子孫在祖國雖無復寸土，而猶有作蠻夷大長於海外，傳百餘歲而未艾者耶？」，同時也懊惱地說道：「試問四萬萬國民中，能言八君子事業者幾人，豈唯事業，即姓氏亦莫或聞知也。」表現出梁啟超儘管反對以排滿的種族主義進行國族肇建，但是當他發現中國人在海外所建立之事功偉績，乃無異於西方之哥倫布、麥哲倫等，亦難免從種族主義的角度（即黃帝子孫在祖國雖無復寸土），讚嘆中國曇花一現的帝國事業。同時又悲呼國人之封閉迂腐，別說能後繼於八君子而遠征闢野，建立如英國條頓人之殖民功績，就連「聞其名、知

⁶ 如華僑型、華工型，以及早期已為當地所涵化的華人等。

⁷ 相似的看法亦見於麥禮謙（1992）。

⁸ 除了少數以遊記的形式對海外國家的記述中略微提及，如張燮的《東西洋考》、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等，見王賡武（1998b）。

其事」亦不見於後世。王賡武（1994a）認為，梁啟超乃是第一個將當時的「華僑」概念和西方「殖民」概念聯繫起來的民族主義者。由於著眼於全球性空間（global space）的脈絡下進行思考（cf. Tang 1996），梁啟超認為中國之所以未能發展西方之殖民事業，乃在於中國並非如西方那樣「內力充實，而膨脹於外」，因此即便偶有帝王派人七下西洋、出使西域、振大漢之天聲，但終究不過只是「好大喜功，快一時意氣」，而國人在「不知奮厲、急速鑄成國民之資格」之下，只能附庸在條頓民族之下，「自為其奴隸」。

相較於梁啟超，1910年由革命黨機關報《民報》所刊出的〈南洋華僑史略〉則有不一樣的解釋。作者義皇正胤（原名易本義）認為華僑在南洋拓殖的成功，千年來已使南洋成為中國的南方領土，並與西方殖民事功相去不遠。然而為何當「西力之東漸，歷史之光榮且屈服於少數歐美人政權之下，仰人鼻息，俯首貼耳而不敢有所抵觸」者，並非一般人所以為的，華僑因缺乏法律思想和政治能力來「握霸權於海外、樹殖民之偉業」；而是因為「淪亡於異族，而無政府之保護」所造成的⁹。更有甚者，作者認為南洋「林林總總繁衍二百數十萬」的華僑，乃是歷代北方外族侵略之下，漢族流亡南洋的最後忠臣與遺族。而清廷實施海禁，下令「閩人入海歸國者斬之」，無非只是為了「禁鄭成功之餘黨出亡且欲以錮蔽吾漢人之智視而阻其進化也」¹⁰。簡單一句，千錯萬錯乃肇因於「異族政府使至壯志不遂」，即完全是昏庸無能的滿清政府所種下之禍根，而與華僑能力無關。

有趣的是，儘管兩者對於華僑未能保衛中國的「殖民地」，並淪落為西人之附庸而提出不同的解釋。但是，異口同聲地將華僑與當時所盛行的殖民主義，進行「正面」的聯繫，乃是翻轉過去將海外華人視為盜匪、棄民等污名，而援以西方啟蒙以來的冒險精神、擴張主義的價值，重新詮釋華僑的海外經歷，賦予其積極正面的意涵（Duara 1997）。在此書寫的過程中，民族主義者透過一套正面的象徵秩序，將海外僑民生活處境與祖國的政治狀況進行「因果」上的聯繫，將個人煩惱與祖國政治相結合，框構¹¹（framing）了既有的政治情境，達到政治動員的效果。

⁹ 見義皇正胤（1910）〈南洋華僑史略〉，收入於民報（1983影印版）第二十五號，頁3986-3987。

¹⁰ 見義皇正胤（1910）〈南洋華僑史略〉，收入於民報（1983影印版）第二十五號，頁4008-4009。

¹¹ 此概念借用自社會運動理論，探討社會行動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根據Zald（1996）的看法，集體行動乃是藉由利用文化存量（stocks），針對社會整體的組織型態設計出各種抗議的象徵劇碼。當一個社會的文化開始產生斷裂，社會運動者透過定義議題、發明隱喻、歸因責任和製訂策略等等，提供主要的論述框架，並與其他論述競爭，再透過媒體之操作運用，達至影響政策和改變主流文化的效果。在本文脈絡中，海外民族主義者同樣是透過豐富的國際知識（例如條頓人之殖民功績）、中國移民史的再挖掘等等文化資產的運用，從新定義海外華人與祖國之間的關係，並利用大量的媒體操作（如民報、新民叢報等刊物）達到政治動員的效果。

但此種將「華僑」與「殖民」相提並論的書寫模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威爾遜民族自決口號的提出之下，帝國主義開始具有負面性的意涵，使得相關論述產生微妙的改變。1924 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增設海外黨部，正式將海外力量納入黨組織系統，並在「北伐宣言」上明白地表示：「此戰爭之目的，不僅在推翻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此時，「帝國主義」開始成爲革命事業上的新敵人，黨組織所動員的主要目標也成爲聯合弱小民族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國際路線（楊建成 1995）。

在此政治背景之下，1928 年上海暨南大學成立了「南洋研究所」之後，出版了大量關於南洋和華僑的著作¹²，其中 1937 年出版的李長傅《中國殖民史》，開始更細緻的討論西方「殖民」的概念。首先，借用西人之討論，他將「殖民」區分爲狹義和廣義兩種，前者以部分國人移往新地從事社會經濟活動、並與原住民相接觸並共同生活；後者則是爲控制當地經濟而建立軍事設置爲先，即便無國人移植亦可稱之爲殖民。在此定義之下，「中國殖民」乃採取狹義之意涵，而與西方廣義之殖民並不相同（李長傅 1983：緒論）。相較而言，1934 年劉繼宣和束世澂合著的《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則進一步以「拓殖」來取代「殖民」的概念，大嘆「此千萬人，非由政府有殖民政策以主持其移植也，又非有社會之戮力協助以鼓勵之也，其冒百死，涉重洋爲祖國爭輝，一反安土重遷之習，謂非吾族之豪俊者乎？」並認爲在明朝以前，華僑移植開闢南洋，已使南洋成爲「中國之南洋」。不僅將「移民活動」和「祖國爭輝」聯繫在一起，同時也開始書寫「華僑革命」之事功，以及祖國與南僑之種種聯繫。（劉繼宣、束世澂 1971：導言、第十一章）。

但在二次大戰以後，隨著各方殖民地的紛紛獨立，民族自決的口號響徹雲霄，「殖民」一詞在不受歡迎之下逐漸被拋棄使用。此時「華僑」的遷移活動也正式與「殖民」脫鉤，並且在兩個不同立場的祖國政府對峙之下，出版不同觀點的歷史書寫（王賡武 1998a）。相對於中國共產政權從農工階級的角度，把華人描繪爲當地國際革命運動的支持者，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則認爲華僑將延續中國晚清革命的傳統，將海外華人視爲「促成反共國家聯合陣線」的重要推手。例如 1952 年國民黨在風雨飄搖之中召開第一屆「全球僑務會議」，會中蔣介石在致詞時便表示：

在這次反共抗俄戰爭，海外僑胞，更充分表現了明順逆，辨忠奸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大義，尤其是，這三年來僑胞在國際政治複雜錯綜的環境中，堅決反共，在精神上，給予了自由祖國軍民，以極大的鼓勵，給予漢奸敗類以正義

¹² 例如 1927 年張相時之《華僑中心之南洋》、1929 年溫雄飛之《南洋華僑通史》、等。

的無情的打擊！並且促使了自由國家逐漸認清了我們中華民國在反侵略的陣營中，是一個不可輕忽的力量，僑胞們的這些努力，是比當年領導革命，贊助抗戰，要更為艱鉅，更為偉大的。

在《僑務五十年》的紀念刊中也提到：「僑胞秉承中國文化傳統，在思想上是反共的；習於民主自由，在生活上反共的……」。

但問題卻在於，不管是「排滿革命」或「對日抗戰」，國民黨政權在不同的階段中都成功的運用歷史和血緣文化等「自然」的國族界線，清楚地劃定了「他群」和「我群」之敵我對峙狀態，因此能夠在短期之內達到某個程度的動員效果。相反地，共產黨對於國民政府來說，卻是同屬一個血緣文化的「親密的敵人」（intimate enemy），在此情況之下，究竟應利用什麼樣的論述規則，才得以爭取華僑的支持呢？時任僑務委員長的鄭彥棻在其《僑務問題的新認識》中便寫到：

以一個「無祖國」的賣國集團，其政權的本質，完全是附庸性和傀儡性的，他們的僑務工作，也是附庸於俄帝的侵略政策，就是要使僑胞成為俄帝向外侵略，統治全世界，奴役全人類的工具。（鄭彥棻 1953）

在這裡，內戰失敗後的國民黨只能延續過去「打倒帝國主義」的政治修辭，將中國共產黨標籤為「俄帝」侵略亞洲之附庸，但此種高度抽象且證據薄弱的指控，動員效力顯然欲振乏力¹³。除了堅持反共之外，國府似乎也想像不出其他象徵性的鬥爭工具，來維護其獨霸政權之正當性。最後，只能用情緒性的詛咒方式，將共產黨加以「盜匪化」、「虛偽化」、「妖魔化」，作為自身窘境合理化的解釋。同時在美國強力的軍事牽制之下，兩岸嚴重的對峙，在直接肢體衝突不被允許的情況下，只能表現在象徵鬥爭上，使得「國共內戰」逐漸外溢成為「國共外戰」和「國共筆戰」，而僑務自然也就成為此象徵鬥爭的最佳舞台，在國際冷戰的肅穆氣氛之下增添幾許熱鬧氣氛。

第三節 中國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及其影響

在 Anderson 民族國家模型的散佈論中，中國經驗儘管沒有被直接以個案作處理，但從其推論看來，中國應該被劃分在「後進者」這最後一波，使之能夠「盜版」前面各種版本的「建國方略」，在建國歷程上不僅極為漫長、也十分複雜。然而，與其他亞洲殖民地相異的是，中國作為擁有文化帝國的殘影確實為「次殖民地」的廣大地區，在建國路上儘管同樣以「驅除韃虜」、「打倒帝國主義」為號

¹³ 一般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出線領導之後，就已逐漸偏離莫斯科的指導，建立自己的路線，可參考 Chang (1981)、Fitzgerald (1995)。

召，但由於缺乏統一的殖民地政府所提供統治官僚體系的支持，使得在建國歷程上，比起南方各國曲折許多，然而，卻也表現了其中的特殊性（cf. Fitzgerald 1995；沈松僑 2002）。

然而，在近代中國建國運動的歷程中，究竟「海外民族主義」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中國建國運動對於海外僑社又具有什麼樣的影響？仍值得進一步分析和理解。在以《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為基礎的理論系譜上，Anderson（1998）後期又提出「遠程民族主義」（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將「流亡」、「遷移」和「距離」的因素獨立提出來進行討論。「流亡是民族性的溫床」¹⁴，相較於安土重遷的廝守所展現對土地主權的捍衛，遠程民族主義則是一種「比較下的魅惑」¹⁵：流動讓民族性從意識裡浮現。伴隨著資本主義巨輪下的交通革命，不僅讓兒童能夠「移動」到學校去接受統一的語言教育，同時也製造了一批批「年輕的」雙語人才，在母語和國語的消長之下，進行一場又一場的「朝聖之旅」，直到認清自己永遠只會是非英國的英國人、非荷蘭的荷蘭人¹⁶之後，屬於「自己的」民族意識才開始浮現。

回頭考察孫中山革命意識的孕育¹⁷，也同樣經過一系列「流動/流亡」的過程。被認為出身於「華僑世家」的孫文，藉助兄長在檀香山經營謀生之便，十四歲便踏上輪船體驗滄海之濶、見輪舟之奇而慕西學，之後更進入當地學校，接受四年的西式教育，啟發其思考「改良祖國、拯救同胞」的思維。從此角度觀之，檀香山乃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聖地」，儘管檀香山並非中國的宗主國，但這樣的體驗卻襯托出一種對比、一種「望遠鏡的逆轉」（Anderson 語），使得孫文在回國之後，對清吏的腐敗昏庸、家鄉的愚昧迷信，益發怨恨不滿。這樣的不滿，在中法戰爭因清廷昏瞶而放棄安南宗主權、在中日戰爭失敗而割讓台灣之後，更促使孫文態度轉變，堅持以「革命」作為救國的唯一手段，不僅拒絕和改良派的保皇黨合作，到後期甚至相互競爭、詆毀。

孫文在 1895 年第一次的廣州之役失敗之後，便開始長達十六年的流亡生涯：在海外宣傳革命。就如 Anderson 所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得以讓民族主義模型散佈到世界各個角落，卻也開始挖其牆角，讓人口和資訊的流動越來越可能、速度也越來越快。但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卻往往是一種全球經濟的「階層化」

¹⁴ 「流亡是民族性的溫床」(exile is the nursery of nationality)，是 Anderson 引用政治史學家 Acton 的警語。

¹⁵ 「比較後的魅惑」(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乃是收錄 Anderson 遠程民族主義文章的論文集書名，點出了 Anderson 對心態面的重視。

¹⁶ 前者指民族文化，後者指國籍。

¹⁷ 底下有關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描述，主要參考陳樹強（1985）。

現象，低於人口 25% 的人支配了世界 85% 的收益，使得在種種拉力和推力之下，越來越多人往全球的經濟中心移動（1998：67）。海外華人在全球的散佈，同樣是這股潮流下顯著的一環，隨著政治異議份子與越來越多國民外移尋找生存空間，以海外作為革命的後盾，將僑民予以政治化的動員，便成為改變現實政治的方便手段。

王賡武（1986c）曾指出，在 1900 年康有為、梁啟超和孫中山訪問南洋以前，南洋華人並未曾獨立地產生民族主義的領袖。儘管他們意識到自己是華人，也希望總有一天能衣錦還鄉，知道中國羸弱不堪，而他們處在異鄉備受歧視，但民族主義的決定並非自我發現，而是來自於中國受過教育的境外華人的「巧妙遊說」。王賡武將此發展稱為「外部訓出的民族主義」，認為它把華人一切問題都歸納為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一個強大的中國將會保護他們**。顏清煌對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歷史觀察，同樣認為海外華人民族主義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所派生的產物，而非受到寄主國本土民族主義的刺激所產生（Yen 1995c：136）。在此情況下，海外民族主義的發展，不僅是流亡海外的政治菁英，透過報章、與學校的控制，將僑民加以政治化的結果，同時其發展之強弱，亦隨著中國政治局勢的發展而同步變動（Yen 1995）。

孫中山曾將華僑譽為革命之母，但華僑對於孫中山的接受度，卻是得之不易。（Yen 1995a）儘管透過翻印《揚州十日記》激發了漢人的歷史記憶、將華僑視為蒙滿侵略下的漢人遺族，而寄予厚望，革命派的建國論述對於海外華僑來說，仍是造反殺頭的激進路線。許多保守的老華僑，只有懼怕清政府透過對外關係予以報復、連累家鄉妻兒，至於滿清是否無能腐敗？有無喪權辱國？對於他們來說，都是遙遠陌生的，使得孫中山早期的革命宣傳，往往和者寥寥，效果有限（陳樹強 1985；Yen 1995b）。相反的，清政府在多次與西方各國談判接觸後，開始學會現代國家的政治制度。例如在帝國的鼓勵誘拐之下，開始在新加坡、舊金山設立駐外使館，管理和保護中國移工，並開始設立「商部」，鼓勵海外華僑回國發展實業，甚至為了爭取海外資金，賣官鬻爵的風氣一時蔚為風潮，不僅吸引許多著名的大商人，一般「中產階級」亦趨之若鶩，占了總數 83%（顏清煌 1982；黃建淳 1993）。

如果清政府的招安策略已然形成一股「反革命」的阻力，那麼，領導開明士大夫變法維新、流亡海外的康有為與梁啟超所創立的保皇黨，則是與革命派進行直接交鋒對抗的另一股力量。相較而言，保皇黨的改革論述，遠比革命派具有吸引力，同時善於利用海外僑社的經濟特性，使之在財源上得到更多挹注，配合中庸傳統的儒家文化論述，能得到尤其是保守中上階層海外華僑的支持（Yen

1995)。無論如何，從 1900 年始，義和團的失敗，清廷的一再失誤和拒絕改革，到 1908 年光緒帝的暴斃，讓保皇黨的論述路線全面失守，都使得原有支持憲政的改革者紛紛傾向於革命運動。因此，就顏清滄看來，1911 年的辛亥革命，華僑即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仍具有許多歷史的偶然性而非必然性，其中清政府對帝國主義的顛覆無力才是重要的背景因素（Yen 1995）。另一方面，按照當時參與者的多方推估，從 1906 到 1911 年間是革命派勢力高漲的時期，在星馬一帶的革命黨和其支持者卻只有二千至三千人，占當時星馬華僑社會十五歲以上人口之 0.3% 至 0.5%。然而在武昌起義成功後的一個月內，海外華僑紛紛轉向支持，革命支持者突然暴增至華僑總數的 4.4% 到 5.9% 之間（顏清滄 1982：287-290）。1911 年 11 月 24 日，孫中山返國就任臨時大總統，經過檳城和新加坡時，華僑紛紛出來自稱為孫中山的長期支持者，一時之間民族主義情緒極為高漲（王賡武 1986）。

換句話說，相較於「國父足跡踏遍全球，得助於海外華僑，終於推翻了五千年的封建體制」的正統歷史敘述，孫中山在海外宣傳革命時，不僅因其政治主張過於偏激，不受華僑社會歡迎，而事倍功半，同時長期處於弱勢局面，一直到清廷內部開始腐化，呈現真空狀態，革命論述才開始匯聚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並不是所有華僑都是革命之母，華僑社會更非鐵板一塊，不管是基於社群的大小、移民時間的差異以及僑居地的政治環境等等，都會影響不同地區華僑對祖國政治事務的反應，因此我們必須了解海外華僑社會的基本型態。

有兩種不同的面向，可以讓我們掌握海外華僑的複雜性，第一是方言群和血緣宗親的分類，第二是「本地化」的差異程度。大體而言，從鴉片戰爭以來大量外移的勞工移民，多數來自中國南方沿海地區，如廣東和福建。除了政經動亂和西方殖民需求的結構因素之外，社會網絡也是促成移民浪潮的重要因素。新馬社會早期以方言群或血緣宗親作為集體認同的主要法則，個別壟斷不同的職業類別，並在殖民地以最小管理成本的經營原則下，得到蓬勃的發展（麥留芳 1985；顏清滄 1982）。同時，在無法相互理解溝通的方言限制之下，早期華人所集資興辦的私塾教育，亦是方言作為主要界線，直到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國語的統一和新課程的引入，才大大地打破方言的限制，現代化的民族教育體系才得以建立起來（林開忠 1991）。

其次，王賡武（Wang 1970）以「本土化¹⁸」的程度將海外華人區分為三個

¹⁸ 此概念並非王賡武的用語，在說明其分類架構時，他說道：「這個社會在許多方面雖已自立，但迫於環境和傳統，過去一直是、現在仍然是，要麼同他們的故鄉，要麼同他們所定居的國家結為一體。這種同一化（identification）的影響，不管是在社會內部，還是在那些要控制華人的

不同的政治團體。甲集團與中國政治保持直接或間接聯繫，認同中國命運，政治色彩最濃厚，但因受限於當地殖民或土著政權，往往在遠距離的情況下，人數較少，最感無力與不得志。乙集團則由務實地精明算計，對政治保持低姿態少涉入，心繫於經濟貿易和一般社團的人組成；其政治態度不明確、目標溫和，滿足於既有的政治結構，僅發揮某種程度的影響力來保障既有地位，並以人數作為其社會力量的保障。丙集團則以擁抱本土、效忠於殖民政府或當地政權，多半移民較早而與家鄉斷絕聯繫的混種移民（creoles）所組成，依附在當地政權之下。無疑的，相較於以「方言群」來分類的宗親血緣團體，後者之分類不僅界線模糊，同時也是流動的：即甲集團可能流至丙集團，反之亦然。

很顯然的，前者以傳統文化、方言群為團體界線的分類法則，必然隨著現代國家的興起、統一語言文字的需要、相對適當的種族分類，而慢慢消蝕。但對後者而言，在選擇「暫居」或「定居」仍十分模糊的年代，**兩種國家引力——祖國與寄主地，都是移民能夠達至向上流動的重要支點。但問題在於，這兩股引力的作用，在時間上卻呈現了一個將近五十年的落差。**從 1900 年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全球大部分地區都處在西方帝國的勢力之下，在資本邏輯之下間接促成華人在全球的散佈，在自由放任以減低管理成本的原則上，對逐漸升高的中國民族主義，並未有及時的對策和抑制。另一方面，西方帝國對於中國內部不同政治勢力的競爭，實採取隔岸觀火的姿態，或是樂見能負責有擔當的現代政府出現，保障其於中國之利益。同時面對源源不斷人口的流動，不管是對西方帝國來說、或是移民本身、移出國的角度，都認為那只不過是暫居的客工，最終都會回到中國去。事實上以統計數字來說，二次大戰以前，不管是東南亞、或是歐美等地，僑居的現象普遍存在（Yang 2000；Wang 2001；麥留芳 1985）。因此，隨著中國現代國家雛形的建立、對外交通和聯繫的管道越來越暢通，從 1911 年到 1940 年間，不僅中國各政黨都相繼建立正式的海外黨務系統（楊建成 1995），僑務的相關政策，包括支援現代僑校建立、吸引華僑回國投資、保障華僑參政權力、保護華僑措施等等，就如王賡武指出的：「南洋華人也開始感受到其保護性的溫暖。」（1986：150）但更重要的是，經過這一段不算短的政治化過程之後，海外華僑也開始學會政治宣傳和群眾動員的技巧，並且很快便派上用場（Yen 1995）。

對日抗戰是「海外民族主義」發揮到極致的一個時間點，反滿運動的經驗以及二、三十年來的發展，海外華人發動的抗日運動，不僅是一種自發性的動員，

統制官員之中，任何時候都是重要的。正在這個背景下，我在別處曾提出，整個東南亞華人無論何時都可以劃分為三個不同的政治集團，這種劃分是基於他們參與中國政治、參與各自海外社會的政治，以及當地的政治狀況。」（Wang 1970，筆者自行翻譯）

同時也是跨區域的高度合作（Yen 2001）。在開戰短短兩個月內，從緬甸、三藩市到新加坡、法國、紐西蘭都紛紛成立「籌賑會」、「華僑救國會」等多達 207 個的組織。以南洋一帶陳嘉庚所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為例，從 1938 年成立到 1942 年日軍佔領南洋為止，總共向國民政府捐獻了四億元的經費和大量作戰物資、組織數十個回國服務團體及慰勞考察團，和創辦數十種報刊，全力支援國民政府對日抗戰（任貴祥等 1999）。另一方面，抵制日貨更成爲反日的一種實踐，從拒購日貨、要求華人零售商停止販賣日貨、拒絕受雇於日人、拒絕與日人進行任何商業交易，同時對於違反規定的華人，更予以恐嚇威脅，直到殖民政府不得不出面抑制（Yen 1995）。

南洋華人在抗日運動中驚人的動員力量，使得在日本佔領南洋之後，遭遇到報復性的殺戮，大大打擊海外民族主義的發展。同時，跨區域的政治動員也使得逐漸升溫的「土著民族主義」更趨白熱化，甚至站在反帝反殖民的角度，聯合日本一起打擊西方殖民勢力，此時其境內華人無疑是西方帝國的代言人。爾後，日本投降，西方殖民勢力逐步退出，新興國家的土著民族主義才相繼上場。

總結來說，從 1900 年到 1911 年，在滿清政府、維新改革派和革命派之間三股力量的相互競爭之下，祖國的政治勢力在海外展開各種宣傳戰，不僅將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逐漸成形的移民社會予以高度的政治化，同時也模糊了原有以方言、宗親爲主的社會界線，讓移民開始想像一個中國作爲現代國家的共同願景。隨著新國家開始認識到海外移民的政治力量，各種權力和義務對海外的逐漸延伸，都使得原本以中下階層爲主的移民社會開始注入新的元素，加上透過對商業力的掌握，南洋華人開始形成一個相對自主的社會，並且成爲戰後各新興國家在國族打造歷程中，必須面對的難題。

第四節 1949 年以後的殖民獨立運動與僑務政策的限制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二次大戰結束，昔日的西方殖民者開始回到南洋繼續「再殖民」。然而，戰後的國際情勢，事實上早已不可同日而語。首先美國已一躍成爲世界強國，打亂原有國際政治的勢力結構；同時各地人民在親自目睹殖民政府對日侵略的不堪一擊，以及在對日抗戰中磨練出戰鬥的實力，獨立自主的信心因此大增，使脫離殖民的獨立聲浪急速高漲。從 1945 年印尼的抗荷鬥爭、1948 年緬甸的打倒英國、1954 年印支三邦的對法作戰，到 1957 年馬來亞聯邦與英國的談判，各國都相繼取得獨立。獨立，對於當地華僑來說，卻是面臨「國籍」選擇的重要時刻，是爭取「居留權」和「生存權」的另一序幕。

一般來說，新興立國的當地政府對於境內華人往往表現出矛盾的迎拒心態，一方面希望在「民族國家」打造國族的原則下實行同化政策、切斷華僑與中國政府的臍帶，因此多半採取「出身地主義」為國籍的原則；另一方面，對於華僑政治忠誠的疑慮和對共產勢力的威脅¹⁹、加上華僑對當地經濟掌控的相對優勢，使得當地政府始終無法採取完全開放的政策，讓境內華人能享有與自身相同的政治地位。但無論如何，南洋各國後殖民時代的發展，也意味著另一種政治作用力的興起，影響華僑與祖國之政治聯繫。

如果說面對新興當地土著政府的「同化」壓力，是使得華僑不得不去思索面對的一股「拉力」，那麼，「分裂的中國」則是將僑民和祖國的距離遠遠拉開的另一種「推力」。抗日勝利不滿一年，國共協商破裂，內戰復發，儘管國民政府再次呼籲華僑支持「反共」，然而經年累月的動盪消耗，加上認為是「現在不是抗戰，而是要打內戰」²⁰來自相殘殺的做法，已得不到海外華僑的支持。因此，各地僑社紛紛呼籲國共停止內戰²¹，甚至成立「反對內戰」大會，阻止將「雙十獻金」拿去購買醫藥、軍用物資，並且要求美軍撤出中國、停止物資的奧援等等。到了最後，部分華僑更將希望寄托在共產黨之上，認為共產黨才能「救中國」²²（任貴祥等 1999）。

1949年內戰勝負塵埃落定，國共兩岸對峙，華僑在各種不同情勢的推拉之間，漸漸退出祖國的政治舞台，轉向當地去爭取各種生存權利。不幸的是，華僑即便在爭取獨立的抗爭談判中，不留餘力地與當地土著聯手合作，然而「華工」、「豬仔」作為當地殖民歷史中的一部份，對於當地人來說，始終只是喧賓奪主的客人、夾帶優勢文化的異族以及殖民剝削者手下的代理人²³。因此，即便絕大多數的後殖民國家乃採取鼓勵少數族裔應歸化國籍的原則，然而仍只是一種「單邊同化主義」（unilateral assimilation）：即在語言、文化上要求弱勢族裔放棄母體文化，在政治權利上卻無法使之平等相待，卻沿用過去殖民者以種族協商的方式，進行各種族群利益的侍從政治。在這種情況下，即便「華僑」開始轉變為「華

¹⁹ 這裡包含兩種「恐懼」，一種是「中國黃禍」，另一種則是「共產主義」。中國大陸赤化之後，這兩種印象同時結合在華僑身上，使得當地政府可以以「反共」的名義，實行「種族主義」的文化霸權，以鞏固自身政治地位和權利（cf. Alexander 1973）。

²⁰ 陳嘉庚語，轉引自任貴祥等（1999）。

²¹ 例如 1946 年 10 月 10 日，新加坡 200 多個華僑團體等五萬多人召開慶祝雙十節大會，大會發表宣言並分別致電與蔣介石和毛澤東，在至蔣的電文中指出：「竊念當年建國艱難，厥為堆翻專制，建立民主，方今內戰烽火，勢成燎原，外軍駐境逡巡不去，黨未還政，民不聊生，長此蹉跎，國將不國。用特電請立即停止內戰，重開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並促美軍撤出中國，挽回民族危機，時限和平民主」。轉引自任貴祥（1999）。

²² 例如南洋籌賑會主席陳嘉庚、美洲僑領司徒美堂等等，與蔣介石越行越遠，最終發表支持共產黨、指控蔣介石貪污腐敗，引起僑社一陣「倒陳」和「擁陳」的風暴。見崔貴強（1989）。

²³ 有關這方面的思維，參見 Mahathir（1981）《馬來人的困境》。

人」、「華裔」，政治上的邊緣化卻往往使之抱有「二房東」的心理²⁴，容易停留在對原鄉文化的記憶和現實生存利益糾葛的中介狀態，留下與祖國政治「藕斷絲連」的可能性²⁵。

在美國的部分，抗日結束之後，國共之間的分歧也延燒至北美各地，1949年國民黨遷台之後，進一步分出第三勢力——反共也反蔣。但這些紛爭很快地便在美國介入韓戰加劇美中對立、國內開始吹起反共恐共的麥卡錫主義、左派勢力被一一肅清、政治氣氛一面倒向極右派的情勢下結束，使得親國民黨的勢力得以全面地支配美國的華人社會。在美國的默許之下，台灣國民黨政府公開地與美國傳統僑社保持密切聯繫，維持他們對蔣政權的支持，並聯合美國政府打擊任何反對者，有效地阻隔僑社與大陸的任何聯繫，甚至也禁止任何僑匯，施行對中國的經濟制裁（麥禮謙 1992：339-353）。另一方面，美國在四零年代開始，基於美中發展軍事聯盟的氣氛下，撤銷許多排華法令，並開始允許僑眷無條件移民美國，影響僑社的性別比例。（Yang 2000）。

綜上所述，二次戰後的海外華僑，所面臨的局面乃是分裂的祖國和僑居國的同化壓力，在這一推一拉之間，「僑務政策」的施行條件已大不如前。但無論如何，寄主國政府在面對國際環境和國內政治的考量之下，制訂不同的華人政策，都影響了僑務政策的點面廣度。而相較於東南亞在戰後拒絕任何中國移民的情況下，美國等其他西方國家則開始接受中國移民，使得僑務工作的重心在戰後也開始往北美傾斜。另一方面，從戰後一直到六零年代末期，不管是北京政府或是台北的國民政府，都經歷一段適應新局面、整撥政策調性的摸索階段。以北京政府來說，盡管與華僑的聯繫遠不如國民黨深厚，但作為中國的新政府，負起保護僑民權益、承擔解決華僑問題的義務乃義不容辭。惟捲入韓戰及面對台海國民政府和美國的威脅，北京政府無意挑起東南亞各國的任何敵意。在此情況下，指導僑政的最高原則乃是以「不傷害」新政府外交利益為優先，故往往其結果仍停留在宣稱和口號階段²⁶。相反的，偏安台北的國民政府作為「反共陣營」的一員，韓戰爆發後，便扮演反共勢力的重要角色，爭取華僑的支持自然成為不可或缺的政治資產，在面對與各國協商的態度上，便比北京政府來得強硬²⁷，但在東南亞一

²⁴ 這裡並不是意味所有的相關國家或是單一國家內的所有華人都抱有這樣的心態，只能說這種心態是存在的，其普遍性仍得視不同國家和個人的生命傳記來決定。

²⁵ 關於此節將在第五章進一步申論。

²⁶ 詳細討論參考 Fitzgerald (1972:74-101)，必須注意的是，這裡指的是北京政府的「對外」政策，而當時北京政府花更多精力的是在於安頓許多「歸國」僑胞，甚至在東南亞反共的情緒下，主動接回許多被驅逐出境的華僑，單就馬來亞就高達兩萬四千人以上被遣送回國。

²⁷ 最能說明此點的事件可參考海外出版社編（1957）《越南華僑國籍問題研究》，歷史分析可見趙綺娜（2001）〈從越南國籍法案之交涉看我國對越南華僑政策(1956-1957)〉。

遍國族意識的高漲之下，選擇當地國籍、保持與祖國的距離，已愈來愈勢不可擋，使得僑務與外交之間的拿捏益發困難。對於各地華僑來說，接受成為新興國家的少數族裔已是無法逃避的現實，1955年周恩來參與萬隆會議與印尼政府簽訂了「雙重國籍問題」條約，鼓勵華僑選擇當地國籍之後²⁸，更確立了華僑由「落葉歸根」轉向「落地生根」的時代趨勢。

第五節 本章結論

本章的主旨共有兩個方面：第一是透過歷史的回顧，將僑務政策的歷史緣起和性質予以說明。其次，基於台灣許多人都程度不一地受到國民黨歷史觀點的影響，因此希望透過對照海外其他不同觀點的分析，將「華僑為革命之母」背後的複雜歷史圖像予以分析和勾勒，作為理解後文的分析，一個更客觀的認識基礎。

立足於此二目標，本文的結論主要是：由於僑務政策施行與祖國的政治危機息息相關，中國僑務政策發展必須放在近代中國建國運動與海外民族主義的歷史脈絡下進行討論。而「僑務政策」是一種將「海外民族主義」加以制度化的結果，其發展模式，不僅經歷民族主義者重新書寫和框構僑民的個別境遇，予以他們新的歷史感和意義認同，再透過報章刊物等宣傳機器的控制來達到政治動員的目的。同時，隨著三種不同的政治勢力在海外相互競爭發展，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海外僑設以方言和宗親為主的社會界線，同時也讓他們學習到政治組織和動員的技巧，如何將個人的不幸化為政治運動，並開始以中國作為民族國家共同的想像，而在日本侵華、幾近亡國之憂的非常時期，將動員力量發揮至極限。但隨著二次大戰結束，東亞的政治勢力重組，土著民族主義的高漲迫使華僑必須有一清楚的政治立場：歸化當地或是返回中國。但在實際的政策上，華人在經濟上的優勢使得其難以享有公平的公民待遇，使華人始終抱持「二房東」的心理；另一方面美國在戰後的冷戰策略下也縱容國民黨在美國公開活動，打壓異己，兩者都提供了僑務政策延續下去的結構條件（見第五章）。

²⁸ 相關討論見 Fitzgerald (1972)

第三章 當革命尚未完成：僑務組織在台灣的移植

儘管二次大戰以前，台灣人已因經商貿易等原因僑居東南亞¹，但除了金門以外，台灣似乎不是主要的「僑鄉」，其經濟生產亦非仰賴僑匯。因此直到七零年代以後，越來越多海外留學生學而未歸、以及美國對中國移民的逐漸開放²，台灣島內的「海外關係」才快速提升。在這樣的背景下，七零年代以前國府所施行的僑務政策，乃以台北為中心，架構在台灣島上的一項制度。這套建置，從鼓勵僑胞回國參訪、回國投資、回國升學到回國參政，無一不是試圖進行

僑務工作在台灣的開展，是極其龐大複雜的「產業」(Chen 2002: 174)，不僅牽涉文化、教育、政治、經濟及法律等等，也關聯著海外互動關係，因此從現階段可掌握的史料中，要全面勾勒其一般性的面貌，實屬不易。故本章節主要立足於林林總總的制度叢林，一一將之「倒帶」，回到其初期生成、緊扣在法令和組織的層面上描述其從無到有的過程，先不做任何事件或內容的分析，最後才就其內容做進一步的綜合討論，從而把握其基本運作原則。

第一節 遷台之後「僑務委員會」的組織發展

國民政府遷台，早在 1949 年 12 月 9 日正式對外宣布以前，蔣介石便趁其「下野」之時，積極在台灣草山（今日的陽明山）建立新的指揮中心。國民政府自國共和談破裂、內戰全面爆發之後，軍事上的節節敗退而四度遷都，從南京到廣州，再遷往重慶、成都，直到 12 月 7 日，才發布遷往台北的命令，大陸全面棄守。然而，當時隸屬於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卻因為「服務對象」皆在海外，故可依「中央各機關分地辦公疏運辦法其因業務需要，或情形特殊者得另擇其他適當地點」之規定，先行將機關遷至台灣，僅留「通訊處」於重慶。當時原有的機關人員一共 173 人，附屬機構 32 人，到最後隨著部會首長與文卷檔案分批疏運台灣的，僅剩 38 人，以台北市南京西路 26 號 28 號民房為會址，於 10 月 17 日「恢復」辦公³。

1950 年 3 月 1 日，蔣介石在代總統李宗仁的消極抵抗之下，透過種種政治策動在台北宣布「恢復視事」，並立刻宣布「施政綱領」、製定「緊縮編制」之簡

¹ 相關研究見林滿紅（1999a; 1999b）。又以 1948 年台灣亦設有「僑務局」來看，可推知台灣外移的情況亦是存在的。

² 有關台灣外移現象的研究，統計調查資料可見龍文彬等（2002;2003），一般社會結構的情況可參考陳靜瑜（2003）。

³ 見僑務委員會（1957）《僑務二十五年》，頁 57。

化方案，以整頓多次顛沛流亡而格外殘破的統治機器。在一切以尊節開支的前提下，從總統府到立法院、國民大會等皆進行合併整編⁴。但事實上，政府的多次遷移，各部會人員亦離散各處，或不願離開大陸而自行遣散，或滯留香港，「認為台灣只是一個島」，深怕中共犯台而不願意到台灣。相對的，具有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身分的，則在國府的努力下，從香港難民營被送到台灣以「代表民意」。但大多數低下階層的難民，在國民政府為防止共產勢力滲透台灣的嚴格檢查之下，要進入台灣非常不易⁵。無論如何，當時到台的國大代表僅有 1080 人、立法委員 545 人、監察委員 104 人，總計 1729 人，僅佔應有人數的 3901 人的 44%，不但不足以開「國大」，不能修改憲法，亦無法選舉下一任總統⁶。

當時領導中央政府來台之行政院長閻錫山於 3 月 6 日辭職，蔣介石任命陳誠為行政院長、改組行政院。陳誠是國民黨到台之後，最具實力的人物，掌握臺灣六十萬軍力一半以上（陳明通 1995）。其授命改組，原擬保留原來的八部（內政、外交、國防、財政、教育、司法、經濟、交通八大類），裁併「僑務」和「蒙藏」二會，以精簡開支，但立即引發爭議⁷。幾經研商，認為「爭取僑胞支持反共」，故以「兩會保留現有名義」為原則，由外交部長葉公超「兼任」僑務委員長⁸、內政部長余井塘「兼任」蒙藏委員長，另繼聘黃天爵、李樸生為副僑務委員長，而原隸屬於教育部的「僑民教育委員會」則因緊縮編制而裁撤。

由於大部分的僑鄉淪陷，各地口岸的僑務局、歸僑村管理處、僑民接待所、華僑愛國義捐總收款處等組織皆陷入「匪區」，成立於 1948 年的台灣僑務局也因僑委會遷台辦公之後裁併⁹，故所有業務皆交回中央僑委會集中處理。早期僑務委員會的組織型態，乃設委員長一人、副委員長二人，並在全體委員中指定「常務委員」若干人，每兩個星期舉行常務會議乙次，必要時召集臨時會議，或全體委員大會，屬於集體式的領導方式，以便能「博採僑情」、「廣納僑心」。但委員會中，除了正副委員長和常務委員為有給職之外，其他委員只能領取會議車馬費。遷台前原有常務委員三人，一般委員七十七人；遷台之後，為替補人員流失，曾先後增聘委員四十八人。從 1958 年到 1972 年組織法修訂以前，委員會除了正

⁴ 根據該方案，總統府由原來的六局三室二處，裁併為三局四室；立法院則從原來的 21 個委員會合併為 12 個；監察院則同樣設立了九個委員會。見郭傳璽等（1993）。

⁵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1997）《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新店市：國史館。

⁶ 見郭傳璽、溫淑華、李友仁（1993）《中國國民黨台灣四十年史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⁷ 見中央日報（1950）〈爭取僑胞支持剿匪，僑委會不應裁併〉。二月五日。

⁸ 見張騰蛟（1988）《文學、藝事、外交：葉公超傳》。

⁹ 相關資料見陳樹強（1991），頁 180-182 之圖表。

副委員會因內閣改組而更動之外，其它委員皆一律留任。因此僑務工作往往徒具形式，工作能否突破和進展，往往決定於委員長一人。1972年僑委會組織法修訂，取消常務委員的設置，確立首長制的領導方式¹⁰。1981年修正組織法，副委員長增至三人，僑務委員更大幅度調至九十人至一百八十人，規定每年舉行會議一次。1998年，則更進一步修訂在重要地區設立僑務秘書的職務，以協助當地僑務之發展。

隸屬僑務委員會的核心組織，包含直屬的四處，分別掌管業務如下：第一處主政為「僑務管理」，包括華僑狀況調查，糾紛處理，僑團輔導、獎勵、補助；華僑回國接待；華僑福利；駐外僑務工作人員調配聯繫；區域性僑團聯誼等等；華僑國民外交活動輔導；華僑青年聯繫輔導；各國對華僑政策及法令之調查等等。第二處主政為「僑民文化和教育」，包括掌理海外華僑學校教育；辦理社會、職業教育、教育資源分享和輔導；以及推廣文教工作和傳播事業等。第三處主政為僑民「經濟和投資」事宜，包括獎勵華僑回國投資、協助華僑金融貸款、提供營運技術、研究企劃、加強僑商聯繫、促進各國貿易等等。第四處主政為輔助性的行政協助，包括文書、庶務、出納、檔案等等事宜。（cf. 陳樹強 1991；顏國裕 1991）。

除了上述僑委會核心組織外，另設有多個附屬單位，作為僑務工作推廣的工具（參見表一）。如僑民教育函授學校成立於1939年，創立之初原是提供海外僑教之教職員及僑社文教工作者提供進修之機會，授予所需的教學知識和語文訓練，以提高僑教之水平，故設有小學至高中之師資課程，共同科目為「三民主義」和「中國文化」。1956年在台復校，學員招收範圍擴展至一般僑眾，第一年人數便達到三千多人，以後年年增加，平均人數達七千人左右，1970年改名為「中華函授學校」，減低其政治性¹¹。華僑通訊社則為僑務工作重要的宣傳機器，主要報導時勢、「匪情」分析、以及僑社動態等，除發佈新聞稿之外，亦不時配合僑委會出版各類紀念特刊，如青年節、雙十國慶、蔣公誕辰等等，以及各類僑務立場的宣傳刊物、冊書，為保留僑務工作「記憶」的主要機關。僑園（華僑招待所）則是安頓各地「回國」觀光、考察、祝壽之僑胞「旅舍」，之後成為海外文教人員講習、研究和訓練僑生幹部的聚會場所。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主要針對海

¹⁰ 見楊建成（1995）附表二之整理。

¹¹ 見僑務委員會（1958）《僑民函校概況》；僑務委員會（1981）《僑務五十年》。函授學校由於是完全免費的，我和家中幾個兄弟姐妹曾經也是其中的學員之一，那時候只是小學生，由於家中中文閱讀書籍很少，也沒能力去消費購買，僅有的幾本故事童書只能看了又看，因此只記得當時覺得「世界上怎麼好的人，每月會定期且免費的寄講義給你？」現在雖然已完全不記得上過什麼課，但卻記得看過「國父」和「三民主義」的故事，而當時也並不知道這個「國父」和自身有什麼關係，一直到了高中因為唸了中國近代史，才知道國父為何許人也，後來在圖書館裡找到來自台灣的精裝本《三民主義》，我還很認真的看了一遍。

外普羅大眾，宣揚祖國、「認識自己」的輕薄刊物，透過小說般之情境設計，介紹各類主題，如《中國古代科學》、《台灣的糖》、《南洋小誌》、《我們的國旗和國歌》等等。僑生宿舍則與僑園類似，安頓尚未分發之回國僑生暫住。僑生輔導室則與「美援」僑教政策直接相關，包辦僑生入學、就學、生活、補助、學業、輔導等業務，為促進僑教蓬勃發展的重要組織。

表一、1949 年以後僑務委員會所屬機構簡歷

名稱	成立時期	沿革	簡史
僑民教育函授學校	1939 年 12 月		1956 年復校，施教對象由原來的僑教人員擴及各界，每年學員多達七、八千人，1970 年改名為「中華函授學校」，1978 年增設空中書院。
華僑通訊社	1941 年 4 月		1950 年 8 月於台北復刊，每週發通訊稿一到二次，供國內外廣播、電視和報刊使用，1979 年停止海外發行，改辦「海光週報」。
僑園（華僑招待所）	1952 年 8 月		位於台北市新北投泉源路，為接待歸國僑胞而設立，1998 年原址重建改稱為「華僑會館」。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1953 年 4 月	結束	為海外僑生課外讀物和海外教育工作者提供系統性之參考讀物，內容分十大類，依計為名人傳、地方小誌、華僑海外開發史、物產、自由中國、風俗習慣、一般基本知識及華僑姓氏先賢列傳等，共出版八十一種，印 267500 冊。
僑生宿舍/僑光堂	1953 年 10 月	結束	位於台北市基隆路，主要供應尚未分發就讀之回國僑生居住，並設立主任一人、輔導員三人。1968 年原址改建為「僑光堂」，1995 由台大收回使用，改名為「鹿鳴雅舍」。
僑生輔導室	1954 年 6 月		主要辦理僑生出入境、僑生接待、分發補助、辦理僑生補習班、洽給優惠匯率、徵求僑生師友、輔導課外活動、輔導僑生刊物、畢業僑生輔導等。
基隆港和松山機場華僑服務站	1954 年 5 月 / 8 月	結束	照料華僑來台出入境及過境華僑臨時入市參觀，曾委託華僑就國聯合總會服務社代辦，1979 年中正國際機場啓用後停設。
赴美特別審核委員會	1954 年 4 月	1956 結束	乃由僑委會連同外交部、台灣省保安司等機關，審核人民援用美國 1953 年救濟難民特別移民法案申請移民赴美。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1955 年 4 月	結束	乃聘專家對各地區國家收集史料編撰，計出版 11 個地區之誌史
僑生通訊出版社	1955 年 10 月		為鼓勵僑生研究和寫作興趣，砥礪僑生進德修業，乃設立「僑生通訊」刊物，每期出版四開一張，分送海內外。
資料室	1955 年 4 月		主要收集對僑務施政和僑務問題研究之參考資料。
華裔工作顧問委員會	1979 年 6 月	結束	設於僑光堂內，主要辦理海外華裔人士聯繫工作及回國服務事宜。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建立論述：鄭彥棻與僑務工作的「根據」

從遷台到 1951 年期間，僑務工作處於停頓的狀態，僅止於被動的解決因戰爭動亂引發的各類問題¹²。直到同年 4 月 16 日，行政院再次改組，提名有法國

¹² 例如 1945 年日本投降之後，當時一批僑居在印尼的「台灣籍」僑民共 242 人，被荷印政府視為是交戰國國民而將之拘禁於澳洲集中營，而後直接被押送返台，所有財務產業亦被政府充公，後經過各種溝通交涉始為復員。又如韓戰爆發，部分華僑因逃難撤退來台，由於財產皆毀於戰火，僑委會設法予與安置，隔年於台北泉州街興建「僑安里」，建造住房 44 棟安置僑胞 140 人。

巴黎大學法科研究院博士的鄭彥棻為僑務委員長、25日行政院會通過「反共抗俄時期的僑務政策」之後，政策執行才開始具有明確的指向。1903年出身於廣東省順德縣，高師畢業之後，即赴法國留學長達十年的鄭彥棻，早在法國，便是一積極的國民黨黨員¹³，1935年回國擔任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後相繼出任重要的黨政幹部。1949年1月蔣介石宣布引退，鄭彥棻接替吳鐵城，成為國民黨大陸時期末代的中央黨部秘書長，指導黨部南遷撤退的工作。

他原與孫科「太子黨」較接近，但遷台後因任教於「中央幹校」，而成為「蔣經國系」的一員。國民黨的改造，他也是「中央改造委員會」成員之一（陳明通1995:123），由此可知其在台北政壇的核心地位。在接任委員長以前，鄭彥棻便已擔任國民黨第三組海外黨務的主任，兼任至1960年才由馬樹禮接替，僑務委員長職務則於1958年由陳清文接任，轉任司法行政部部長。

在鄭彥棻掌政期間，由於僑委會編列人員較少、經費不充足，加上各地僑社政治局勢變化，如何讓僑胞「四海歸心」、支持反共大業，極為困難。但在1949年鄭彥棻擔任國民黨海外部主任時，便積極走訪菲律賓、中南美、加拿大和日本等二十個國家，整頓各地黨務。上任為僑務委員長之後，更積極建立僑務新論述。1952年，鄭彥棻出版《僑務問題的新認識》，對「反共抗俄」的僑務工作進行理論的建構，回顧長期以來華僑與祖國革命的淵源，談論現階段僑務工作之「根據」：

首先，自然是根據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和「建設台灣」、「準備反攻」的基本政策。其次，是根據當前華僑地位的重要及需求，這具體表現於左列的事實：

（一）海外僑胞人數在一千二百萬以上，比台灣軍民全數還要多出百分之五十。

（二）僑胞分佈全球各地，所有重要地區都有華僑足跡和他們的事業。

（三）僑胞在各地，由於多年勤勞奮鬥的結果，在經濟上和社會上都很有力量，尤其是在東南亞，若干國家的經濟事業，都和當地僑胞有密切聯繫；甚至對當地政治，僑胞也有相當影響。

（四）僑胞在海外由於遠離祖國，常受不平等的待遇和歧視，對國家觀念特別強。（中略）對繼承國父領導國民革命的總統，竭誠擁戴。

（五）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南亞各國相繼獲得獨立的地位，這些新興國家民族主義的發展，每流於狹隘的國家主義而有落干排外行動…（略）。

（六）…（略）起初他們由於共匪之虛偽宣傳，若干僑胞對共匪尚寄予希望，三年來的事實，已使他們由寄望至失望而絕望，共匪對僑胞直接和間接的迫害，更加深了僑胞的痛苦，從而促進僑胞的醒覺與團結。

（七）大陸淪陷之初，僑胞對政府不免失望甚至絕望，年來看到台灣

¹³ 見丘正歐（1982）〈彥棻兄與駐法總支部〉。

在萬難中站立起來，已重燃希望之火…（略）。

（八）韓戰爆發後，國際侵略與反侵略陣線的對立，已由冷戰進於熱戰，僑胞固然絕大多數支持民主與自由，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又使她們惴惴不安。

（九）目前僑胞在居留地被排斥、共匪迫害與第三次世界大戰威脅下，過著苦難的日子，處境之艱難，為前所未有，他們盼望祖國的富強復興來解救他們的苦難，也比任何為迫切…（略）（鄭彥棻 1953）

這九點「事實」是奠定戰後國民黨政府僑務論述的主要內容，其邏輯的建立是透過「界定」僑胞「本質」的方式，將海外華僑和「中華民國」政權加以縫合，完成「僑胞需要祖國」、「祖國需要僑胞」的真理。此種意識形態之建立，具體的方式如肥皂劇般，設計「加害者」、「受害者」以及「拯救者」的角色，反映忠貞善惡的倫理法則。因此，僑胞首先被刻畫為因勤勞奮鬥而取得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並且「遍佈全球」、「比台灣軍民還要多」，成為了慾望的對象；此時加害者開始出現，過去被認為應與之聯合、打倒帝國主義的「弱小民族」¹⁴，現在成為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用「排外」和「歧視」的方式，對華僑進行「加害」；更糟糕的是，被期望解救僑胞苦難的祖國共匪，從「三年來的事實」得知，僑胞已由期望轉為絕望，再加上第三次世界大戰引發的可能性，令僑胞不安，因此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僑胞必然「迫切」盼望祖國的強大，來解救他們於苦難中。但祖國如何才能強大呢？答案就是：自由祖國能夠「抗俄勝利」、「復國成功」。

如同「拯救大陸同胞」的論述，國民黨在合理化「反攻大陸」的政策上，不僅將中共非人化——出賣國家、淪為「俄帝」魁儡的盜匪，也將反攻大陸定義為世界反共鬥爭的一環，更將「解救僑胞於苦難」視為神聖的使命，由此確立本身存在的價值。

第二節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海外工作委員會

1947 年國民政府在內戰未解決以前，便頒布了「中華民國憲法」，正式由「軍政」、「訓政」，進入「憲政時代」。但在 1948 年 5 月，流亡至廣州的國民政府頒佈「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之後，仍恢復「以黨領政」的統治方式，爾後也把這套憲法制度帶到台灣，在「反共救國」的口號下、實行「黨政合一」的威權統治。因此，國府治台的模式，往往黨政同步、相輔相成。長期以來，主導和執行僑務政策的組織亦可分為兩類：第一是隸屬於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另一則是成立於 1924 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所負責的海外黨務委員會。據 1934 年的

¹⁴ 這裡指抗日時期的僑務口號，見楊建成（1995）。

統計，共有 18 個海外支部，黨員 10 萬人。1949 年遷台以前，黨員已近 23 萬。事實上，這兩個組織的目標相近，聯繫亦極為密切，曾一度合併至黨中央統一指揮，後因海外歸僑有異議而恢復分立，並延續到現在。

1950 年國民黨遷台，原在大陸的 1200 萬名黨員，隨政府來台的，僅佔 1.4%，計 168,000 人，而在海外的 12 個總部和 85 個支部，已失聯多達 38 個之多¹⁵。因此，1950 年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之後，爲了緊縮業務，便由第三組接掌前中央海外部的職權，主管海外黨務，並以鄭彥棻、李樸生爲正副主任，規定海外工作除了黨的組織、訓練和宣傳之外，還包括「僑民服務與僑民運動」，其中更指明須「辦理海外重要僑民社團及僑民之調查、聯繫、與國內僑團及有關機關之聯絡，與歸僑同志之服務，及有關僑民運動之策進等事項。」九月一日，中央改造委員會發表「本黨現階段政治主張」，對海外僑胞賦予下列期望：

我們對海外僑胞期待更是殷切。五十年來，海外僑胞是國民革命的裸母，抗戰期間，貢獻尤其重大。在今日，他們更深感家鄉鬥爭清算的痛苦，熱望祖國領土主權的恢復。我們認為政府對便利僑匯、解決僑胞子弟教育問題，應該盡速採取合理的措施。我們深信今日反共抗俄戰爭，必須得到僑胞熱烈的支持，今後復興建國事業，尤賴僑胞回國，在大陸飢饉荒涼的廢墟上，重新締造繁榮的自由的家國。¹⁶

國民黨改造作爲一種「由上而下」的革命運動（陳曉慧 2000），在短短的兩年之內不僅從流亡政權迅速地轉變爲組織嚴密的準列寧式政黨（林佳龍 1999），同時也鞏固了蔣介石作爲最高領袖的政治地位，形成了一元領導的黨政組織，有效的控制了本土社會（陳明通 1995；龔宜君 1998）。因此辦理黨員重新登記，篩選「信仰忠堅」的追隨者，也就成爲改革的第一步。1950 年 9 月通過「黨員歸隊實施辦法」和「原有黨員整肅辦法」，規定（一）凡脫離組織之黨員，未參加此次黨員歸隊登記者，一律撤銷其黨籍；（二）黨員登記日期爲 20 天，不得展延；（三）各主辦單位於登記結束後十五日內，應將報到黨員納入組織。此項辦法自 1951 年 1 月 4 日至 23 日實施，自動歸隊者有 20258 人。另外關於整肅原有黨員，規定（一）有叛國通敵者；（二）有跨黨變節之行爲者；（三）有毀紀反黨之行爲者；（四）有貪污瀆職之行爲者；（五）生活腐化、劣跡顯著者；（六）放棄職守、不負責任者；（七）信仰動搖、工作弛廢者；（八）作不正當經營，以取暴利爲目的者。永久開除黨籍 24 人、開除黨籍 94 人，但此種剛性而嚴密的組

¹⁵ 李雲漢（1994）〈海外黨務與僑聯總會〉。

¹⁶ 見李雲漢（1994）〈海外黨務與僑聯總會〉，頁 141。

織設計，若運用在海外必然會遭遇極大的困難（陳明通 1995）。

二次戰後的海外僑社，以東南亞來說，面對當地土著民族主義的挑戰，絕大多數的華人移民已開始體認到只有積極參與當地的政治活動，才能確保自身經濟和文化的自主性，不能仰賴遙遠祖國的保護，加上當地殖民政府在抗日結束之後，轉而取締國民黨黨員在東南亞的活動，也迫使國民黨必須由公開轉向地下（菲律賓除外），活動範圍遭受極大的限制（崔貴強 1989）。但另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歐國家，基於圍堵共產勢力的戰略關係，對於境內的國民黨勢力則極為放縱，留下了國民黨在海外的基礎，也種下了往後僑務爭議的伏筆（麥禮謙 1992；李明歡 2002）。但無論如何，鑑於海外情形的激烈變遷，改造委員會則針對海外黨務，另外規劃了「改造海外黨務基本三原則」，其中包括：

- （一）生新重於去腐：即擴大吸收新黨員同時，不急於淘汰原有黨員。
- （二）工作的加強重於組織的重建：以推動工作優先於重建組織。
- （三）因地制宜重於整齊畫一：依海外各地的實際環境，進行不拘泥於形式的黨務改造¹⁷。

在此規劃下，遷台之後的海外黨務，幾乎僅止於維持與黨員最低限度的聯繫，加上海外黨員多半是業餘參黨，與國內黨政利益較無糾葛，因此「腐惡份子較少」，只求能夠在不公開的、非組織化的方式下，達成黨的工作要求。其次，由於部分地區的政黨活動已被當地禁止，遷台之後的國民政權在國際地位上也搖搖欲墜，1949年11月，留在大陸的國民黨黨員便召開會議，宣佈蔣介石所領導國民黨之「黨統」已經滅亡¹⁸，更加深國民政府之危機。因此，在意識形態上其對海外黨員的要求也不高，只希望能盡量透過黨務運作，與僑社重新取得聯繫，「團結」廣大僑胞，策動國民外交活動，以爭取反共國家之友誼為目標。

然而，從黨務到僑務到外交，各方儘管可能達到相輔相成的合作狀態，但在海外敏感的政治環境中，海外黨務、政府的外交和僑務工作往往也容易產生矛盾和衝突。就以僑務問題來說，海外僑務工作的開展必須仰賴較具組織訓練的黨部作為工作之「內核」，然而在他人之境的地緣限制下，黨務活動若過度發展僑務，恐怕會引發外交上之危機。至於僑務工作與外交工作之間，其矛盾也往往直接對立，引起種種的問題。1953年國民黨第七屆三中全會通過「加強海外工作方案」，訂立了「以外交鞏固僑務、以僑務發展黨務，並以黨務為僑務核心，以僑務做外

¹⁷ 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1954）《四十二年海外黨務》，頁20。

¹⁸ 見于剛主編（1987）《中國各民主黨派》。北京：文史出版社。

交後盾」的議決，將僑務、外交和黨務視為三位一體，為爭取海外支持的管道。但無論如何，戰後各殖民地紛紛獨立，國家的建立也意味著進行「民族化」的工作，即便訂立各項可能的工作原則，不同類型之工作還是會持續碰撞，例如以 1956 年越南國籍法一案，盡管面對大量僑民出面干涉，外交部甚至也請美國介入斡旋，但在爭取反共政權支持的考量下，往往只能以外交優先，避免讓僑務影響國家利益（趙綺娜 2001）。

第三節 外圍組織：中國僑政學會、民族與華僑研究所、華僑協會總會等

一如其他的權威式制度，台灣的許多社團皆為官方製造的組織，扮演輸送帶功能，也是執政黨的輔佐工具。甚至有些為正式與國民黨形成組織關係的團體，仍然可能受到與國民黨有關聯的團體所控制，因而未能確立自主性。（田弘茂 1989，轉引自彭懷恩 1997）

從僑務委員會的設置到政黨機關的重整，大體而言，已完成僑務工作的基本架構。然而，就如田弘茂所提的，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除了透過各種國家機器進行直接的控制，以平行的黨務作為監控系統之外，更具有強烈的「國家統合主義」，透過扶植各種類型的「民間」社團組織，予以獨斷的代表權，來防止社會部門出現具自主性的代表，使之能不受任何牽制地進行利益分配（彭懷恩 1997）。然而，龔宜君也提醒我們，國民黨所面對的社會，並不是只是由本省籍人民為主而構成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作為一個外來政權，它還帶來一百多萬的軍民移入。故所謂的本土社會，並非由單一、同質的社會群體所組成，國家在面對不同群體所採取的方式和結果，也可能不一致，形成了不同的國家與社會關係（1998：18）。因此，由此切入，龔宜君認為相較於「分而治之」的統治方式，國民黨則以「集中管理」的方式來滲透軍公教部門、眷村、退輔會等等，使之成為國民黨的「鐵票部隊」，成為外來政策部份的社會基礎。

但國民黨的「治理性」範圍似乎並不僅止於「分而治之」和「集中管理」兩項。作為以「正統中國」自居的國民政府，海外僑胞的生活福祉亦是重要的關懷點，儘管國民政府已自身難保，對海外僑胞的困境大多數愛莫能助，但至少在「理論」上，僑政工作是「值得」重視和推動的。因此積極地推動相關研究工作，掌握華僑問題的「本質」，乃符合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因此，匯集各地學者專家所組成的「中國僑政學會」可說是僑務工作重要的外圍組織之一。1953 年 10 月 21 日於台北實踐堂舉辦成立大會，共有 200 多位會員出席，內政部長黃季陸、僑務委員長鄭彥棻亦到場觀禮，總統則以書面訓詞嘉勉。大會主席鄭公玄致詞時

便強調：

我們將本著學術的眼光，運用客觀的態度，努力研究有關華僑問題，希望政府和社會人士加以贊助，使我們運用群策群力的方式和力量，共同從事這項有價值的僑政工作¹⁹。

往後，中國僑政學會幾乎每年都出版一本《華僑問題論文集》，集結各學者專家和僑務工作者之文章，成為僑務工作重要的參考文件，並持續至今。從內容上來看，所謂的論文集，多為時勢評論，主題也十分駁雜，幾乎稱不上是有計畫性的出版，同時文章多半短小，作者重複率高²⁰，難說得上具有學術價值。但無論如何，論文集的定期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民政府所能掌握的僑情資訊，包括許多新趨勢的分析和各地政治局勢發展的報導，為僑務工作提供了可能的方向，掌握了新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象徵國民政府對僑務問題的重視。

其次，因擅長中國文史地理而為蔣介石所重用的張其昀²¹，1966年在陽明山創立了「中華學術院」，其中「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於1972年經教育部核准而開辦，內分兩組，民族組以民族學、邊疆少數民族、邊疆與鄰國關係、邊政問題為主，華僑則包含海外華僑（包括華人、華裔）為研究對象，以分部地區、發展歷史、社會生活、經濟文教事業、與祖國和僑居地之關係等相關問題為主²²，使之成為另一個制度化的華僑研究機關。簡單來說，民族與華僑研究院乃是平行於行政院之蒙藏和僑務二委員會，因此發展上亦受到二委員會之贊助，每年提供獎學金以吸引研究生，而相關主管人士亦可教授部份課程，畢業學員則有服務於僑務工作之機會，形成緊密的內部聯繫。1985年張其昀逝世之後，校方因經費有限而停辦。另外附屬於中華學術院之南洋研究所，在楊建成的領導下，亦系統性的將二零年代日本在南進政策指導下所出版的南洋研究叢書，翻譯成中文，並結合國內外相關重要研究之翻譯彙編，出版了「南洋研究史料叢刊」共26冊。

最後，致力於華僑論述的，還包括至今仍極為活躍的「華僑協會總會」。1942年成立於重慶，原名為「南洋華僑協會」，由吳鐵城、馬超俊²³所發起，後擴大

¹⁹ 中央日報（1953）〈僑政學會昨成立 總統頒訓詞嘉勉〉，十月二十二日。

²⁰ 透過中央研究院「台灣地區華僑華人著述資料目錄」資料庫進行查詢，得知共有文章597篇，並透過按作者排序則發現，文章數超過10篇者人數高達16人，五篇以上也接近10人。資料庫網址為<http://db1.sinica.edu.tw/~textdb/chinese/query.php>。

²¹ 為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秘書長，其後亦擔任教育部長、國防研究院主任（陳明通1995）。

²² 參考中國文化學院（1977）《中國文化學院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概況》。

²³ 兩人遷台之後被任命為中央評議委員，故屬於元老級人物，吳鐵城原為上海市市長，後亦擔任黨史史料編纂委員，1953年逝世。馬超俊則長期擔任中央評議委員，1977年逝世。

組織而更名，五十年來先後由吳鐵城、馬超俊、高信、張希哲、梅德培擔任理事長。該會以「聯合海內外同胞，互助合作，奉行國策，協力籌辦華僑事業，促進國內建設，並協和各友邦民族為宗旨」。1959年華僑協會為加強華僑問題之研究，聯繫海外華人文教事業，成立「華文文教事業委員會」，聘請專家學者李樸生等十餘人，籌劃出版「華僑問題研究叢書」，到1963年為止，先後出版了五冊。其後，在前僑務委員長高信擔任理事長之後，成立「華僑革命史編纂委員會」，費時數年，於1981年出版《華僑革命史》上下冊。1984年又出版《華僑名人傳》兩輯，共150篇傳記。1986年出版「海外華人經濟叢書」共十冊。1988年再出版了「海外華人青少年叢書」，以「中華民族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冀能薪傳於新生代華僑子弟、維持中華文化不墜為原則」，多達100冊，分為三大輯。2000年出版《華僑大辭典》，以利各方參考。除此之外，從1980年開始亦出版《僑協雜誌》季刊，每年四期，內容多半報導僑社新聞、時勢評論等。

除此之外，1988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集合相關學者，以蒐集有關海外華人資料、組織相關研究專家、出版叢書和舉行學術研討會為宗旨。1991年成立的「海外文教基金會」則以贊助出版居多，出版如《華僑學術研究叢書》等。

第四節 打造祖國與去疆域化：「讓僑胞高高興興的來，源源不斷的來」²⁴

在——細數各類僑務組織的設置和發展之後，最後綜合討論僑務工作的具體內容，作為本章之結束。前文提到，由於台灣並非主要的僑鄉，僑務政策乃是一種「橫的移植」，在體質上沾染濃厚的政治色彩，象徵意義極高，看似熱熱鬧鬧，卻如浮萍般，容易被歷史潮流所沖刷帶走。但這不意謂僑務政策並未落實在具體政策之上，事實上除了以輔導性的角度保持與海外僑團的聯繫之外，「僑生回國就學政策」和「僑資回國投資政策」都達到了實際的效果。到1972年為止，因應國內反對勢力挑戰而實施的「僑選立委遴選」，更使僑務工作直接成為統治壓迫的工具，埋下往後僑務工作的爭議。

1952年召開「全球僑務會議」之前，不少人便認為政府遷台之後，召開此種大型會議，恐怕出席者未必踴躍；再來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承認「共匪」而與台灣毫無邦交，在當地政府限制和共匪脅迫之下，出席會議恐怕會有問題；其三，當時政府財力人力有限，要應付會議開亦有困難。但在鄭彥棻的積極奔走之下，在兩個月內，全球僑務會議於十月二十一日於台北召開，邀情了216來自34個

²⁴ 蔣經國（1983）《蔣總統經國先生對華僑言論輯要》，華僑通訊社編，頁45-48。

地區的僑領舉辦一連十天的討論會議，會中除請各部會首長簡報「復興基地」台灣的基本情況、僑領各自報導僑情之外，更安排了「參訪祖國」的活動，讓僑胞見證「祖國的一切在飛躍進步中」。

此項會議奠定了戰後台灣僑務工作的主要基調——即**召開會議**。由於上述的全球僑務會議不僅促成了各地國民黨勢力紛紛成立「華僑救國聯合會」組織，隔年更進一步簽訂「華僑反共救國」公約，對所謂華僑反共做了國際性的宣示。自此之後，僑委會隔年 10 月 21 日即舉辦第一屆「華僑節」，並陸續在 1954 年召開「東南亞華僑青年問題研討會」、1955 年召開「華僑文教會議」、1956 年召開「華僑經濟檢討會議」等等，每一會議幾乎都大張旗鼓，邀請不同國家的僑社代表，針對不同主題進行分組協議，最後達成會議共識，會後再接受祖國「招待」、集體「南下觀光」。事後將會議的籌備過程、出席情況、會議結論、參訪祖國觀感以及中外報章媒體之反應等等文字，集結出版，留下「歷史」的見證²⁵。

除了積極輔導華僑團體進行政治動員和製造「四海歸心」的集體儀式之外，僑委會對於華僑教育問題亦極為重視。王賡武（1986）在研究新馬華人社會的民族主義發展時，曾指出影響南洋華人對中國事務有所反應的，主要是透過許多中國南來的知識份子，透過出版中文報刊、雜誌和書籍等媒介的方式提高華人的政治意識，同時許多知識份子若不是棲身於報刊主編，則是任教於當地華文學校來發揮影響力。當時在南洋華人普遍上教育程度不高的時代裡，這些南來的知識份子不僅成為中國文化在南洋的擔綱者，也提供「作為中國人」所可能的民族想像，影響南洋華人對祖國的態度。因此，可以說民族文化的教育乃直接影響了政治認同的可能，故鄭彥棻便曾提出所謂「無僑教即無僑務」的口號，強調僑教在僑務工作中的重要性。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僑教政策」也就構成了僑務工作的主要核心。1950 年，教育部公佈「僑生投考臺省專科以上學校優待辦法」，讓畢業於海外僑民中學、臺省籍學生畢業於日本五年制中學，和畢業於港澳僑民中學的學生投考並「從寬錄取」；隔年又頒布「華僑學生申請保送來台升學辦法」，以 100 名為限、每間學校保送以不超過 3 名為原則，但收效有限，同時大多數「報名踴躍」者都來自港澳地區，多半均由大陸而來，不能視為「僑民」²⁶。根本決定日後「回國僑生」政策能蓬勃發展的，是 1955 年美國決定支持台灣辦理僑教的開始²⁷。自此之後，

²⁵ 事實上這並非國民黨之專利，中共在建立政權之初，亦以相同的手法邀僑胞回母國參訪，因此，兩個政權較勁意味濃厚（cf. William 1966）。

²⁶ 例如 1951 年開放 60 名保送名額，但只收了 27 名，第二年開放保送 100 名，只來了 42 名。見教育部長程天放於全球僑務會議之報告，收錄在《僑務會議實錄》（1952）。

²⁷ 關於美援僑生教育的背景和過程，詳細見陳月萍（2004）。

原本因緊縮編制而裁撤之教育部「僑民教育委員會」，也鑑於業務日益繁忙而於同年恢復設置。從 1955 年到 1965 年美援結束，旅費的補助和就學期間生活費之支持，十年來成功吸引了兩萬餘名來自世界四十個不同國家的學子，並斥經費高達兩億新台幣和美金一百萬。因此為爭取校內硬體設施的經費補助，各校紛紛提高僑生就學名額，奠定了日後僑生「回國」就學政策的基礎²⁸。

在鼓勵華僑回國投資方面，1952 年頒布「鼓勵華僑及旅居港澳人士來台舉辦生產事業辦法」、1955 年頒布「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惟當時台幣匯率偏低、原料不足，加上台灣的生產事業，除了農業部門由島內居民主導之外，其他工礦事業多半為公營企業，產品銷售市場有限，直至 1959 年以前，僅有 52 家投資案成功引進。到了 1960 年，配合第三期的四年經濟建設計畫，便修定原有的投資條例，將投資範圍擴大，如銀行等服務業，更進一步放寬資金調度，包括轉移、結匯自由，加速審核時期、簡化入境手續，甚至超過一定投資額可暫緩兵役等等。自此之後，回國投資率迅速成長，先後成立了華僑銀行、華僑物產、華僑人壽等等，並且在政府的許可下，華僑投資多半集中在服務業和輕工業²⁹。截至 2003 年底，共有 2815 筆投資案，吸引資金三十九億九千一百六十八萬，佔僑外投資的 7%³⁰。但無論如何，即便在七零年代僑資最盛的時期，僑資也只佔國內的資本形成的 0.6%、GDP 的佔 1.4%、出口貿易佔 2.8%、就業機會佔 2.5%（見杜巧霞 1993）。

從「回國開會」、「回國就學」到「回國投資」，戰後處在不同國家關係中的僑務工作，在國家主權的限制下，往往只能透過非政治的方式保持與海外僑民的關係。事實上從國際比較的觀點來看，此種強調血緣文化的海外動員，對於擁有大量海外僑民的國家來說，都是一筆可觀的社會資本，並且隨著交通和通訊科技的發展與廉價化讓人的移動越來越可能，也使得許多國家開始學習制定各種「僑務政策」，以利國內的政治與經濟發展。但對於國民黨來說，「華僑政策」更具有其他的戰略意義，因為除了在文化傳承、經濟發展之外，華僑也被視為反共復國的三大力量之一，到了七零年代為了維持其政權的「法統」，「遴選僑選立委」儼然成為僑務「工作」之一，形成了原本應被監督的行政部門，卻反過來挑選監督者的怪異現象³¹。

²⁸ 有關僑教政策的進一步討論請見第五章第四節。相關史料可參考郁漢良（2001）《華僑教育發展史》；李靜兒（2004）《近半世紀的「華僑」教育（1950-2000）》。

²⁹ 參考華僑革命史編纂委員會（1981）《華僑革命史》。

³⁰ 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03）《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對外投資、對大陸投資統計年報》。

³¹ 但無論如何，在華僑主動爭取之下，「華僑參政權」早在民國建立之初就已確立，並且進一步

從 1972 到 1989 年的「增額立監委選舉」，乃是國民黨因外交節節敗退而用來補救其統治危機的一種措施。在臺灣的政治發展史中，1972 的政治改革被認為是在既有政治結構下的一種「台灣化」，即擴大「自由地區」在中央民意代表中的比例，以進一步取得「自由地區」人民的支持。但為了堅持「法統」的一致性，在大陸地區無法進行選舉的窘境下，原以地區性作為劃分的立委、監委選舉，只好以不同「籍貫」的海外華僑作為替代品，並且在無法克服選舉技術的難題之下，由總統「遴選」的方式來產生³²。從 1972 到 1989 年共選出六屆的遴選僑委、三屆的遴選監委，在人數比率上平均佔增額立委人數的 27%，遠遠高出過去憲法保障下的 2% 到 5% 的原則（楊建成 1992：77）。由於遴選工作由僑委會所主導，之後再由總統從名單中挑選，使得僑委會變相成為具有參與立法操作能力的行政單位，而被遴選的立委也就成為「海外投票部隊」。或許就如楊建成（1995）所認為的，遴選立委可謂「平衡台灣民選立委衝力，確收到緩和政局發展的效果」，但如此不合體制的制度設計，也埋下了解嚴之後的憲政爭議。

戰後台灣所實施的僑務政策，套一句「讓華僑高高興興的來，源源不斷的來」的政治口號，已能抓住其主要方向，從回國開會、就學、投資到參政，僑務工作可謂為一種拉攏海外僑胞，竭盡所能與之保持聯繫的政治工作，其後更「特化」成為壓制國內異議的統治工具，而與國內複雜的政治局勢相互牽扯，在不同的歷史認知和利益矛盾之下，埋下政治爭議的伏筆。但必須注意的是，儘管國民黨長期以來視「僑務政策」為政權保衛的重要指標，不斷地招攬僑胞回國達到政治宣傳的效果，但在實際解決僑胞問題之上，由於台灣地狹人稠，在撤僑問題之上、或是「回國定居」的問題，仍是堅持緊縮政策，以減低人口負擔的壓力（William 1966）。

影響至憲法的制定（李盈慧 1995）。但除了任務型的國民會議因將選舉地點設在國內並以間接選舉為原則，方能順利產生代表之外，1947 年行憲之後所欲舉辦的僑民選舉，在直接選舉的原則下，其中一半以上的區域（國大代表 65 名額只選出 22 人，立委 19 名額選出 8 人），或因遭受當地國的壓力、或是分佈太廣使選務執行不彰等，使得僑代選舉從一開始就因技術問題窒礙難行（楊建成 1992）。

³² 根據「動員戡亂時期僑選增額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遴選辦法」，遴選工作委員會乃由「僑委會」和「有關」³²機關人員組成，全球分為東北亞、港澳、亞洲其他地區、北美和中美洲、歐洲五大選區，並以「調查」、「訪問」和「座談」方式彙集審核遴報人選，而「遴報」名額以該地區「遴選」名額之兩倍為原則。遴選條件以中華民國人民在國外地區僑居五年以上，現仍在當地居留；政治立場為「反共愛國」，在僑居地有影響力，遴選後能回國行使職權者，見華僑救國聯合總會（1973）《僑選增額立監委遴選》。

第五節 本章結論

僑務工作乃是極為複雜的政策。為避開政策描述的繁瑣雜亂，本文從組織的面向切入，透過描述各類僑務組織的遷植與發展、其主要功能和角色，以瞭解「僑務」作為國家所主導的政治意識型態，其如何在這些制度支持之下，建立一套完整的政策與論述。

這些組織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國家正式的官僚機構，以「僑務委員會」為主要核心。在遷台之初，僑委員原計畫被裁併，後因引發爭議，故以保留其名義為原則，由外交部長葉公超兼任。「僑委會」原屬於集體領導制，但遷台之後委員幾乎留任不動，多數工作由委員長所主導，圖存名譽。委員會下設四處，分別掌理僑團組織、僑民文化與教育、僑民經濟與投資、和僑務行政。其下設有多個非正式的組織單位，包括函授學校、通訊社、華僑招待所、僑生宿舍和輔導室、刊物編委等等。第二類主要是黨務系統下的海外工作。大體而言，在新興的後殖民國家當中，國民黨在境內之勢力已遭受嚴重取締，往往只能轉為地下組織，效果有限。但許多社會相對開放的歐美國家，由於其境內的國民黨勢力多半未加干預，因此戰後海外黨務開始往歐美傾斜。黨務、僑務、外交分屬不同層級，也有衝突的時後，但主要以「黨務」為核心。第三類則是屬於僑務工作的外圍組織，其主要功能是「研究與論述」。例如「中國僑政協會」便以每年出版論文集為己責，探討海外僑社的種種「問題」；「華僑研究所」也以研究華僑歷史、文化、政治和國家政策為主，將華僑問題與祖國進行理論上的聯繫。其他外圍機構還包括許多民間的僑團，如規模較大的「華僑協會總會」，以贊助各類華僑刊物為主。

最後，本文認為，戰後僑務工作的基本形式，主要爭取僑胞「高興興的來，源源不斷的來」為主。從回國參訪、回國投資、回國升學到回國參政，透過種種各項制度的設計，國民黨試圖將台灣打造成為海外華人「真正」的祖國，是保衛中華文化的最後堡壘。但必須注意的是，儘管國民黨視「僑務政策」為影響政權生存的重要指標，而熱烈歡迎僑胞回國，但是由於台灣地小人稠，國民黨在接受僑胞「遷居回國」仍是以緊縮政策為主，因此不管是面對難民撤僑或是接受僑胞回國定居之上，主要抱持消極的政策。

第四章 流亡中的祖國：論僑務政策中的意識形態

每一種意識形態都試圖一到至今每一次都失敗—將共和國的分類目錄弄清楚，為其事業命名、賦予其政體意義和目標。這是一個充滿混亂開始和瘋狂修正的國家，痛苦的尋找他們想像中的政治秩序，但卻像是海市蜃樓，越是渴望靠近，消失得越快。所有這些挫折中救贖性的口號便是：『革命尚未成功！』，而且，確實如此。但這只是因為，沒有人知道，即使是吶喊得最大聲的那些人，也不知道該如何準確地完成工作。（Geertz 1999：265）

相較於其他因冷戰而分裂的國家，台灣最大的特色在於，國民黨政權並非源自既有的地方勢力，不具有地緣性的權力基礎，因此至今流行的說法，乃將之指為「外來政權」、是一種「移入殖民」、「無母國的殖民主義¹」。不管這樣的界定是否全面，無可否認，國民黨（至少從歷史的軌跡上來看）是一個經歷了長期革命建國，卻終歸失敗，失敗後卻又未滅亡殆盡，在國際詭譎的政治算計下，苟延殘喘的「流亡政權²」。

將國民黨界定為「流亡政權」，首倡者為趙彥寧（1998）針對外省第一代研究提出的一個概念。趙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便是流亡者本身，也繼承了正統國家論述所界定的象徵秩序，而「偏又不知道這叫做逃難」（2002：51）。然而對於大部分低下階層外省遷台者的經驗來說，顯然那是一種「流亡」的歷程，卻尚「未能對應於流亡的象徵秩序，因而形塑了特殊的流亡敘事」（趙彥寧 2002：48；2000）。所以我們要進一步提出疑問，內在流亡的政權又是如何創造一齣「非流亡」的政治劇碼、一齣可想像的象徵秩序，來應付現實的處境？帶著濃厚歷史傷痕的統治政權，究竟會如何面對自己、看待未來？如何為其政體賦予意義和目標呢？在風雨飄搖中，「意識型態」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象徵秩序？如何被內部消費？乃是本章想要處理的重點。

本文對「意識型態」的界定，主要是採用 Geertz（1999）的看法，即：其非馬克斯傳統下的「虛假意識」，也非涂爾幹眼中的「集體良識」，而比較接近於韋

¹ 例如龔宜君（1998）便以「外來政權」和本土社會的角度來探討國民黨「鐵票部隊」、或說社會基礎形成的原因和歷程；而 Wu（2002）以「settler colonialism」、「colonialism without mother country」、即楊聰榮（1992）以「無母國的殖民主義」來定義國民黨的移入；或是如廖炳惠（1994）所界定的一個「遙控但卻沒電」的國族政權。

² 本論文深受陳光興（2001）對國民黨政權分析的影響。陳將國民黨界定為「全球冷戰體制下的流亡政權」（a defeated regime escape from the Cold War Structure）。相較於趙彥寧對「流亡經驗」的強調，陳光興則強調「冷戰結構」對台灣的決定性影響，作者提到：「這種反共復國的夢，是在全球冷戰結構下支撐起來的，特別是受到美國軍事及經濟的援助。」因此，本章以分析「流亡」面向為主，第五章則是以分析「冷戰」面向為主。

伯的看法：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爲了把握「真實」而努力建構的一套符號體系，是人類面對不確定的情境中，被重新組合和發展以「抓住」不確定的真實，減低困惑、疑懼和無力感的意義建構。就如 Geertz 所說的，「正是在情感或地形不熟悉的地方，人們才需要詩歌和道路圖。」（1999：261）。因此，沿此邏輯，意識型態可以成爲「蠱惑人心」、使人接受召喚的政治神話，但也可能成爲一種象徵的政治秩序，提供政權「內部消費」的一項產品（Merquior 1979：29）。另一方面，這裡所謂的「流亡政權」，是廣義地泛指追隨國民政府赴台、具大陸戰亂經驗、附和以蔣介石爲主的統治政權，並且在領袖圈定的範圍內，擁有一定政策權力規劃的一群人，而非狹義的指最高領導人。故這裡的意識型態分析，是針對此政權的集體性格和文化分析，而非領袖的個人心態和統治風格的詮釋。

本章的論點主要認爲，「僑務政策」對於國民黨政權來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方便手段」，在混亂的流亡情境之下，提供了政權所需要的象徵秩序。這套秩序透過將政權界定爲華僑祖國、自由中國、正統中國的方式，安撫了焦躁的集體意識，透過「忠貞」僑胞的年年參訪、僑生回國升學、僑商回國投資，將廣大的海外華僑視爲「政治腹地³」來積極耕耘。但無論如何，僑務政策最終只是一種供「內部消費」的意識型態。建立在上述的基礎上，本章將分爲四個部份，依序討論象徵秩序的建立、象徵秩序的操作以及象徵秩序的實體化，最後進一步從符號學的角度，說明「華僑」作爲群體的稱謂，乃是建立在對主體的「誤認」之上，而非其實質內涵。

因此，本章第一節首先分析國民黨作爲一「流亡政權」，如何透過對「萬惡共匪」和「愛國華僑」的摹擬性能指複製，在全然否定現存的物理空間之下，創構對流亡政權和流亡主體本身具意義性的象徵秩序。第二節則說明此種重新建構的象徵秩序，如何透過各種統計數字、國家儀式和「問題」的認定，發揮制度性的魔力，讓僑胞能「看得見」。第三節則分析長期以來僑生回國就學政策，如何透過教育制度的潛移默化，如何使僑生轉變爲僑胞，製造一批批「新僑胞」。最後在第四節，則借用分析哲學中「僵固指涉」（rigid designator）的概念，與所謂的「稱謂問題」進行對話，討論「華僑」一詞的使用，如何構成戰後僑務論述的主要骨幹。前面三個部分主要透過不同的切面，分析僑務政策中意識型態的運作邏輯，最後一節則主要從符號與意義的角度，與稱謂問題進行對話。

³ 亞洲週刊（2004）〈華僑抉擇預示兩岸未來〉。

第一節 「萬惡共匪」與「愛國華僑」：流亡政權的模擬性複製關係

當台北市地圖變成了中國的縮影、全島各地都佈滿了「蔣公銅像」時⁴，「流亡政權」帶著戰敗的恥辱，透過手中所掌握的官僚機器，製造出一波又一波的政治神話，全面散佈在台灣地理空間之上。在這些大量的政治人造物之間，有兩種「看不見，但存在」的政治人造物—即「萬惡共匪」和「愛國華僑」，並分據於好惡光譜的兩個端點之上。本節試圖透過兩者的比較分析，並進一步說明華僑論述如何國民黨象徵秩序的一部份。

1946年內戰全面爆發之後，蔣介石偕宋美齡到台灣巡視，曾說道：「台灣尚未被共產份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范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國家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呼！」⁵顯示蔣介石出早有遷台之打算。1948年12月24日，剿匪總司令白崇禧密電蔣介石，表示軍事失利、要求和談以爭取時間，三天之後第一批故宮文物遷運台灣⁶。隔年元月21日，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宣布下野，但同時宣布人事任命，頒佈陳誠為台灣省主席兼任警備司令、蔣經國為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2月10日派人到上海將中央銀行所有庫存黃金搬運到台灣，2月22日第三批故宮文物抵台，6月25日台北草山設置「總裁辦公室」，12月9日國府正式遷台。隔年3月1日蔣介石回復總統職務，6月25日韓戰爆發，第七艦隊抵達，台海危急暫告一段落。這一年，蔣介石63歲。

從上述的過程來看，國府遷台的過程即非長期的縝密規劃，也非在敵軍壓境之下的倉皇流亡，使得遷台之後的國民黨政權，不至於成為一般意義下的「流亡政權」(government-in-exile)⁷，也不足以靠自身力量反攻大陸，使得其看似「風雨飄搖」、「滿目瘡痍」，卻又「專斷橫行」、「無堅不摧」，成為能牢牢控制台灣軍民，卻又無能反攻大陸的畸形政權。凍結在國際冷戰結構的處境下，流亡政權長期處在「中介狀態」(liminal stage)，即便是擁有無上權力的統治者，也都卻缺乏足夠的安全感，因此每每顯得敏感多疑、對人民不信任，往往滋生許多迫害心理和妄想症狀(葉啓政 1995: 68)。

⁴ 根據作家林雙不，台灣島上大約有四萬五千座蔣介石銅像。轉引自李筱峰(2004:119)。

⁵ 見張其昀主編(1984)《先總統蔣公全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第二冊2284頁。

⁶ 蔣復聰(1977)《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商務印書館

⁷ 這句話的假設是建立在台灣內部已經產生一股具地方基礎的政治勢力，可以安定政局。但根據戴國輝(1989)的分析，台灣當時並未能產生地方性的政治勢力。但是即使當時未能產生，若蔣介石未率兵前來，可能的情况是，台灣被中共解放，另一種則是美國及時扭轉其放手政策，派兵阻擋共軍渡海，並扶植台灣本土政權。這當中，約有六個月的時間落差。

在此心理壓力之下，其抒發之手段乃是不斷地「瘋狂修正」：揪出敵人、消滅異己；強調忠貞、需索擁戴，透過強烈的愛與恨的交替，反覆體驗和咀嚼之中，流亡政權全面否定了眼前台灣的物理時空，反而不斷複製過去所認同的種種象徵秩序（趙彥寧 2000）。棲止在流亡狀態之下，現世時空變得本質空無，國家和主體的認同唯有透過「摹擬性之複製關係」：即依附在一適當之物（object）之上，才能創構主體所能理解之情境（趙彥寧 2000）。

由此看來，對於國府政權來說，「萬惡共匪」和「愛國華僑」或許就是分別據此「適當之物」光譜下的兩個極端，透過不斷地「填滿」本質空虛之能指，流亡主體不可自抑地自我複製和自我消費。

因此，如果「愛國華僑」是一種所指空洞的回溯性僵固指涉⁸，則無獨有偶的，「萬惡共匪」同樣是「無法被定義之敵人」，其所指空洞，或至少，並不穩定，使之具有被任何所指填塞的可能（趙彥寧 2000；曾薰慧 2000）。相對於「匪諜無所不在」，卻是必要之惡，因此必須要透過精密的「辨識系統」的建立，以「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的口號，達到「政治獵巫行動」的效果（曾薰慧 2000）；則「愛國華僑」亦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僑」，是必要之善，因此必須要透過創造性的「模糊系統」，以「四海同心、天下歸心」的口號，達到「政治法統補強」的效果。因此，相較於對匪諜的「規訓與排除」，華僑則是「服務與納入」，前者惡之欲其死，後者愛之欲其生；前者是可恨的共匪，後者是可欲的僑胞。在此情況之下，相對於五零年代之「匪諜無所不在」，僑胞則是需要「源源不斷的來」，不僅回國開會、投資、升學、參政等等，如何再現其「光輝的歷史」、「優良的革命傳統」，將之擦亮發光，亦是僑務工作的要務之一。因此，戰後在台灣有關華僑歷史與社會的著作，便「像流水般」（王賡武語）不斷出版，但內容上卻往往千篇一律。

華僑足跡遍天下，他們在海外筚路藍縷孤軍奮鬥所建立的事業，實在就是中國人的海外事功。他們在異邦建立起來的各種事功，已有千百年的歷史，但他們不同於十五、六世紀歐洲帝國主義的國家，由政府有計畫的移民拓殖，或以軍事、經濟的力量，具有侵略性質。相反，華僑以個人辛勞的血汗事蹟，為世人所崇敬，由於這些顯著的事業，說明華僑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光輝的一頁，即在人類歷史上，他們的活動，也是一頁不尋常的記載⁹。

我們追溯華僑移植海外的悠久歷史，真不勝感慨繫之！早在十世紀以後，我國東南沿海的對外通商已漸發達，工藝製品極為精良，馬可波羅遊記，譽為黃金世界，十五世紀初，鄭和七次出海訪問亞洲各國，

⁸ 此點分析見本章第四節。

⁹ 摘自華僑革命史編纂委員會（1981）《華僑革命史：序》，頁壹。

遠達非洲，其艦隊陣容之壯大可稱空前，比較西班牙無敵艦隊早一個半世紀。當時亞非各國對於中國文物之盛，無不稱羨，假如明清兩代不實行閉關愚民政策，中國當已進入工業革命階段，必能抵住西歐殖民主義之東侵，那麼亞洲各國或不至於全部淪入殖民地的地位，而早已奠定了獨立建國的基礎，整個世界歷史也將改觀了¹⁰。

但象徵劇碼的最高潮，更在於所恨之共匪間接地「禍害」所愛之華僑，透過強烈的反差設計，情緒結構被帶到最高點。

過去以富庶繁榮著稱的廣東四邑僑鄉，經過中共五年暴虐統治的結果，目前唯一突出現象，就看不到一張笑臉，也找不到一個營養充足，精壯愉快的人。除了共幹外，所有的人都是面黃肌瘦，愁眉深鎖，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誰也知道這是中共施行無窮壓榨、迫害、管制的最大表現。目前四邑是怎樣的面目呢？從江門來人所透露和各方面報導的翔實資料，說明四邑現已變成一座飢餓、貧窮、冷寂、混亂而充滿恐怖氣氛的人間地獄。僑眷和歸僑都在這個活地獄裡受剝削、熬煎、鞭撻、奴役和殺戮的刑辱¹¹。

飢餓—貧窮—冷寂—混亂—恐怖、剝削—熬煎—鞭撻—奴役—殺戮，五零年代國民黨的在前方戰事稍歇之時，開始展開激烈的意識型態宣戰。如流水般不斷出版的各類反共宣傳品當中，黑暗與光明、正義和邪惡的本質對立，透過上述能無限延伸的轉喻鍊，生產大量的象徵動力，散佈在現實的地理空間中，公開地被想像和消費，企圖將怨恨轉化為巨大的政治能量，箭已在弦上，反攻必然，必然反攻。但是當此強大的心理能量遲遲發動不了，在現實中遲遲反攻不了的情況出現，又如何尋找情緒發洩的舞台，能與共匪一較高下、決一勝負呢？答案或許就在於不斷地（無聊地？）「再現」匪區各種泯滅人性的惡形惡狀，透過對善良百姓、純淨女體、愛國僑胞與邪惡匪幹的「短兵相見」，延續尚未完成的決戰。然而，畢竟共匪是本質上的虛偽與惡毒，手無寸鐵的善良人命，往往最後只能以自殺作為最激烈的抗議。

答：不錯。他對中共是無微不至的。可是共幹們對於他並不放鬆，「認為他還有許多現金沒有拿出來，唆使鄉中地痞流氓向他清算，終至把他逮捕下獄。（中略）他想起了在獄中所受的磨折，想起了中共狡詐的殘酷陰險，想起了財產損失的鉅大，悲憤之餘，他便不想再活下去了。準備拼掉老命，給共幹們以較大的報復」。

問：周老華僑，是怎樣地報復共幹們呢？

答：「他把一家六口人都帶上碉樓，緊閉所有門窗，等到翌日中午，共幹們見他還未送款前來，即派人率民兵一隊，前往追索，乃誘周老華僑開門，遭周斷然拒絕。中共乃改用強硬辦法，把禾草搬至碉樓四周，揚言在十分鐘不開門，即舉火焚燒」。

問：周老華僑，在這時期怎麼辦呢？

¹⁰ 摘自李默真（1962）〈華僑社會「落葉歸根」的思想〉僑務月報第114期。

¹¹ 海外出版社（1955）《共匪禍僑實錄》。

答：「周不但不怕，而且把二三樓酸枝傢俬，搬上頂樓，先用火水淋濕，自動引火焚燒，隨即把五百元一張的港幣五萬元，持向樓下的共幹和民兵們大叫，他說：『五萬元的港幣，這是我的現金，但決不讓你們共產黨取得一分一文』。隨即將港幣逐張投向火裡，投一張，痛罵共產黨一次」。

問：燒完了以後呢？

答：「他先把老妻推入火裡，自己縱聲大哭，跳入火內。其餘四人，也被延燒，同歸於盡」¹²。

在此，不管是反抗或是靠攏，僑胞在共匪殘暴的殺戮政策下，無一得以倖免。如果說身體感官，對於流亡主體來說，是處在本質空洞的流亡情境中最後一道意義能指的負載體（趙彥寧 2000），則當這最後一道防線也被衝破，意義的創構和複製也就嘎然而止，死亡的黑洞開始吸收過渡膨脹的心理壓力。因此，在「萬惡共匪」敘事建構中，「死亡暴力」可謂為剔透其邪惡本質的重要曲目，各種駭人聽聞的殺戮、凌虐事件被編輯成冊，重複而公開的展示。此種赤裸的暴力再現，與其說是揭露共匪泯滅人性的惡行，倒不如說是抒解敘事主體溢滿的情緒壓力，透過無數善良老百姓的斃命或自殺的情節敘述，釋放了意義主體適度的能量，與此同時，也生產新的意義感與道德使命：解救大陸同胞刻不容緩。可惜這股正氣之聲仍然需要透過象徵舞台來實現，因此在氣餒之餘，亦會出現大快人心的橋段：

「中山大濠鄉歸僑黃耀南，被共幹們指為大地主，經過三番五次的殘酷的鬥爭，黃夫婦均被死神絆住，死于非刑。黃有子名伯強，向在江門經商，深恨中共暴行，決心報復，潛在鄉中，匿居一久無人居之破屋內，及至深夜，潛入鄉長何純住宅，將何純及其妻子五人，一一刺死，安然離去，並於純牆上，貼紙條一張，寫著『為國除奸，為家報仇』八字，再下署黃伯強三字而去」。（註三十一）¹³

究竟上述的「匪區報導」是否全屬虛構和想像？與反共文學在文類上相異的是，這些反共文宣往往透過註解出處，來顯示其「真理性」，在一本《共匪禍僑實錄》的前言裡，編者便強調道：

我們一向對匪情的報導，是秉著「有一句話說一句」的作法，從未加以渲染。所以本書所採用的資料，多數是摘錄匪方出版的報刊，或是根據逃出鐵幕人士的口述，歷歷可考，鑿鑿有據。我們的目的，是要拿出這些千真萬確的事實，來揭穿共匪那些美麗動聽的謊言，戳破他們那副假裝善良的臉孔。如果因本書的出版，而使我海外僑胞更能認識敵人，痛擊敵人，以發揮救國自救的偉大力量，那更是我們深切的願望¹⁴。

¹² 振冬（1953）《中共怎樣對待華僑？》，香港：友聯。

¹³ 振冬編著（1953）《中共怎樣對待華僑？》，頁 37。

¹⁴ 海外出版社（1955）《共匪禍僑實錄》。

然問題並不在於其談話內容的真實性，而在於發言者究竟是誰、論述如何被劃定範圍與分配散佈、其如何被關連至其他論述，以及最後如何被系統化和制度化，並且散佈在特定的空間之上 (Foucault 1991)。五零年代國民黨對共匪的深惡痛絕，對其暴力野蠻、去人性化、虛情狡詐的再現，事實上已經超乎「同為中國人」的想像，而近乎一種集體對「邪惡」的建構：對敵人以大量的幻想和歇斯底里的再現論述，得到某種程度的發洩 (曾薰慧 2000: 82)。在此情況下，處於光譜另一端的「愛國華僑」，自然必定站在正義、光明、純淨的反共陣營上。1950 時任僑務委員長的鄭彥棻 (1953: 15) 在造訪各僑社之後，回國後便公開的宣告：「關於僑胞的愛國熱情，我可以很興奮的說：除了極少數喪心病狂的匪諜和盲從份子之外，僑胞沒有一個不是愛國的、沒有一個不是反共的、沒有一個不是效忠總統的。」透過不斷的見證 (到僑居地拜訪) 與不斷地號召各種形式的「回國」浪潮，國府在失去了以血緣文化作為方便的動員工具下，只能以蒼白無力的反共與再反共，訴說著永遠無法完成的革命。

第二節 看不見的存在：僑務統計、國家儀式與生產「問題」

現在社會對僑務有一種洩氣的想法：認為海外華僑紛被迫入籍，將來就沒有華僑。根據這大前提又產生一種想法：沒有華僑就沒有僑務。我的見解完全不同，我一向認為華僑與祖國是放風箏的關係，手中常牽一線。有時風箏被掩在深林幽谷裡，似已消失，但把線一拉，或風力較強的時候，風箏即飄然而起，露現於碧空雲海之間，傲視塵寰。華僑轉籍，不是華僑社會的縮小，而是華僑社會的擴大。沈下去不是消失，不久又會以另一姿態浮上來¹⁵。

學者 Ien Ang 第一次在台灣旅行，被人自動地認作為僑胞，引發她對所謂華人性 (Chineseness) 的公開詰問，而展開對「一日為中國人，終生為中國人」的無上命令 (imperative) 進行挑戰¹⁶。Harrell (1999) 在討論中國民族主義中的血緣召喚 (genealogical appeals) 時，也舉出類似的親身經歷：一個第一次到台灣旅遊的美國華人，卻很自然地被問道「你回來多久了？」。類似的小故事俯拾皆是，在報章上常常能看到某某著名的華裔科學家載譽歸國的訪問、或是新產生的華埠小姐回國參觀等等的新聞，儘管對他們來說，那是第一次到台灣，卻說明了在國民黨長期主導下，以中國為中心的民族論述，已成為社會意識的基本結構。這樣的一種民族界線的預設，究竟如何完成，要如何讓看不見的東西能夠看起來「存在」？乃是本節討論之重點。

¹⁵ 香港華僑日報 (1964) 〈華僑乃革命之母〉。一月二十三日。

¹⁶ 參考 Ien Ang (2002)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ondon and New York.

Anderson 在其《想像共同體》第二版補充了「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一文，嘗試更細緻的去思考西方殖民政府所留下的「權力制度」如何構成往後「殖民地官方民族主義」在民族想像上的基礎。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政府首次「嘗試」對其海外僑民進行人口調查的起始點，可回溯至 1929 年國籍法公佈之後，在確定法律上的民族界線認定之下，開始制訂「護照條例」和辦理「華僑總登記」（李盈慧 1994）。而國民政府所制訂的國籍法最根本的精神乃是以「出籍從嚴、復籍從寬」為原則，採取最廣義的「華僑」定義。然而儘管根據僑委會的估計，海外華僑人數應已達千萬人以上，但到 1933 年為止，只有 12 萬 6 千人完成登記手續（李盈慧 1994），顯示出法律與現實的巨大落差。

但國民黨這套「救贖式」的國籍法¹⁷，不僅在 1945 年日本放棄對台主權之後，成為「恢復」台灣居民中華民國國籍的主要依據，並且將當時滯留海外卻未聲明「放棄」中國國籍的「台僑」一概認定為「華僑」（Chen 2003）；1949 年國民黨遷台之後，到 2000 年國籍法修正以前¹⁸，這套國籍認定的方法也成為僑務政策在法律上的主要依據，將凡有中國血統的全球華人，一概視為中華民國的僑胞¹⁹。因此 1952 年蔣介石在僑務會議開幕時便強調：

諸位在海外，領導華僑社會，身負眾望，每一位代表，都是真正代表
著成百成千甚至成萬的辛勤奮鬥，忠誠篤實的僑胞，今天聚首一堂，
是中國復國建國史上為僑胞所寫下的第一頁，中正今天和各位見面，
也就和面對全球一千二百萬僑胞一樣的親愛和欣慰。

主導戰後僑務政策的委員長鄭彥棻也常強調：「海外僑胞人數在一千三百萬以上，比台灣軍民全數還要多」以此作為僑務政策的主要根據。七零年代擔任僑務委員長的毛松年更認為：「當前的國際局勢，不論是談世界問題、亞洲問題或中國問題，實際上，就是要我們團結自由世界裡四千多萬中國人，去解救被共產奴役不得自由、受苦受難的九億中國人的問題。所謂自由的四千多萬中國人，就是在復興基地的一千七百多萬軍民的力量，加上散居全球各地的二千四百多萬僑胞。」²⁰在此情況下，僑胞的人數成為了一個可以被清楚指認的群體，儘管戰後

¹⁷ Duara (1997) 將清末中國民族主義者在海外的動員運動稱為「救贖式的跨國主義」(redemptive transnationalism)，為了能夠得到海外政治能量的挹注，民族主義者以血緣作為國籍認定的標準，因此也可稱之為救贖式的國籍法。

¹⁸ 2000 年的國籍法修正，主要將「中國人」修改為「中國國民」，以當時的政治脈絡來看，「中華民國」已特化成為台灣的代名詞，卻礙於國家認同的持續爭議，僅能從原來的「生時父母為中國人者，屬中華民國國籍」，改為事實承認為主的「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屬中華民國」。

¹⁹ 這樣的舉動並不意味著國民政府乃純粹只是為了爭取或動員海外僑胞，而不顧現實的困難將所有血統華人納入國家體制之內。事實上二次大戰以前，一種民族專屬一個國家的預設是很明顯的，國家組成的合法性乃來自想像同質的共同文化和血緣之上，而非現代意義下的「公民」。

²⁰ 毛松年 (1981) 現階段僑務政策概述。見華僑通訊社編，《僑政論文選集》

「華僑總登記」已窒礙難行，國民黨只能由各地使領館、僑團、僑領等，或依當地政府公佈數字調查所得，加以整理分析，來推估海外「華僑」的總人口數（僑務統計 1969）。

1963 年僑委會開始有系統地出版《中華民國僑務統計年報》，調查項目包括海外華僑人口的分佈、華僑團體分佈、華僑「返國」人數、核准出國人數、海外僑校總數、華僑回國投資、華僑捐獻款額等等，透過種種「精確」數字的再現，不僅拉近國內人民與華僑的距離，也將遙遠而模糊的華僑加以具體化。自此之後，僑務統計也成為僑委會的主要業務之一，透過國家官僚組織的設置，僑委會完整地記錄了海外華僑生態的各種變化。但這些數據的準確性如何，似乎不是重點。一個曾經被遴選為僑選立委、較能從本土角度思考的高資敏，在中國時報投書寫到：

忝為僑務委員多年，我每到一僑區就請教僑務官員，該地華僑有多少人？答案都是「不知道」或「大約」。尚沒有一個地區有正式普查過僑胞的人口。每區都未有過統計人數，怎麼知道全球共計是三千萬人？問對岸的僑務人員，答案竟是「根據台灣當局說的」²¹。

從事實的角度來看，究竟全世界一共有多少華人（Chinese）？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因為就如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乃是一種在對抗中產生的論述，華人的觀念，不管是主觀的認同或是客觀的認定，在不同的政治環境的選擇和壓力之下，其範圍將會不斷的移動而難以固定（Wu 1994；Wang 1994）。

相較於利用統計數字畫出海外華僑的基本輪廓，另一種必備的年度工作則是在每年的十月份。從 10 月 10 日的國慶日、10 月 21 日的「華僑節」到 10 月 31 日的總統壽辰，都使得台北「十月的天空」特別熱鬧，一個被稱為「華僑月」的重要時期。作為現代國家最重要的儀式之一的國慶日，究竟誰能夠參加、以什麼樣的身份參加，都反映官方所認定具意義性的組成人口與國家界線。從國慶日的相關剪報中所列舉的反共義士、邊疆民族、僑胞、工商業代表、學生、工人、軍警、金馬代表、公教人員等，相對於現今以四大族群作為代表國家族群融合的身份組成，早期的國家儀式不僅融合了社會各階層人士（工商業代表、學生、工人、軍警），同時對於民族邊緣界線的組成份子，包括代表被共匪「竊居」大陸的反共義士、代表中國領土完整的邊疆民族和金馬人士、代表正統祖國的海外僑胞等等，反映了國家特定的意識型態。同時，在國慶儀式的內容裡，不僅會固定安排「反共義士」來揭露共匪的「惡行惡狀」，也會藉由僑胞之「見證」，說明祖國的

²¹ 高資敏（1990）民主憲政下，僑務也必須轉型－寫於全球僑務會議前夕。中國時報。4 月 21 日。

美好和偉大、自由和繁榮，以一再地引領儀式的注目者，民主與暴政的界線存在。例如，幾乎成爲慣例的「華埠小姐」、「華裔小姐」回國訪問，不時會出現下列的報導：

【本報訊】舊金山中華總商會一九八五年華埠小姐回國訪問一行，昨（廿四）日上午，由團長李兆祥率領前往僑務委員會拜會。現年二十五歲華埠小姐吳豔華，對自由祖國的進步、繁榮極感驚訝，並表示將利用短暫的返國訪問期間，深入瞭解祖國的一切。……華埠小姐吳豔華表示，回國兩天來，她對所參觀過的每個地方都留下美好的印象，對祖國濃郁的人情味更是永遠難忘，她說：「我好喜歡台灣的一切」。（中央日報 1985/06/25）

去年到自由祖國來，每一位團員都想再多留幾天，大家捨不得離開這充滿人情味、令人生活得非常愉快的國土。相反的，鄭景雲團長說：「海外的華僑因為有親戚在中國大陸，不能不回鄉看親友。那些到中國大陸去的大溪地僑胞，動身之前，很興奮，因為將可以看到闊別多年的親友；到了大陸之後，他們開始害怕，恐怖的氣氛使他們不敢多停留，到了香港，立刻鬆了一口氣，把積壓在心裡的緊張和恐懼擠出。從此，再也沒有人敢回去探親。（中央日報 1985/06/25）

到了七零年代，進入外交岌岌可危的動盪期，行政院更進一步頒佈「僑胞回國參加慶典」的相關辦法，以各種「禮遇」的方式鼓勵僑胞回國參訪，例如對於配戴僑胞識別證者，航空公司服務人員、機場服務人員、機程車司機及公車駕駛員、售票員、商店店員等等，都應待之以親切禮貌的態度；各大百貨公司、餐旅業、電影院、車站等都要懸掛、放映歡迎海外僑胞回國標語等等²²。在國家的刻意經營之下，每年「回國」參與雙十國慶的人數從原本的五千人左右一路躍升到1976年的兩萬人、1981年更高達四萬餘人。在面臨國際地位一落千丈的窘境下，海外華僑的國際支持似乎成爲了一種替代品，使得每年雙十國慶的報導中，「回國華僑」人數的多寡更成爲具有政策意義的數字。

最後，在統計數字、國家儀式之外，另一種讓僑胞身影往往無所不在的制度設計，便是各式各樣僑政「問題」的研究。前面已提到，從五零年代開始，在官方的支持和鼓勵之下，便有所謂「中國僑政學會」的組織，集合各學者專家、僑務工作者，以每年出版論文集的方式，探討各地僑胞面對的種種「問題」。這些問題基本上包羅萬象，從報導各地「僑居地」之發展，華僑面對的國籍、經濟、文化、教育問題，到華僑研究的最新發展、僑務政策的該與不該、執行狀況等等，不一而足，內容多半帶有民族主義的語氣。例如：

一部華僑移民史，可以說是一首可歌可泣、血淚交織而成的詩篇。

²² 台灣新生報（1980）〈僑胞回國歡度慶典，有關單位協議，通過禮遇要點〉。九月二十三日。

華僑離鄉背井，遠涉重洋，艱苦奮鬥，以謀生活和出路，但求有朝一日，衣錦還鄉，光宗耀祖。若事與願違，我可憐華僑身處海角天涯絕域，忍辱偷生，甚至客死他鄉，是何等的悲慘！²³

除此之外，另一個製造「問題」的場所便是各類與「國父」、「三民主義」相關的研究機構與僑務工作相關單位等等。前者多半為碩、博士論文，在行文結構上往往分為僑務問題的「形成」與「認定」兩個面向。以陳樹強（1994）厚達 474 頁、改寫自其博士論文的《三民主義僑務政策之實踐與評估》為例，其在問題「形成」的部分便將華僑問題以社會、文教、經濟、政治四種面向進行極為概括性的討論，而在問題「認定」之上，則轉以「近代中國革命史」細數華僑之革命貢獻，作為僑務問題認定的「依據」。後者多半由官方如僑委會等，透過結集散見各地的僑政論文，將華僑問題予以具體化。

事實上就如 Bourdieu 所提到的：「國家官僚與其代理人乃是『社會問題』的大量生產者，而社會科學所做的僅限於認可它們。」（1998:38）因此，在戒嚴時期的威權時代，國家不僅全面地規範了研究與論述的範圍，其本身也不斷地生產其政治意識型態，套用 Corrigan & Sayer 的一句話，就是：「國家從未停止說話」（1985：3）。甚至對於一遷台的國民黨政權來說，「本質無限延伸的流亡情境反能激發主體的愛國認同、及強化主體字面化領袖論述並與此論述結合的能力」（趙彥寧 1999：50），使得戰後在台灣的國民政府，在傳統文化、歷史與民族價值體系上，扮演了異常積極的角色，成為如陳亦麟所指出的，一種「東方的東方主義」（an oriental orientalism）（Chun 1995）。

總結而言，在國民黨的刻意經營之下，一種高度「制度化」與「政治化」的僑務論述被建構起來，儘管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在生活經驗上與華僑的實際接觸有限²⁴，但透過各種統計數據的展現、國家儀式以及華僑的「問題化」，即便是遠在海外的同胞也能夠「被想像」。

第三節 民族「邊」織：從僑胞到僑生

「無僑教即無僑務」，已為有識者所共同認識。僑務問題雖然很複雜，而且各有各的嚴重性，可是從沒有像僑教問題一樣嚴重，也沒有像僑教問題所牽涉的範圍之廣泛。教育是百年大計，民族精神之所由培養，國家觀念之所由陶冶。教育的失敗，不僅關及於當時，且影響及於後世；不僅關及於個人，且影響及於全體。整個僑務之盛衰，可以僑教

²³ 摘自陳三井（2003）。

²⁴ 在李哲禧（1985）針對台灣地區大學生對海外華僑映象之研究中，有高達 50% 的受訪者對華僑之映象來自學校，即僑生。而有 32% 的受訪者來自大眾傳播媒介。當然因為這項調查是以北部地區大學生為主，因此比例上應該還要打個折扣。

之榮枯去衡量（鄭彥棻 1953：74）。

綜觀戰後五十年來僑務政策在台灣的發展，不管是政治上的動員或是經濟上的連結，都有其盛衰之軌跡可尋，唯有僑教政策中的「僑生回國就學政策」（底下簡稱僑生政策），從五零年代開始，在中共的競爭、美援的加持、僑居地的同化限制²⁵等影響下，不僅得以穩定蓬勃的發展，即便在八零年代末、解嚴初期所引發社會輿論的批評，教育部必須出面保證對入學名額進行適當的調整，但很快的在九零年代教育改革與大學急速擴張的趨勢之下，僑生政策在「國際化」與「全球化」的政治修辭中，又恢復成爲國家亟欲推動的政策²⁶。

但在這裡本文並不打算介紹「僑教政策²⁷」五十年來的歷史形成和演變²⁸，而是試圖討論在僑生政策中，政治意識型態如何被散佈和操作？「僑生」究竟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這一部份，在多數以官方出版品爲徵引材料的研究文獻中，往往是最匱乏的一部份，同時所謂的「僑生」也被視爲是「同質化」的群體——一群「嚮往祖國教育」的華僑青年。事實上由於各地的教育體制差異極大，僑生政策的執行往往是經由許多制度折衝之後的妥協，並不具有一貫性。以入學分發的作業來說，便是以武斷的經驗法則，將招收來源分成五個梯次進行分發²⁹，使得某些地區的學生，例如馬來西亞因被列爲第一梯次，往往高度集中在北部公立大學。另外從實際的入學人數來看，單就港澳生和馬來西亞學生便佔了 65%，相較於僑委會所號稱的「結業者遍布全球」，確實有蠻大的出入。但這些偏差在國民黨政府一味的追求「厚植海外反共力量」、「爭取僑胞心向祖國」的大原則下，往往被忽略或是視而不見³⁰。但本文亦無意進一步對僑生政策的效果進行評估，而是試圖以一個曾經身爲馬來西亞³¹「僑生」的經驗，再參照一些同學會內部流傳的刊物討論，以及利用在 2000 年針對 20 位不同時期台灣留學的「僑生」所進行的訪談資料，試圖勾勒出國民黨在台灣實行「黨化教育」中的僑生版³²。

²⁵ 這裡的邏輯是：戰後東南亞地區各政府一般上只能容忍已發展至一定規模的小學華文教育的存在，並限制華文高等教育的發展，因此使得這些華校畢業生必須「出國」才能接受大學教育。有關回國僑生政策的背景因素將會在第五章繼續討論。

²⁶ 只不過到這階段大多數是開放私立學校，以市場化競爭的方式到海外爭取學生來台留學，與早期政治化的僑教政策性質上極爲不同，但無論如何，在國內一般上仍稱之爲僑教政策。

²⁷ 僑教政策除僑生回國就學之外，還包括中華函授教育、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中文學習班等。

²⁸ 相關文獻，以簡單扼要爲主可參考李盈慧（1997），若以詳盡爲先可參考郁漢良（2001），但這些研究往往只停留在理念和制度的介紹，卻鮮少去進一步瞭解實際的操作過程。

²⁹ 第一梯次：馬來西亞地區（不含海外臺灣學校）。第二梯次：一般地區（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及其他免試地區）及以 SATII 測驗成績申請者。第三梯次：海外測驗（韓國、日本、泰國、菲律賓、新加坡、泰北、海外臺灣學校高中畢業生、港澳地區）。第四梯次：僑大先修班結業生。第五梯次：在台結業或測驗（印尼輔訓班結業生、馬來西亞春季班結業生、緬甸地區）。資料取自海外聯招網站 <http://www.overseas.ncnu.edu.tw/oversea94/default.asp>。

³⁰ 但卻也意外地成爲了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關鍵鏈—培育師資的重障地。

³¹ 以大馬僑生的經驗當然無法代表所有僑生的看法，但其畢竟反映了僑生總人數的 30% 的看法。

³² 有關僑生認同的經驗轉折，最具體的乃是表現在文學創作之上。這方面的討論，安煥然（1996）

在「蔣公為了防止中共毒化海外青年」的政治口號下，僑生政策從一開始便沿著冷戰的思維，橋接國民黨的「反共復國」論述，使得僑生政策不僅被解釋為是「對自由中國的公民投票」³³，同時男學生更被要求參與「反共抗俄」的實際工作而參與軍事訓練。因此，除了平時在學校裡必須選修軍訓課程之外，暑假期間亦同樣被要求參加為期六週的「大專學生集訓」，需取得證書，否則將無法畢業。此項政策原本從 1959 年的「志願參加」至 1966 年的「強迫規定」，直到遭 1969 年剛獨立的馬來西亞政府抗議，並威脅將取消參與集訓留台學生的公民資格，使得大批僑生因而卻步的情況下，又另定「海外青年講習會」（簡稱海青會），使之成為成功嶺軍訓的外國籍僑生版。

軍訓的講習內容除了介紹「祖國」的各項建設之外，也包括「我國與東南亞各國之關係」、「僑務概況」、「華僑與國民革命」等歷史；在反共鬥爭的課程中則包括「共匪暴政與危機」、「共匪海外統戰陰謀剖析」、「粉碎共匪陰謀貫徹反共國策」等等³⁴。「海青會」早期在中央警官學校舉辦，後來改在林口的「僑大」。所謂「僑大」，全名是「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是一所專門招收大學錄取分數不足、或是不滿意原分發科系而要求「降轉」的大學預備班。高高的圍牆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封閉系統，所有生活都被要求整齊畫一（如棉被折法、書籍擺放的方式），上課時穿著軍訓服，每天早上上課前要集會、升中華民國旗、唱中華民國國歌，每年照例要到慈湖謁靈，上三民主義，學校有教官管教、乖的學生會被邀請入黨等等，接近九個月下來的「先修」，大多數學生從原本不知道蔣介石是何等人物³⁵，到開始前一句「蔣公」、後一段「國父」。（黃錦樹 1990）。

面對這些教育以外的政治要求，究竟僑生的看法又是如何？比較輕鬆的看

已進行了初步的整理分析；黃錦樹（1998）則進一步針對個案（如溫瑞安、李永平等）進行精彩的文本分析，反映了國民黨政治教育下的幾個極端個案。套用黃錦樹的一句話：「毋忘在莒。所有的人都忘記了，甚至被現實磨掉了青春、身體和意志的老兵們。只有華僑、遲來的外省第一代李永平牢牢記得，他或竟是那赴該盟誓而來的遲到的青年。」（引自黃錦樹 2002:29）

³³ 美國前總統艾參豪於 1958 年的致國會咨文中曾指出：「現有八千名華僑學生在台灣讀書，等於海外華僑對中華民國的公民投票」，摘自中央日報（1988）〈釐定落實新的僑務政策〉，一月十一日。由此看出，儘管僑生政策很大部分是美援產物，但不管是國民黨政府或是堅持圍堵政策的美國政府，都以此作為反共立場的「依據」。

³⁴ 參閱李靜兒（2004），頁 37。

³⁵ 一位受訪者曾以戲劇化甚至近乎反省的口吻敘述這段經歷：「台灣的滿街都是愛國口號，反攻大陸啦、中華民國萬萬歲啦、三民主義萬歲啦，對我們來講這些都是很新鮮的，到處都有蔣公。對孫中山我們還有認識呀，可是蔣公到底是誰呀，我們課文裡面沒有呀。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可以感覺得到為什麼人家對國家領袖，那麼的效忠、那麼的迷、那麼的崇拜，甚至有些家裡，尤其鄉村地方，不只是有祖先的照片高高掛在客廳，連孫中山呀，孫中山還少，蔣公的最多，都高高地掛在大廳喔。（中略）我有時都告訴學生，你們升旗都不站好，你們知道嗎，台灣為什麼這樣強，就是因為他們都有這一方面的愛國意識。」

法就是，對於鮮少有機會能接觸武器的大馬僑生來說³⁶，對於能夠拿槍並且有機會嘗試射擊，都感到非常興奮，例如一位八零年代留台生便說道：「但我們那時候不太理解，知道是這樣子啦，可能要接受一些軍訓吧了。我們那時候覺得很好玩囉，還拿槍呢，傻傻地。」許多曾經參加過「海青會」訓練的朋友也曾經表示，能夠學習「開槍」是一段很特別的經驗。而對於集訓的課程內容，另一個留台生則輕鬆地說道：「你考試的時候就不能寫你親共嘛，那時候我們很鬼靈精，我們也懂一點東西，他說 yes 我們腦海裡就說 no 囉，不是說很同意啦。」一位留學生回憶這段過去時也侃侃地說道：

因為我們那時候，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變，我們暑假男生都要上海外青年班，其實他是一種政治教育，他會拉攏，會告訴你國民黨的歷史呀、如何跟共產黨鬥爭，所以他有這方面的政策存在，還有別忘了那時候我們進去必讀一科國父思想，這些其實在我們感覺就是一種政治洗腦。

但相較於這種內省式的反抗策略，另一個性格較為爽朗、其後受到台灣「本土化」影響而決心擁抱大馬本土的一位留學生，則談到當時他和朋友如何進行另一種消極的反抗：

這種心態，我們男生必須要上一個叫海青會的。海青會那邊就是有很多同學，包括我在內啦，我覺得我們是來讀書的，最多回來是我們文化上的認同，而不是政治上的認同，台灣人執政者把我們當成不管是文化、用因為文化上的認同，這是變成一種政治的利用，我覺得。然後進到海青會都是講這種東西，我們很氣憤喔，本來是很好玩的。海青會有什麼都不記得，我只記得我們操練，練步操，因為我們隊裡面有很多是音樂系的，寬中的，我們的歌聲是最宏亮的，但是我們就是不好好練，練練練就是走遠了，然後就講話，或者是唱兒歌：「我有一只小毛驢…」這句話我都還記得。後來就被教官看到，就抓我們來罵，說以你們的實力根本就可以拿名的，為什麼你們不好好練。我們就還是不管，不過最後我們唱唱唱還是拿到第二名，很好笑。

必須要注意的是，上述的受訪者多數是留學於八、九零年代，當時國民黨的政治神話早已鬆動，因此此種有意無意的反抗並不會招致立即的懲罰。但相對於早期留學生的回憶，一位來從印尼隻身來台、後嫁到馬來西亞並投身教育的受訪者便提到：

那時候台灣的人罵中國大陸是很刻薄的，如共匪呀。都不能談的，談了等一下給那個學長講說不要亂講話呀，等一下又被抓去。我們哪裡敢亂講？所以常常聽說有一些知識份子被一些無端端的罪名被抓起來關到很久，那時候是蔣介石的時代。

³⁶ 由於馬來西亞實行募兵制，而華人鮮少會投入當兵。

另外一位於八零年代初期留學台灣，到台大第一天便遇到轟動一時的陳文成陳屍台大的命案，用一個更為嚴肅的口吻回憶這段經歷：

81、82年那時候還是戒嚴時期，所以那個時期你不能夠太過公開表露你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包括你對中國大陸、你對馬來西亞，因為我們被當成是所謂的華僑，那你本身我覺得明哲保身，如果講不好聽，這樣講的話，因為你不能夠太過表露你自己的看法，因為那時候真的你不曉得這位台灣同學究竟是什麼想法，他會不會是別有用心的，因為我必須要這樣講，因為在解嚴前，我們真的不了解台灣同學究竟是什麼立場，因為我們一出街頭就看到：反共必須愛國、愛國必須反共。你看到這些標語的話，我想你自己也要懂得保護你自己，因為我印象很深刻，我剛剛到台灣的第一天，台灣就發生一場，到現在還沒辦法解釋的政治命案，一位姓陳的，我忘了他叫什麼名字，從台大的新生大樓跳下來，他本身在美國他可能因為和中國大陸有接觸，回來台灣便被警備總部，現在好像解散了，叫去問話。結果第二天剛好就是我們來台大校園第一天，那天晚上他就從新生大樓跳下。所以這個事情給我一個很大的衝擊，不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中略）所以你必須要懂得保護你自己，尤其是你看到這種事情就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發生，第一天來就看到這樣的命案，我個人覺得說，我開始第一年81年根本沒有談。

換句話說，即便是如天之驕子³⁷般被迎接回來的僑生，事實上在暴戾的國家機器面前，也只能選擇明哲保身，沈默以對。但更可能的一個狀況是，對於那些「屈就於惡勢力」、接受招安的同儕，給於「適當」的懲罰和壓力。例如：

那種情況其實也有一批人，我們要打他們的，好像是XX獨中的，他就一直拍馬屁，叫他上台呀，就上台說我們的馬來西亞的政府對我們不好，哪裡有一個國家的政府對我們這麼好的？這樣子講的，講了一大堆囉。那海青會實際上也是一種政治的運作，馬上就有一些教官過來說，你要不要進國民黨？（中略）那進的理由是什麼呢，政治上的利用。所以為什麼本省人生氣我們也是因為這個樣子，他用的理由不是什麼回歸啦，什麼啦。你進國民黨喔，你可以拿這個獎學金、這個貸學金、這個什麼什麼，是有的。這個是實際上存在的事情，而那個學生他也是因為這種實際的利益關係，他去講那種話。

究竟有多少僑生加入國民黨？目前並不得知。唯一的數據是在1961年6月的統計，在一共5494人的在校僑生中，所謂的「僑生同志」一共有698名，佔總人

³⁷ 一位接受美援補助、從1958年到1962留學台灣、畢業後嫁至馬來西亞的印尼華人，在筆者問及當時台灣同學對僑生的感受時，曾生動地說道：「他們當時對僑生看作是比較高一點。因為僑委會呀、學校呀會比較照顧僑生，而僑生比較進步呀、錢又比較大。所以他們都會讓你幾分。而且那時候的台灣人比較不會像現在一樣，咄咄逼人、財雄勢大，那種逼人的氣氛，他們都比較純樸，只知道國家呢，僑委會呢，學校呢，都把僑生看得很高，他們又免聯考，又保送，好像是天之驕子，我們是安排這樣，就接受這樣，他們就拼得半死。」

數的 12%³⁸。相較於 1955 年一項針對國民黨知青黨部的比例分析，學生黨員的比例平均下來達 14.9%³⁹，因此僑生黨員人數事實上也相去不遠。

但無論如何，此種充斥著「黨八股」的教育氛圍，儘管在表面上具有強迫性，但實際上卻因為太過明顯和「形式」，因此只要忍一忍就過去，並未因此造成困擾。但真正的挑戰卻在於整個留學生涯中，許許多多細緻的分類系統、符號體系，從聳立而起、刻著「華僑為革命之母」的鐘樓，到簡明地寫著「僑居地」的資料卡、註上「僑生」的學生證，在這些既存的符號網絡中，配合著的是親切的微笑與不言而喻的認知慣性，不需一年下來絕大多數的學生便能夠「恰當」的運用這些符號，減低不必要的溝通成本。

更致命的是，隱藏在這些符號後面的各種利益和特權（例如獎學金和退學標準的優待，甚至連作弊都會「從輕發落」），對於一些社會支持較為薄弱的留學生來說，卻是難以一概拒絕的方便資源。例如針對一群九零年代末期在學學生所做的團體訪問時，便有人提到：「我都是在不知不覺中被照顧的，我都不知道。我其實覺得很多福利我們是受之有愧。」另外一個接腔說道：「真的，她對我們真的很好，其實我們不是這樣的身分的。她把我們編入這個身分，然後被照顧，其實我們是很感激的。我們不能再去說我們要更多。」另外一位於七零年代末期留台的受訪者，當我問到她是否知道僑教政策背後的政治目的，她立刻答腔說：

我很清楚她為什麼這麼做，可是我還是很欣賞她，不得不讚美她，她的確做了很多，比如說僑委會扮演了一個華教的工作，幾乎照顧了每個地方華教的發展，這一點坦白講，就算有一天沒有台灣、中華民國，假設啦，她還是會在歷史上記下一大功。

另外一位於八零年代末期留台的受訪者，則是這樣回憶著：

說句真心話，到現在我還是很感激台灣政府當局，雖然他可能他有他的想法，可能這個是他海外統戰的目的，可能我這樣講可能是太過，不過我那時候個人的想法是這樣，但是我廿年後我感覺很幸運，讓我有這樣的機會，真的要謝謝台灣這種僑教政策，因為我們當年沒有太多錢的話，根本去不了其他國家。

換句話說，即使是大多數的同學都知道，僑生政策背後有一「政治大手」正在進行操弄，但不管是基於作為受惠的一方，或是因為站在自身社會結構的需要來談，絕大多數的受訪者對於這段留學生涯仍持極為正面的態度。

³⁸ 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1962）《如何使僑生樂意參加本黨》。

³⁹ 見龔宜君（1998），頁 123 之表 5-3。

1993年，台灣政府爲了減緩台灣剩餘資金不斷往中國投資的壓力，開始大力倡議所謂的「南向政策⁴⁰」。儘管早在八零年代末期就有許多台商相繼到人力成本較爲低廉的東協國家進行投資，但相較於「西進」的熱潮，「南向政策」推動從一開始便是以「作為台商對大陸經貿投資的『中繼站』」爲出發，並將之定位爲「分散市場的重鎮」⁴¹。對於長期以來因政治因素導致文憑不受國家承認、多半只能棲身於文教業的留台生來說，台灣資金的外移，無疑的增加了另一條就業管道，使得留台生無不恭逢其盛⁴²；同時，九零年代的僑務政策配合政治上的轉型，也開始積極地爲台商和台僑提供更多實質的協助（Chen 2002），例如透過「僑生輔導室」爲台商招攬和物色管理幹部（龔宜君 2002）、利用留學生在當地的社會網絡，減低營業上的資訊成本等等。

由此看來，三十年來未曾間斷的僑生政策，到最後仍然是以「經濟」的形式來收割成果。但無論如何，從九零年代開始在台灣資本擴張與務實外交的帶動下，各區域的留台學生也開始進一步的整合。1992年由42個分會所組成的「馬來西亞留台聯合總會」開始主張推動「亞洲留台校友會」的成立⁴³，到2000年在僑委會的支持下更進一步成立「世界留台校友會」，藉由每年年會的召開將留台學生加以制度化，形成了一股相對「親台」的壓力團體（Chen 2002）。

總結來說，僑生政策是在冷戰、內戰以及東南亞華人問題的三條主調之下，所意外譜出的一齣政治三重奏。儘管其背後的政治因素極其明顯，同時在逐漸僵化的制度下也產生了很多不公平的現象。但無論如何，不管是以「正統中國」的姿態，或是以「鄉土台灣」的腳步，這接近十五萬人數的留台生，究竟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政治效應，仍值得進一步觀察。

⁴⁰ 原爲「南進」，後因南進一詞爲二次大戰日本侵略南洋各國的用詞，因此爲各國所抗議，故又改爲南向政策。

⁴¹ 工商日報（1993）〈經部南進政策，鎖定東協國家〉，十月十四日。

⁴² 見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1989）《留台人三十年/留台聯總十五年》，頁195-208。

⁴³ 邀請包括泰國、香港、汶萊、新加坡、印尼、緬甸、越南、菲律賓以及「在台」僑生聯合會相繼加入。

第四節 回溯性的僵固指涉：「華僑」一詞的使用

我海外同志，昔日文艱苦與共，或疏財以充軍實，或奮袂而殺國賊，其對革命之奮鬥，歷十餘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無不有華僑二字，以長留於國人之腦海。（孫中山 1921 美利堅分部黨所落成懇親會書面賀詞）

1981 年 12 月，「僑委會組織法」進行遷台以來第二次修法，其中最重要的修訂是將組織法中的「僑民」用詞，全部改為「華僑」，但在位階較高的憲法中，依然使用「僑居國外之國民」來指涉海外僑胞。楊建成（1995）認為這顯然極具政策性的意義；王思嫻（2002）則將此認定為一種「創造性模糊」，因為模糊掉「華僑」和「僑民」之區別，則僑務工作之範圍可以擴大到世界上所有華人，也能為爭取海外華僑與中共抗爭，取得法源的基礎。

相較於政治上的刻意模糊，在學術研究上則幾乎都在絞盡腦汁的分析和定義「華僑」稱謂的問題，相關論文不少過數十篇⁴⁴。對於學者來說，貼近真相、實事求是仍是必要的學術良心，眼見國內外情勢之劇烈變化，「華僑」稱謂早已到了必須重新定義的地步，或是用新詞替代⁴⁵、或是發展相關符號與之並行討論⁴⁶、或是合併兩個相關概念⁴⁷，稱謂問題儼然成為所有討論相關著述的第一關，必須大費周章的加以定義。本節不打算提出一個更好的概念分類、或是去「揭露」政治背後的「陰謀」和作用，而是後退一步，思考「稱謂問題」何以能「成為問題」？也就是希望能把「稱謂問題」予以問題化。

事實上對於許多人來說，「華僑」就如中華民國楓葉型的地圖一樣，是國民黨大中國意識下硬撐起來的幻象。楊聰榮便認為，國民黨在台灣的「中國化」乃是透過「以名領實」的手法完成的。他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符號權力的運作：第一

⁴⁴ 列舉部份專論文章如：吳主惠（1981）〈華僑之本質〉；朱浚源（1998）〈華僑名詞界定及其應用〉；張存武（2003）〈對中國海外移民發戰的新省察〉；麥留芳（1984）〈華僑的重釋義：從經驗到概念〉；廖建裕（1998）〈東南亞華人：華僑？海外華人？或東南亞人？〉；黃錦樹（1990）〈僑生稱謂之再探討：與曾慶豹權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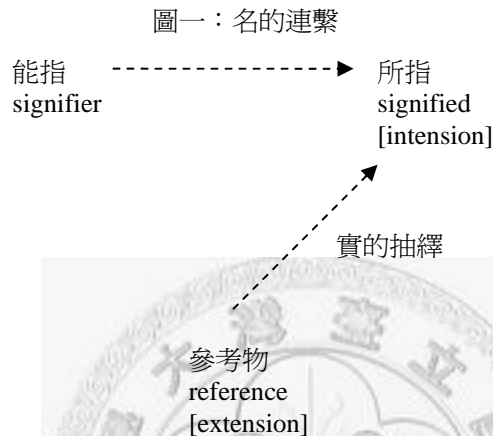
⁴⁵ 例如二次戰後南洋華人創立了「華族」或「華人」來自我指稱；海外台灣人在本土化之後開始以「台僑」作為自我稱謂；近年來開始流行頗為浪漫的「離散華人」（Chinese Diaspora），即便權威學者王賡武的保留批評（Wang 2000），但仍然擋不住這樣的風潮。

⁴⁶ 麥留芳（1985）概念分類最常被徵引的「理念型」，也是最常見的策略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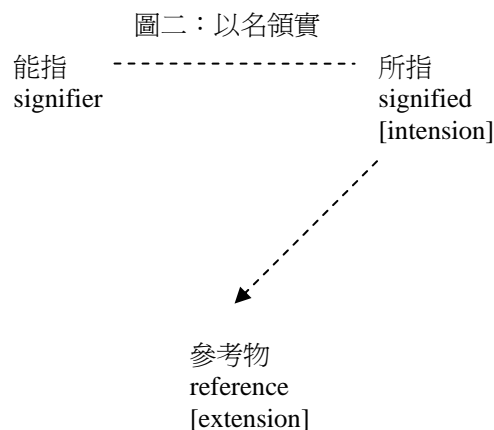
稱謂	無當地國籍	高度認同中國社會文化	中國血統
華僑	+	+	+
當地華人	-	+	+
華族	-	-	+
華裔	-	-	+/-
外族	-	-	-

⁴⁷ 如「華僑華人」，採此策略者主要為大陸學者，王賡武對此極為保留（Wang 2001）。

種乃是「名符其實」的命名 (naming) 過程：一個**參考物**，對其進行「實的抽繹」得出的**所指**，與一個**能指**，對其進行「名的聯繫」得出的**所指**，兩者相符合，可謂之「名符其實」(見圖一)。反之，「名不符實」則是：**能指**出發所關涉的**所指**，與由**參考物**出發所得到的**所指**彼此不相符合的情況。在這樣的界定下，我們可以得出，在楊聰榮看來，所有的**能指**都承載了一套意義，故能發出**所指**；同樣的，所有的**參考物**都具有可抽繹性，故能得出**所指**。因此，如果這兩種過程的結果相符，則是「名符其實」，反之，則是「名不符實」。



而「以名領實」又是什麼呢？楊聰榮寫道：「以名為導引，先定出名來，以廣為傳佈，造成聲勢，再求得現實進一步的發展。是由能指出發，然後再由能指去建構所指，而希望建立具體的參考物。」(1992：67)(見圖二)由此可看出，「以名領實」乃是從前述的兩個過程轉變成為一個過程，是一種以虛創實、無中生有的建構過程。楊聰榮更進一步指出，「以名領實」具有排除性(exclusiveness)，是在特定的意識型態下產生的，因此其作為一種「指涉的社會實踐」，也就成為了一種「意識型態的呈現」。



借用符號學的語言概念，楊聰榮將國民黨在台灣的文化建構與意識型態相結合，進一步探討了此種「名的作用」背後的符號權力。此種觀點接近於新馬克思主義傳統下對意識形態的詮釋：一種虛假意識的散佈。確實地，楊聰榮也明白指出，「每一個在『民族文化』名下的具體物，都攜帶著這個偉大的名，也因此都具有Althusser所謂的召喚作用（Interpellation），可以招募一個偉大的主體，而完成意識型態的建構。」（1992：67-68）

有趣的是，Žižek（1989）探討意識形態的縫合（quilt）過程時，曾經對「描述主義」（descriptivism）和「反描述主義」（antidescriptivism）進行分析，與楊聰榮的「名符其實」和「以名領實」有許多相近之處，值得進一步做比較。我們知道在基礎的邏輯學裡，當我們要對一個概念進行定義時，可以簡單的分為兩種方式，一種是所謂的「內涵定義」（intensional definition），例如「哲學家」的內涵定義為「精通哲學的人」，「商人」的內涵定義為「以物品買賣來賺取利益的人」。另一種則是所謂的「外延定義」（extensional definition），又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指著蘇格拉底的圖片說：這是「哲學家」；或是指著電視上的王永慶說：這是商人。另外則是透過將內延事物的名稱來界定，例如用蘇格拉底、柏拉圖等等人們所熟悉的名字來界定「哲學家」，利用王永慶、郭台銘等名字來界定「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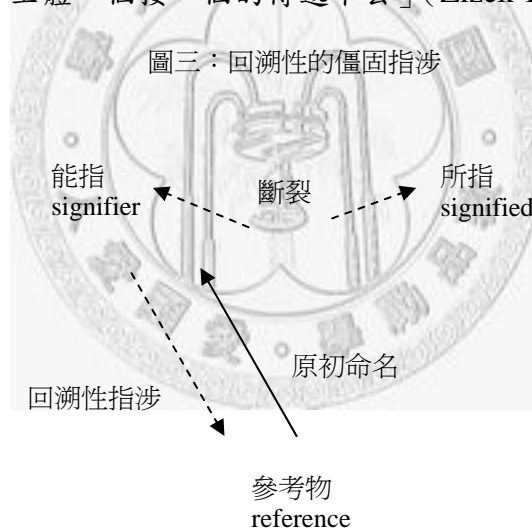
面對這兩種不同認知世界的方式，描述主義者和反描述主義者對於兩者抱持不同的看法。描述主義者認為，「內涵」對於「外延」來說，具有邏輯上的優先性（intension has logical priority over extension），也就是「外延」（由一單詞所指稱的物體）取決於「內涵」（一組意義所包含的所有特性）。例如當被問說：為什麼桌子被稱為『桌子』？答案會是：因為單詞『桌子』是某種意義的承載者，意謂一組**描述特性**（如具有某種形狀、服務於某種功能），因此當現實中有一**客體**擁有這組**描述特性**，則會被指涉。因此，對於描述主義者來說，所有**單詞**必然帶有意義，而**命名**的過程就等於**名稱的意義**與現實中的**物體**聯繫起來。

從這樣看來，不管是前文提到的學者們或是楊聰榮，都是屬於描述主義者。前者認為隨著情勢之演變，各地華僑已紛紛轉向認同當地，取得當地的國籍等等，在此情況下「華僑」一詞所具有的內涵，以及當地所「抽繹」出來的內涵，已不相符合，使得稱謂問題有待進一步商榷。後者借由「名符其實」和「以名領實」的對比，指出前者乃是「正常」的命名方式，後者則是透過政治意識型態之強力介入，先散佈了名、才建立了實，故乃是一種扭曲的名的作用。

但Žižek卻認為，在社會生活中更可能的情況是反描述主義。由哲學和邏輯

學家Kripke所發展出來的反描述主義，乃是認為：單詞是通過「原初命名」(primal baptism) 這個動作，與客體相連接，即便當初決定單詞的描述特性完全改變了，這種連接還是會保留下去 (Žižek 1989: 89-90)。用Kripke的例子來說：在歷史的某一時刻，有一個物體被命名為『黃金』，那時候人們描述該物體之特性為一個沉甸甸的發光體、可以鎔化製成美麗樣式等等；但幾個世紀後，隨著人類知識進步，那一系列描述特性已經大大增加並且發生了改變；如果今天某一科學家發現，當年被稱為『黃金』的客體的全部屬性，事實上都錯了，即「黃金事實上不存在那些當年以為的描述特性」，但在此情況下，『黃金』依然會被繼續指涉當年那個客體⁴⁸。

換句話說，相比之下，描述主義者重視能指所固有的、內涵的意義，認為透過對本質意義的掌握，乃優先於外延的傳遞。而反描述主義則強調命名的偶然性，也就是Saussure的命題：「能指」和「所指」不必然有內在關聯，因而命名的過程，往往是通過「原初命名」與客體相連結，兩者形成了外在的因果連繫，並「隨著傳統的鍊條，主體一個接一個的傳遞下去」(Žižek 1989: 90) (見圖三)。



在此情況下，單詞與客體的連繫，乃具有一定的僵固性，並不會因為其描述特性的改變而有所鬆動，因此也被稱為「僵固指涉」⁴⁹ (rigid designator)。Žižek認為

⁴⁸ 在邏輯學討論中，此種觀點一般上乃是針對「專有名詞」而言，例如一個被稱為王小明的人，我們若沒見過他，則無法得到其任何確認性描述，例如：住在隔壁的胖鄰居。再舉一個例子：如果我們被要求對愛迪生做一確認性描述，答案會是「發明電燈的人」，但如果電燈事實上是他的朋友法拉第發明的，愛迪生殺了他，把此發明歸於其名下，則『愛迪生』依然是殺人的那個人，儘管確認性描述不再適用於他。但 Žižek 認為，事實上這並不只是發生在專有名詞上。

⁴⁹ 僵固指涉來自於分析哲學中的指涉因果理論 (causal theory of reference)，由 Kripke、Dennellan、Putnam 所創立，即認為「名詞」和「客體」之間，一經「原初命名」，則不通過任何描述性中介，都會指涉那個對象。

意識型態的產生，便是因為「僵固指涉」停止了任何「所指」的轉喻性滑動，即落入本質主義的信仰中：認為完全有可能有明確的描述特性，可以拿來定義如民主、社會主義等等漂浮的能指。

從解構主義者的立場來看，Žižek 乃認為「實在界並沒有對它的「符號化」過程提供任何支援，因為每一次的符號化都是情急下的應付手段（the last resort contingent）。」這種觀點與前述 Geertz 對意識形態的分析頗為相近，即意識形態是一種象徵符號，是人們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抓住」真實的一種努力。但 Žižek 進一步指出了命名本身的回溯性效果（the retroactive effect of naming itself）：是命名本身，也就是能指，支撐了客體的同一致性。也就是說，由於並不存在「全知全能的歷史觀察者」（omniscient observer of history），因此 Žižek 認為，「單純的能指」（pure signifier）是一個「沒有所指的能指」，其本身已提供了我們對歷史現實的統一性和一致性。這樣看來，「以名領實」也同樣是以全知全能的歷史的觀察者作為前提，方能推出以名創實的結論。但問題在於，此種透過「對照」真實，來顯現其虛假性的古典意識形態分析，卻有其侷限性：認為「只要拋棄被扭曲的意識形態景象就大功告成」。相反的，Žižek 認為歷史的必然性是通過誤認而形成的，人們透過對歷史的符號化，作為中介來把握歷史、完成真實，而更可能的一種情況是「理性的犬儒主義」：對意識形態面具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距離心知肚明，但依然堅守著面具（1989：29）。

理解了「回溯性僵固指涉」的概念討論之後，我們再回到「華僑」稱謂的例子進行討論。很顯然的，作為能指的『華僑』，和海外華人作為一實體，也經歷了「原初命名」過程。根據王賡武（1987）的研究，『僑』原具有被迫遷移、本該還鄉、思鄉懷舊的意涵，十八世紀時曾被用來指稱那些移居台灣的福建人和廣東人，漸漸的從暫時居住演變成為某種「官方認可」而定居的暗示。第一次被用來指涉海外華人，則出現在十九世紀八零年代外交官黃遵憲的著述。但無論如何，其被大量的使用散佈，則與 1903 年鄒容《革命軍》一書中所收錄〈革命歌〉很有關係。這本書被大量的翻印幾十版，也在香港、日本進行重刊並散佈至北美和東南亞，使得原本強調漢族的孫中山，到 1906 年也開始使用『華僑』一詞，而許多海外華人也開始用『華僑』來稱呼自己，並逐漸擴大至所有海外華人。辛亥革命成功之後，『華僑』幾乎成為了「海外愛國華人」的代名詞，並隨著國民政府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導權後，藉由政策和法令的制定，予以制度化的基礎。因此，王賡武也將 1903 到 1955 年這段時間，稱之為「華僑時代」（Wang 1991）。

以「華僑時代」來區分不同模式的「華工時代」和「華人時代」，顯示出王賡武作為土生土長的海外華人，對於華人「內涵」所具有「真實的」了解，因而

主張以不同的稱謂來指涉不同的內涵。但對於與戰後播遷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來說，隨著大陸的徹底淪陷，彷彿又回到了世紀初的境遇：流亡與再革命。這時候的『華僑』，乃是在復興基地的軍民以外，擁有無限潛力的「反共大軍」。在此強大的欲望驅使下，即便是『華僑』的內涵已產生了「根本」的改變，但『華僑』一詞仍然會與客體連接起來，成爲一種「僵固指涉」。事實上 Žižek 也提醒我們在 Kripke 反描述主義中所具有的「力比多內容」(libidinal content)，是一種慾望滿足的問題 (1989: 91)，因此隨著每年華僑「代表」的「回國參訪」，『華僑』也就會「隨著傳統的鍊條，主體一個接一個的傳遞下去」，即便大部分人對其內涵一無所知。

第五節 本章結論

本章的研究視角，主要是將國民黨界定爲一「全球冷戰結構下的流亡政權」：即冷戰結構撐起並且延長了內戰情境，使流亡的本質長期延宕，在全然否定現存的物理空間之下，不斷地創構對流亡政權和流亡主體本身具有意義性的象徵秩序 (趙彥寧 2000)。

在此取徑之下，本文認爲遷台之後國民黨的僑務論述，乃是流亡政權建立的象徵秩序中，極爲重要的一環。因此，在第一個小節中，本文藉由「萬惡共匪」與「愛國華僑」的比較分析，以說明兩者之間儘管內容相異，但論述結構上卻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據此說明國民黨如何透過「局內/局外」、「我們/他們」的界線劃定，以抹除其作爲一「流亡政權」的內在特性。其次，從人口調查、國家儀式和認定「問題」這三種不同的角度切面，本節嘗試說明「看不見」的華僑，如何透過各種數字、儀式、和問題化的制度再現的魔力，使之看起來「存在」於集體社會意識之中，形成根深柢固的華僑印象，並以此說明象徵秩序的操作方式。其三，藉由僑生的社團刊物以及訪談的資料，本節試圖分析僑生政策下所含有的政治教育 (從軍訓課程、優待政策到細緻的分類系統和符號網絡)，如何形成意識型態的召喚，使僑生逐漸轉變爲僑胞，形成一股相對「親台」的政治壓力，以此也說明象徵秩序的實體化。最後，本文試圖將「海外華人研究」中的「稱謂問題」予以「問題化」，藉由 Žižek 的「回溯性僵固指涉」的概念對其進行解構，以此進一步說明本章的一貫立場：意識型態並無真假之分，乃是主體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抓住真實的一種努力，並且隨著主體一個接一個傳遞下去，儘管大部分人對其內涵一無所知。

第五章 代理的祖國：國際政治中僑務政策開展的條件

自從世界第二次大戰以後，僑胞最多的東南亞各地，多一變為獨立的國家，他們或基於文化上的過份自尊與自卑，或基於不正確的狹隘民族主義心理，或基於民族本位經濟的急激要求，對當地華僑各種事業，很少能夠保持過去與我華僑互助合作的美德，反多存排斥打擊的偏狹觀念，因此海外僑胞到處遭受不幸的命運（鄭彥棻 1957）。

「海外華人」構成少數民族中的特殊種類，這主要是由外部條件決定的。這個少數民族，由於靠近其發源地，由於過去動盪的經歷，由於有一個重新崛起的革命中國，她聲稱代表著一種普世的力量而令舉世矚目，老是提心吊膽。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它具有一種悲劇性的特質，因為在人們的心中，中國的偉大遠遠超過了它今後實際所能達到的地步。（王賡武 1994：364）

在第二章的歷史分析中，我們瞭解到僑務政策與戰前海外民族主義的緊密關連，如何改變了僑社的原有結構，使海外僑民間接地參與了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但隨著二次戰後國共內戰衝突引起僑胞的不滿，以及國民黨失敗之後遷守台灣，祖國政權分據兩地對峙，海外僑胞雖為此而分裂，但冷戰的結構很快地便將僑社的分歧冷卻下來，在紅色陰影之下，許多國家都一致地採取了「國族化」（nationalizing）的政策：嚴格的邊境管理，導引移民歸化、提倡愛國教育、杜絕一切與共產祖國的聯繫等等，使國際局勢緊張進一步鞏固了以「民族國家」作為合法性共同體的唯一形式（Wimmer 2002），各地也進而上演一齣齣的整合革命。

因此，在分析了僑務政策如何在台灣重新延續以及其意識型態之後，我們還需要回答另一個問題：僑務政策如何可能？如果就如王賡武所認為的，戰後的發展已使海外華人在「國族化」的壓力下把注意力轉向當地政治、華僑的時代已不復存在，則是什麼樣的原因讓僑務政策仍得以維繫？雙十節在電視上出現的僑胞從哪裡來？僑生要什麼總是源源不斷？僑團組織為何年年回國參訪？這些都是本章所欲嘗試回答的問題。

本章的論點建立在下列幾點事實的認定上：

首先，二次戰後，各國程度不一地進行各種「國家化」（或「國族打造」）的工作，但這樣的工作絕非孤立化的存在，而是建立在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對立陣營之間的國家體系之下，和國內複雜的原生情緒、族群比例、階級矛盾與政治鬥爭的互動中，在以「穩定」而非「民主」的前提下¹，追求現代化與民族自

¹ 有關美國冷戰時期在以追求穩定而非民族的原則下，在全球各地扶植軍事或威權政府，可參考Robinson（1996a,1996b）的精彩分析。

尊的過程。

其次，就海外華人來說²，由於中國大陸陷入了共產統治，加深了全球左右陣營的緊張關係，生活在所謂「自由地區」中的各地華人，尤其是佔東南亞總人口百分之五的東南亞華人，地理上與祖國接近使該區域的華人容易被懷疑成爲中國共產黨所操作的「第五縱隊」，演變成爲區域性的「華人問題」。

最後，在冷戰思維中被劃定爲在「自由陣營」、並代表「中國」的國民黨政府，也成爲了東南亞各地華僑的「祖國」。美國在圍堵中國的政策考量上，除了在國內縱容國民黨在僑社的活動（麥禮謙 1992; Ng 1991; Bary et al. 1976），同時也認爲如果在短時間內無法改變華人對祖國的忠誠，則希望台灣能成爲「導引」東南亞華僑團結反共的集結點（rallying point）（趙綺娜 1995; Chang 1988）。因此，不管是在主觀上偏安的國民政府希望爭取海外華人以穩固其國際地位，或是在客觀條件上的對「自由」中國的角色期待，都使得戰後的僑務政策能找到適當的舞台，延續國民黨的「華僑時代」。

因此，站在上述的論點之上，本章的安排順序，第一節是從區域格局的角度，討論中國（共）戰後對東南亞³的外交和僑務政策的歷史演變，並進一步分析中國與台灣在華僑政策上的異同。其次，我將分別以兩個「僑居地」的個案－馬來西亞和美國，透過討論不同的建國意識與少數族群政策，如何使他們在不同的面向上成爲了「光顧」僑務政策的「顧客」。最後，藉由 Brubaker（1996）提出的一組三角關係的概念模型，我將綜合上述的關係互動，以分析本文個案究竟座落在什麼樣的位置和複雜的政治關係。最後再進行本章的總結。

第一節 東南亞華人問題：國家體系下的族群性⁴（ethnicity）管理

1.1 「華人問題」產生的歷史原因：

位於亞洲的兩大「巨鄰」－印度和中國分據於北部和西部、由半島和大小不

² 除了部分屬於「紅區」的 1975 年以前北越華人、1959 年以後古巴華人之外。

³ 在冷戰時期，中美關係對立，所以並沒有所謂中國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因此這裡只討論東南亞部分。

⁴ Ethnicity 也可被翻作「族群屬性」。作爲一重要的關鍵字，不同派別的族群理論對此會有不同的定義。本文所抱持的立場是「非工具化意義下的情境論」，即承認族群作爲個人連結自我和他人、過去與未來意義下所表現在文化特質上的持久性（resilience），但也不否認在族群分類上的建構特質。因此在族群性的定義上認同 McKay & Lewins（1978）以「ethnic awareness—ethnic consciousness」和「ethnic category—ethnic group」以這兩個向度來界定族群性的強度和面向。同時也認爲現代國家和現代性的全球散佈是決定族群性走向的重要介面，這點與 Benedict Anderson 對民族主義的看法極爲接近。

一的島嶼群所組成的東南亞，長期以來便是一個神秘地、不為多數西方人所瞭解的地帶（Hall 1983）。在歷史上，東南亞分別受印度和阿拉伯文化的影響，也曾在明朝鄭和七下西洋的影響下向中國朝貢。從 14 世紀到 16 世紀以前，許多歐洲人在訪問中國之後取道東南亞返國，開始在遊記中留下一些地方性的紀錄。一直要到 1511 年葡萄牙佔領了馬六甲王國，控制了東西貿易的海峽商道之後，開啓了歐洲重商主義下對東南亞殖民的時代。隨後西班牙人、荷蘭人接踵而至，到了 19 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之後，開始亟欲尋找貿易市場和工業原料，英國才逐漸取代葡、西、荷的地位，成爲東南亞最主要的殖民帝國。二戰以前各殖民地勢力主要爲：英國佔有緬甸、馬來亞半島、婆羅洲等地；法國佔有越南、寮國、柬埔寨；荷蘭佔有印尼群島；葡萄牙剩下東帝汶；美國則取代西班牙，佔有菲律賓（梁志明 1999）。

殖民主義帶來的，除了逐漸將此區域帶進資本主義世界的運作系統之外，基於管理上的方便，也從附近人口密集的大國，包括中國和印度，以契約勞工的方式引進廉價的勞動力，而逐漸改變了區域的人口生態。因此，當各地沿著殖民宗祖國的統治界線先後獨立之後，面對國內分散在不同階級、職業、地域、親族、宗教、語言等的人種，要如何整合成爲「一個」民族國家，也就成爲了新興國家發展的第一道難題。

1.2 中國對東南亞的外交與僑務（華人）政策

中國在 1949 年建立了共產政權之後，便希望能主動爭取和團結鄰近的弱小民族，以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剝削。但中國很快地便瞭解到，在各國主權意識已逐漸高漲，在建國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敏感時機，華僑只有加入當地國籍，才能免除當地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排拒。此外，中國也開始瞭解所謂的「華僑問題」已經成爲了中國與鄰近各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最大絆腳石，華僑在經濟上的相對優勢使得東南亞各國無法忍受華僑擁有雙重國籍的身份，因此一旦華僑問題不解決，則外交的困境便無法突破。在此情況下，中國對於海外華僑的政策，乃是建立在「華僑政策是外交政策的一部份」，以外交先於僑務爲原則，在保護國家利益之上，盡可能也保護華僑利益。儘管得此結論並不困難，但在執行上的拿捏卻是困難重重。從 1949 年到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間，中國對於海外華僑的態度，大體上可分爲下列四個階段：

首先，從 1950 到 1955 年乃是「僑務先於外交」的時期，爲了反擊美國和打擊國民黨政權，在憲法上仍延續過去以「保護華僑的正當權益和利益，保護歸僑、

僑眷的合法權利和利益」，並以爭取華僑在政治和經濟上支援祖國革命、呼籲華僑應在政治上認同與在經濟上協助建設新中國（莊國土 1992）。並但如此一來必然引起東南亞各國的緊張和疑慮，深怕中國會藉由海外華人來「輸出革命」，加上活躍於泰馬邊境和婆羅洲的許多共產主義者，華人色彩極為鮮明，因此在這期間，東南亞各地便有許多人以「親共」或是「同情共產黨員」的罪名驅逐出境或判刑，單以英殖民下的馬來亞便有高達三萬五千人被驅逐（崔貴強 1989）。

面對各地日益嚴重的排華事件，中國往往只能以抗議和聲明的方式表達關切。當時中國只與三個以武力獲得獨立、對西方勢力具相對自主性的越南、緬甸和印尼建立邦交，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在華人政策上便比其他國家來得寬鬆⁵。而其他各國在西方宗主國的主導下⁶，直到七零年代中期才逐漸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但除了缺乏外交途徑之外，中國缺乏軍事、經濟上的相對實力，也使「保護僑民」的口號淪為空談（莊國土 1992；崔貴強 1989）。但無論如何，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在海外鼓吹反共，中共也無法坐視不理。1951 年中國針對新馬地區日趨嚴重的排華事件，便透過民間非正式的途徑要求英國允許「中國人民救濟馬來亞難僑調查團」進入馬來亞，以調查各地華僑的受難情況。但事實上以當時的局勢來看，各界也早已料到英國不可能答應這樣的要求，因此中國的動作被視為是刻意以戲劇化的大動作，以向海外僑胞顯示中國的已盡了最大的努力（Fitzgerald 1972：82）。

第二階段則是從 1955 年萬隆會議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這段期間中國已開始瞭解雙重國籍的敏感性，開始將僑務放在外交整體利益之下進行考慮。1954 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在 1141 位代表中，其中仍有 30 位為華僑，代表當時世界上一千多萬的僑民。此舉引起僑居國的不滿，在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從中調節之下，兩國先在 1954 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共同發表了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接著隔年在印尼萬隆召開了第一個在沒有西方國家參與之下、與 29 個來自亞洲和非洲的新興國家所共同召開的國際性會議，進一步將五項原則發展成為十項原則。因此，在此原則之下，中國和印尼簽訂了中印「關於

⁵ 事實上，戰後東南亞的排華問題主要是源自個別國家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包括經濟上的不平等、華人在族群性的堅持、殖民分而治之下的結構差異等等。而唯一的外部因素，主要是對中國的巨大以及對華人在政治上的長期不信任所引起的，這樣的不信任結果也演變成爲惡性循環，使華僑希望能從「祖國」身上得到保護，關於此點下文會進行更細緻的討論。

⁶ 因韓戰爆發使中國和西方聯軍，包括美國、英國、法國、荷蘭都成爲了交戰國。在這些宗祖國的影響下，東南亞各地反中國或恐共的聲浪並不小。但必須注意的是，英國在考量到其於中國華北經營的煤礦投資，以及香港的主權等等，爲了確保中共負起「國際義務」，即承認中國過去所訂立的一切條約，英國在 1950 年 1 月便承認中共政權，與之建立邦交。

雙重國籍問題條約」，以「鼓勵華僑加入當地國籍」，但以選擇國籍以「自願為原則」，作為中國願意解決華僑國籍問題的樣版。隔年在接見新加坡首席部長馬紹爾時，中國也同樣援以此例，希望能解決新馬華人的國籍問題。

儘管如此，並不意味著從此之後華僑問題便迎刃而解，中國在面對嚴重的排華事件時，也同樣無法坐視不理。以總人口數八千萬，華僑人數約為兩百萬、僅佔 3% 的印尼⁷來說，早期曾經採取較為寬鬆的歸化政策，但卻只有三分之一的華僑原意入籍，其後印尼民族情緒高漲，開始提高華僑的入籍要求。1958 年，印尼政府頒佈法令，規定島際間的貿易只許第三代的印尼籍公民經營，把入籍不久的華人排除在外。隔年又頒佈禁止外僑從事縣以下的零售貿易，數十萬的華僑因此失去營業的許可。同年菲律賓也頒佈類似法令，以「零售業菲化案」來消滅華僑在經濟上的控制。到 1959 年印尼更進一步限制外僑的居住地，強迫約 40 萬的華僑必須要從鄉鎮地區遷移到某些指定的地區，終於引發了中國的介入。1960 年中國的僑務主任廖承志於元旦向華僑廣播時表示：「我國政府正積極準備接待回國的僑胞，回來幾十萬、幾百萬，我們都歡迎。」（莊國土 1992）為此，從 1960 年到 1967 年間，中國派船從印尼載回了將近十萬名的華僑，不久中國和印度因邊界問題爆發戰爭，2300 多名華僑被印度政府關入集中營，同年亦被接回中國。到 1965 年印尼爆發政變，右派勢力又掀起大規模的反華運動，中國在多方交涉之下又決定撤僑，這些僑胞包括北部蘇門達臘的一萬多人和西加理曼丹的三十五萬人，但由於此時中國已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內部矛盾中，直到 1967 年為止，只撤離了 4251 人，其他遲至 1970 年僑胞仍留在那裡（Suryadinata 1985）。

第三階段則是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渡過⁸。在此期間，中國國內對於任何具有「海外關係」的人都視為是「反動」和「特務」份子，宣揚「有海外關係的無好人，信任他們無根據，接觸他們無好處」的口號，將歸僑、僑眷視為「黑七類」，實施「六個不給」政策：不給出國、不給探親、不給通信、不給通匯、不給外籍華人回鄉、不給華僑回國定居，把「僑匯」視為是「特務經費」、把華僑回國探親視為「里通國外」、把華僑捐獻更視為是「收買人心，與共產黨爭奪領導權」，甚至連從事僑務工作的僑務幹部也被視為是「走資派」（任貴祥 1999）。另一方面，這種「極左」的思維也滲透到海外去，公然支援海外的共產革命運動，因而也嚴重破壞了中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關係。此時中國陷入封閉和鎖國

⁷ 以 50 年代的人口比例為準，資源來自 Hall（1982）。

⁸ 事實上中國國內對海外華僑的排拒，早在 1957 年便開始。批判者認為華僑政策中有太多「右派言行」，認為將「歸僑的資本階級以特殊化方式」處理是最大的錯誤。因而強調應該要對新歸僑「回來一批、改造一批」，把華僑農場視為「改造華僑的基地」。但此段期間尚未影響到國家對外的政策，中國中央對此亦適度進行調整，但是到了 1966 年連中央也控制不了了。

的時代，海外華人與中國的聯繫也受到嚴重打擊。

文革結束之後，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一共有高達六萬五千件關於歸僑和僑眷的「冤錯假案」需要平反，同時文革期間被佔領的房舍也逐步歸還，並重新安排和安置因具「海外關係」而長期被歧視並到鄉間勞改的知識份子回到原有職務。但無論如何，文革期間也有大量的歸僑逃離中國，根據非正式的統計，從 1967 年到 1972 年間，有高達四十萬的歸僑又重新踏上離國出走之路(Suryadinata 1985: 67)。

到第四階段則始於 1977 年鄧小平開始重新掌握權力，在「四個現代化」的口號下，重新回復過去的僑務機構，以號召華僑協助中國建設、積極投資中國等。在此期間，除了對內改善過去的錯誤政策、強調「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之外，對外則又重申華僑應對居住國履行義務、不贊成雙重國籍政策等等，以減少各國疑慮，但在工作方向上，則致力於爭取所謂的「華僑上層工作」以及對台灣和港澳的統戰工作為主，強調中國與華僑在經濟、文化上等非政治性的聯繫，並進一步發展所謂的「民族團結論」：團結所有海內外華僑華人共同爭取整個中華民族大團結局面的形成。

在這期間除了 1979 年中國和越南在華人問題之上產生嚴重分歧並爆發戰爭之外⁹，中國的海外華人政策大體而言是藉由不斷的重申中國對區別華僑與外籍華人的立場，以及在「國家關係」發展的前提下，開拓「民間」的貿易和文化交流，以減低各國的疑慮。同時，其所針對的華僑對象，也鎖定在所謂的「上層華人」，即集中在歐美先進國家的傑出科學人才和商業菁英之上，以協助中國現代化為主。

總結來說，中國大陸政權在建立之後，除了在開國的前五年經歷了一段摸索期之外，其後的華僑政策思維，基本上都是放在「外交—僑務」的模式下，以先維護國家利益、才能保障華僑權益的思維，與個別國家進行互動(Esman 1986; 吳前進 2003)。這段期間儘管在原則上幾經翻轉，而在面對實際的國際政治互動中，也很難完全按照所構思的路徑發展，但無論如何，就與所有後進國家所追求的共同體目標的兩難一樣，如何能夠在成爲一個「被公開視為重要，追求自己作為世界中的一員而得到社會承認」，另一方面又能「建立有效率、有活力的現代國家，提高生活水準、建立政治秩序」之間取得一個平衡，挑戰著每一個新興國家的智慧(Geertz 1999)。

⁹ 根據廖建裕(Leo Suryadinata)的看法，中越戰爭的爆發並非因越南排華所引起的，而是在 1975 年北越依靠了蘇聯的支持而統一了南越，並且在 1978 年進攻柬埔寨，引起了已進入「聯美制蘇」階段的中國緊張，因此借華人問題而發揮。相同的看法可見 Chang C.Y. (1981)。

1.3 中共與國民黨之僑務政策比較分析

國民黨政府在上述東南亞區域結構中又扮演注什麼樣的角色？從外交關係來看，儘管國民黨在聯合國中仍然以代表中國，但事實上在東南亞各國中，只有四個國家與台灣保持不同程度的外交關係（見表一）。

表一：中共、國民黨與東南亞各國的外交關係

國家	獨立日期	華人人數/華僑人數	與中國建交/斷交	與台灣建交/斷交
緬甸	1948	70 萬/--	1950	n/a
印尼	1945	600 萬/30 萬	1950/1965,1990	n/a
寮國	1954	1 萬/--	1962	1959/1962
馬來西亞	1957/1963/1965	435 萬/22 萬	1974	1964*/1974
泰國	n/a	450 萬/28.3 萬	1975	1950**/1975
菲律賓	1946	100 萬/15.8 萬	1975	1955/1975
越南	1954	70 萬/--	1975【北越統一】	1955【南越】/1975
柬埔寨	1953	5 萬/--	1975	n/a
新加坡	1965	192 萬/0.3 萬	1990	n/a
汶萊	1984	40 萬/3 萬	1991	n/a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乃維持總領事館關係。 **泰國在反共的理由下，「延續」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

一般咸認，在面對各國「國族化」的政策上，台灣乃是以「僑務先於外交」的原則進行外交活動，因此與中共形成對比（Fitzgerald 1972：83; Chang 1981：322）。但歷史學家趙綺娜（2001）在利用外交部的亞太司檔案來重新檢視從 1956 到 1957 年的越南國籍法案的交涉過程時，卻修正了上述片面化的結論，發現台灣政府儘管「反共復國」的政策下，必須爭取海外華僑的支持，但同時卻更需要擴展其與反共盟邦之間的關係，因此當僑務和外交在實際個案中發生衝突時，外交利益仍然是優先考慮的目標。事實上在 1953 年國民黨第七屆三中全會上所通過的「加強海外工作方案」，便明白的寫著：「以外交鞏固僑務，以僑務發展黨務，並以黨務為僑務核心，以僑務作為外交後盾¹⁰」為原則。由此可看出，國民黨的僑務政策是以黨務為第一優先，其次為外交，最後才是僑務，這對於一個處在危急存亡的政權來說，似乎也是必然的選擇。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仔細地去對照在戰後東南亞各類「知名」的排華事件中，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反應和救援行動，事實上亦符合上述的政策優先順序。例如

¹⁰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1956）《加強海外工作方案》，頁 8。

從 1958 年到 1959 年間，印尼政府在鎮壓國內的叛亂軍中竟發現有美式武器，判斷武器都是經由台灣轉運而來，便認為台灣國民黨政府是幕後的指使者，開始對國內華僑社會的國民黨勢力進行大規模肅清行動（寶文金 1996）。但與此同時印尼也頒佈了一系列打擊印尼華僑經濟地位和限制居住的法令，為此中共在多次交涉下派船將華僑接回，但在國民黨的官方記錄中，只強調援救被驅逐之「忠貞」僑胞¹¹。往後 1963 年爆發了更嚴重的排華運動，代表右派勢力的軍方發生政變，推翻原本較親共的蘇卡諾政權，此後 1965 年在蘇哈托所建構的「新秩序」統治下，實行了強制性的同化政策，也對華人設下多項歧視性的政策¹²。對此，在國民黨官方的出版物中從未提及，相反的在 1967 年卻記載著：「自印尼反共人士當政後，對我態度轉趨友善，並有旅印僑商來台接洽貿易，從事促進兩國的友好關係。我方也組團赴印尼訪問，簽訂中印民間貿易協定事宜¹³」。

1.4 小結

總結而言，東南亞各國長期的殖民歷史改變了其原來的族群風貌，使得其在獨立過後仍必須小心翼翼地管理國境內各種族群與原生情緒的挑戰。中國對於海外華僑的政策，從一開始將之視為是建設祖國的力量，到後來在瞭解到雙重國際的敏感性對外交關係的傷害，便以自願為原則鼓勵華僑歸化當地，以減低各國疑慮，也並定下了以「外交－僑務」的架構下處理族群性的問題。其後因文化大革命使得僑務工作嚴重受挫，直到 1976 年改革開放之後，僑務的工作已不再針對護僑保僑，而是積極地動員所謂的「上層工作」，以協助中國進入現代化的工作。

台灣在此相較之下，儘管整個僑務工作遠比中國來得穩定，但其作用也僅限於在所謂的「自由世界」之中。同時，僑務政策儘管是以「反共復國」為前提，但如果進一步細究其邏輯，則可發現政策之優先順序是以「黨務－外交－僑務」為原則。事實上，對於一個面對「國土嚴重流失」的偏安政權來說，其首要目的必然的是以保衛政權為主，透過各種意識型態的控制和可動用的資源，發揮最大的邊際效益。不管這些資源的投入是在邊際效益已趨近於零的情況下，而顯得徒勞無功；還是從一個長期投資來看，真正的效益尚未發揮出來，僑務政策對於國民黨來說，有歷史上的意義，也是危機處理上的需要。

但無論如何，僑務政策作為一個跨越國家邊界、挑戰戰後「國族化」共識的政治實踐，必然地需要在一個相對應的國際情勢之下，才有發揮的可能性。同時，由於「華人問題」對於東南亞各地政府來說，也是一種對「巨鄰國家與其離散民

¹¹ 僑務委員會（1982）《僑務五十年》。

¹² 強制更改姓名，但卻在身份證上以 0 表示其種族，使之無法在政府單位工作（莊國土 2003）。

¹³ 僑務委員會（1990）《攜手走過的歲月－中華民國僑務發展歷程》，頁 127。

族」產生的疑慮和不信任 (Esman 1986)。因此，此種不信任會因為「巨鄰政府」的華僑政策而令人擔憂，但也會因為不同的少數族群政策、建國意識型態和族群人口結構等，使兩國關係惡化（或和緩），形成一種相互關連影響的三角關係。因此接下來的兩個小節裡，鏡頭必須要轉進個別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與族群政治，才能對僑務政策的開展結構有更完整的瞭解。

第二節 選擇性的國族建構與單邊的同化主義：以馬來西亞為例

至少到目前為止，使華人與馬來人在單一國家聚集在一起最有效率的力量是彼此的恐懼。如果聯邦解體，他們就可能變成在某個其他政治網絡中明顯被淹沒的少數民族：馬來人怕華人併入新加坡或是中國；華人則怕馬來人併入印度尼西亞 (Geertz 1999)。

2.1 個案挑選的理由和本節主要論點

本節挑選馬來西亞¹⁴作為分析個案，主要在於，馬來西亞長期以來便是台灣「僑教政策」的主要受惠者¹⁵。許多的台灣人或許不能理解，為什麼馬來西亞的華文初級教育能辦得那樣成功？甚至也質疑為什麼馬來西亞華人「不好好當馬來人就好？」¹⁶因此本文藉由對馬來西亞獨立後的族群政治，如何影響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發展歷程予與分析，以解答上述的疑惑。

本文的主要論點可概述如下：在特殊的殖民歷史和人口結構下，馬來西亞在獨立後便逐漸走向以「馬來人優先」(Malay-first)的政治結構。1969年族群衝突之後，馬來人所主導的政治霸權地位已經幾乎不可動搖，而形成了一種以族群為界線的侍從政治。華人在政治上的失意使其將「華文教育」視為是民族存亡的「最後堡壘」。在1972年，原本在國家教育法令打擊之下苟延殘喘的華文獨立中學，開始起死回生，並吸引在「新經濟政策」被犧牲的中下階層的支持和響應。隨著政治結構的日益「族群化」，自然也會反映在文化和教育之上，並因循過去殖民時代的「複式社會」結構。此結構使得在現代國家建立之下的「國族打造」、「國族化的同化」，是「選擇性的」國族打造、更是「單邊的」同化主義。

¹⁴ 這裡只討論位於馬來半島的西馬政治，而不討論位於婆羅洲北部的東馬。

¹⁵ 扣除港澳的話，馬來西亞留台生人數最多，目前已累積至三萬多人，約佔總人數三到四成。

¹⁶ 中國時報 (2003)〈外國學生變少，國際化出現危機〉。陳榮裕調查採訪。三月十八日。報導指出「有一名民進黨重要核心人員最近到馬來西亞，向當地僑社說：「你們怎不好好當馬來人就好」，讓許多當地華人明顯感受，現在的台灣政府更不重視、支持海外華人。」儘管筆者對此報導的真實性存疑（有很明顯的政治針對性），但無論如何問題的答案也不是所謂的「延續中國五千年的輝煌文化傳統」那樣的理所當然，因此本節的分析主要是針對此問題進行分析和說明。

2.2 殖民歷史與戰後政治結構的發展：從「複式社會」到「族裔國家」

位於東南亞區域中心、處於東西航運往來重要地帶，馬來亞半島是殖民時代控制貿易往來的必爭之地；也因人口往來流動頻繁、成爲中國第一個駐外設館的地方。由於交通的便利，在國境相對開放的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二零年代以前，大量的華人湧入馬來半島的西部平原與城鎮地區，除了扮演著讓物暢其流的中間商、也是採集礦產的廉價勞動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華人在人數上，已逐漸逼近本地的「原住民¹⁷」人口，成爲了東南亞華人最密集的分佈地，人口接近三百萬。在二次大戰以前，新馬一代的華人往往抱持「僑居」心態，在許多南來的民族主義者的帶領下，心繫於中國政治的發展。儘管完全投入中國政治的激進份子仍是少數，但他們存在或多或少都影響了戰後馬來亞的政治結構（Wang 1970：23）。

英國對馬來半島的統治，乃是以逐步佔領的方式，將之劃分爲直接統治的「海峽殖民地」，包括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其他則是間接統治的「馬來聯邦」和「馬來屬邦」，即與原有半島內的各個小王國簽訂協議，讓蘇丹保留其「名義上」的統治主權，而英國則派「顧問官」左右政事。儘管直接統治和間接統治對於英國人來說並無嚴格的界線，但華人在不同的政治系統下，對政治的參與度卻因此而有所差異，大體而言，在直接統治的海峽殖民地，華人在政治上較具影響力（Wang 1970）。而另一方面，此種差別式（differentiated）的治理方式，以及針對不同族群的經濟功能的區隔的分配，便成爲 Furnivall 筆下的「複式社會」結構。

1945 年日本投降之後，英國在回到馬來亞重新建立軍事統治、頒佈戒嚴以鎮壓當地具左派色彩的人民抗日軍，同時也支援法國和荷蘭以恢復兩國在東南亞的宗主國地位。但在美國主導之下的反殖民浪潮，終究使英國必須放棄其廣大的殖民利益，並開始一系列的「非殖民化」過程。從 1946 年到 1957 年馬來亞聯邦獨立以前，英國先後提出了「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和「馬來亞聯合邦」（The Federation of Malaya）的計畫。前者試圖打破過去二元統治（直接與間接）的區分，將馬來亞半島連同檳城和馬六甲整合在一起¹⁸，並且打算在特定的條件下，廣泛地授予境內的「非馬來人」公民身份¹⁹。但此舉即刻引起了馬來人的強烈抗議，同年便成立至今仍以代表馬來人土著利益的「巫統」（UMNO），與英國政府展開政治協商。

¹⁷ 「原住民」顯然是一個相對化的指稱，甚至是政治建構下的神話，至今馬來西亞的華人還是認爲，馬來人也跟華人一樣，是逐漸從印尼群島遷居而來，而真正的原住民現在仍過著沿海打魚、山上採獵的生活，如沙蓋人。

¹⁸ 但新加坡則被分割出來，成爲「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¹⁹ 若根據此項規定，則有高達 83% 的華人可立刻取得公民身份。

到 1948 年英國又提出了「馬來亞聯合邦」計畫，開始承認馬來人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並認定只有作為蘇丹臣民的馬來人具有完整的公民權力，非馬來人必須要通過歸化條件，才能獲得公民權。在此嚴格的限制下，只有 20% 的華人能即刻得到公民權。這項政策同樣引起華人的不安。一些長期以來與英國殖民政府密切往來的海峽華人，開始發覺到在此計畫下，自身命運是與整個華族聯繫在一起的，便於 1949 年組織代表馬來西亞華人利益的「馬華公會」(MCA)，積極爭取華人的政治權利。最後在馬華公會的多次商協之下，只部分修正了英籍華人的居住年限，但也進一步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公民權：土著公和非土著民權，奠定了往後「馬來人優先」的政治格局。

1957 年，馬來亞聯邦獨立，華人在承認馬來人在憲法上保留「特權²⁰」的條件下，換取公民身份。自此之後，也開啓以族群為界線的「協合」(consociation) 政治 (Lijhart 1969)，來自不同族群的菁英組合成聯盟政府，利用族群之間的恐懼和不信任、廉價地動員了族群內部的支持，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族裔國家」(ethnocratic state) (Haque 2003)，並且在馬來人口的「多數的建構²¹」之下，進一步加強了馬來人統治的霸權。1965 年新加坡因挑戰馬來人特權而被迫退出聯邦，到 1969 年便爆發了因不滿選舉結果而產生種族衝突的 513 事件，自此華人開始才認識到，馬來西亞「就是」馬來人的國家，不許有任何的挑戰。較溫和的開國之父也因此下台，代表馬來人的鷹派勢力取得控制權，進一步以改造社會、消滅貧窮為由，頒佈二十年的「新經濟政策」，明訂工商業的股權分配比例。其後更逐步地透過修憲，剝奪國會質疑國語地位、統治者地位、馬來人特權及非馬來公民權的質詢權力；廢除地方與縣市議會選舉、由官委議員擔任、限制人民集會遊行等等 (張亞中 1997)。

2.3 華文教育的發展：政治挫敗中的補償機制

政治的族群化結構自然也滲透到文化和教育領域中。1971 年馬來西亞大學召開了一場「國家文化的基礎」研討會，會中清一色的馬來知識份子，強調「回教是塑造國家文化的重要元素」、「國家文化必須以本地文化為基礎」等等。其後政府開始透過國家的制度力量，將文化進一步地「客體化」，排除不符合官方認

²⁰ 整個特權的結構基本上是延續了英殖民時期「分而治之」之下的利益結構，包括不允許非土著購買的馬來保留地、大學採定額入取、公共服務優先等等 (cf. Means 1972)。

²¹ 在民主政治的多數原則下，數字是新的權威。馬來人為了「成為」多數，在人口普查時便將一些游離於「其他」的少數族裔，通通歸為馬來人 (Hirschman 1987; Nagata 1981)。在同樣的理由下，為應付新加坡的加入，也將隔海的沙巴、沙勞越邀入聯邦，將國民從「馬來亞」改為「馬來西亞」。同樣的，華人面對他者的威脅，過去以方言群和宗親為主的社群生活，也融合成為「華人」的類別中，休戚與共。

定民俗文化，如華人新年放鞭炮的傳統、舞龍舞獅、中秋節提燈籠等等，透過警察來監督制止，而引起了華人的不滿（林開忠 1999）。而在教育系統中，由於長期以來華人就已經習慣仰賴社群內部的經濟力量，建立獨立於政府之外的私人教育。但戰後在「國族化」的要求下，所有學校都被要求收歸國家教育下管理，華人從一開始以爭取將「華語」列為官方語文，到後來一路落敗、只求「確保」華文小學的性質不變（楊建成 1982）。自此，華語被定位為少數族群的母語，僅允許存在於小學初級教育中，國家則透過補助的利誘方式，促使原有的華人中學教育接受政府的漸進式改造方案，以取得教育補助經費。在六零年代的十年間，原本 71 間的華文中學一一失守，高達 54 間學校接受政府改制（林開忠 1999）。

但 513 事件的刺激、新經濟政策對華人中小企業的排擠，開始激發華人社群的危機意識。在政治的失意和不滿之中，教育與文化被視為是民族存亡的最後堡壘。1972 年，因開採錫礦而吸引大量華人定居的霹靂州，開始發動「獨中復興運動」，透過發動大型的募款活動來支助「獨立中學」的軟硬體設施，同年也有越來越多的家長把孩子送往獨立學校。最後，復興運動擴至全國，華文教育成為了「國族化」政策下的「例外」，最終奠定了馬來西亞成為中國、台灣之外規模最大的華文教育體系²²。

簡單來說，英國即便在戰後已試圖打破過去殖民時代遺留下的「複式社會」（plural society）結構，但由於語言、文化、宗教、階級甚至是職業幾乎都是沿著不同族群界線而展開，單憑政治上的制度整合來進行調整無異於緣木求魚。而華人在政治中失意進一步加深了其在文化上的擁抱，轉而尋求族群內部認同的溫暖，使族群政治的衝突內化至思想和心靈，文化不再是一種生活，而是民族的道德象徵；語言不再只是溝通工具，而是民族文化的根。長期處在這種救亡式的情緒結構中，使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反而成為了具有高度象徵和圖騰意義的「表演」，透過每年定期的公開展示，凝聚華族與文化的認同（黃錦樹 1998；林開忠 1999）。

2.4 選擇性的國族打造與單邊的同化主義：無法跨越的族群界線

但馬來西亞華人的真正困境在於，族群國家以「國族化」的正當名義掌握了少數族群文化的生殺大權，使華人長期處在惴惴不安、悲憤救亡式的情緒結構

²² 必須注意的是，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發展，除了具有在政治和經濟上作為「被壓迫者」所採取的反抗之外，華人社會的內部結構特質，包括以商人為主的社群領導，對華文教育的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有關此點可進一步參考林開忠（1999）。同時，在七零年代以前仍允許英文學校體系的存在也使華人對此的接受度較高，故教學媒介語的選擇不一定和認同有關，反而是對語言作為一種「文化資本」所採取的理性選擇。此論點在近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中，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的開始掀起中文熱，可得到證明，可參考楊聰榮（1997）。

中。而另一方面，族群身份的不可跨越性²³，又使得國家所領導的國族化政策，是「選擇性的國族打造」(selective nation-building)：建立在一個以馬來民族為絕對權威的種族國家 (Tan 2001)。而其所謂的「國家化」政策，也只是一種「單邊的同化主義」(unilateral assimilation)：只要求承認馬來西亞是馬來人的國家，馬來統治者是唯一的效忠對象，並否認民族跨越的可能性 (麥留方 1985)。

在這種情況下，華人在東南亞事實上只會是「一半」的東南亞人 (廖建裕 1998)。以「東南亞傾向」的這一半來說，馬來西亞華人 (而非華裔馬來西亞人) 有 95% 以上的華人已取得公民身份，在義務教育階段可享有母語教育的權力。在經濟生活中只要符合適當比例，經營也獲得保障。在政治權利中，允許代表華人利益的政黨出現，但不挑戰馬來人優先的原則下，可共享部分的決策權力。但就「另一半」來說，華人也保留了自成一格的社會生活，族群接觸機會僅限於經濟生活之中²⁴。華人雖然不否認馬來西亞已是其生活的故鄉，但「再移民」現象卻非常普遍²⁵。80 年代初期，有一批馬來西亞華人湧向澳洲，申請永久居留權，當時的副首相慕沙希旦公開表示，他很高興看到這些人離開，儘管他們都是專業人士和企業界的菁英；並進一步表示，如果有人不接受新經濟政策與土著優先的政策，他們應該離開²⁶。在此情況下，華人長期以來自認為是「二等公民」，認為自己是「寄人籬下」而心生不滿 (Haque 2003)。在國家認同上，華人也相對顯得模稜兩可，對中國政治發展也顯得關心，並且認為「惟有中國強大繁榮，海外華人才有保障」。

2.4 小結：華文教育與僑教政策的接連

總結而言，馬來西亞特殊的族群結構、建國意識和政治運作模式，使得馬來西亞即便經過戰後四十、五十年的建國歷程，仍然延續了過去的「複式社會」的運作模式，族群界線成為社會分類的重要基礎 (Brown 1994)。在國家政策上，以馬來人為首的族群侍從關係，也使得民主化的可能性大為降低 (Haque 2003; 張亞中 1997)。在此情況下，馬來西亞華人在政治上的失意轉而寄託在教育和文化之上，發展成為一種帶有濃厚「社會運動」特質的民間教育體系。台灣在戰後

²³ 馬來西亞規定，華人不能取馬來名字。即便透過「改宗」信仰回教、過著馬來人的傳統生活，亦無法得到同等的特權地位 (Tan 2001)。有關這些華裔穆斯林的處境，可參考 Wang R.M. (2003)。

²⁴ 當然，華人不是鐵板一塊，王賡武將馬來西亞華人分成 A, B, C 三種團體，C 團體的本地化最深，與馬來人接觸共事機會也較多，可參考第二章第三節。

²⁵ 儘管此現象也可被視為是一種具自由解放意義的中國跨國主義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可參考 Nonini (1997)。

²⁶ 【馬來西亞】南洋商報 (2002)〈探討華人移民原因〉，詹運豪。二月二十三日。

所提供的大專教育，正好補足了馬來西亞華教在高等教育發展上的限制²⁷，成爲了「昆蟲生活史」上的「成蟲期」(黃錦樹語)：孕育了大批的留台生和中學教師，成爲了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文化的重要擔綱者(王國璋 1998)。

第三節 從「冷戰的自由主義」到「自由的多元主義」：以美國為例

3.1 個案挑選的理由與本節主要論點

在華僑人口的分佈上，美國華僑人口在 1957 年仍不及海外華人人數的 1%，但由於二次大戰美國和中國之間是同盟國關係，因此在 1943 年美國不僅放棄過去各種不平等條約，同年也取消了實施長達 61 年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開始以小額地接受中國移民²⁸。1965 年美國頒佈新移民法令，以「家庭團聚」爲原則，允許更多的華人赴美。自此之後，美國華人人口從 1960 年的 24 萬人，增加到 1980 年的 80 多萬人，到 2002 年爲止，美國境內已有 301 萬的華人，佔全球華人的總數的 8.42%²⁹。相對於東南亞來說，戰後美國對於華人移民的開放態度，再加上國民黨在冷戰結構中與美國親密的戰略關係，使得 1949 年以後僑務工作的重心開始往北美傾斜，美國僑社的動態也成爲了台灣能見度最高的地區。根據楊建成(1992)的統計，從 1972 年到 1989 年的僑選立委遴選中，美國便佔了 26%；1991 年的第二屆僑選國大代表中，有高達 70%的國代屬美籍；1992 年 160 位僑務委員當中，美籍也佔了 57 位，約 35%。因此從這些數據看來，美國在僑務工作的佔有重要地位，但我們要進一步去瞭解，在什麼樣的建國意識下，美國爲什麼對此跨國的政治實踐，相較於其他國家來說，更具有包容性？

本節的論點主要可概述如下：美國作爲一個由外來人口組成的移民國家，長期以來對新移民抱持較容忍的態度。儘管在美國的移民歷史上，曾發生長達 61 年嚴峻的排華時期，但二次戰後美國取代了歐洲在國際事務上的霸權地位，在結合了全球戰略、反共、人道主義等考量之下，美國成爲了國際移民的最大輸入國(Rumbaut 1994)。而美國國內在二零年代經歷了恐共的「麥卡錫主義」風潮之

²⁷ 由新馬華人所共同捐獻籌辦的唯一大學—南洋大學，因李光耀打擊共產活動而變質，從 1974 年開始也拒絕入取新加坡以外的華人，使台灣成爲當時獨中生唯一的升學管道。其後馬來西亞華人多次想要創立「獨立大學」，但卻得不到國家許可而胎死腹中(曾慶豹譯 2001)。

²⁸ 該法令讓原境內華人取得公民身份，並規定每年給中國 105 名的移民配額，其他包括讓一萬五千名服役於軍中的華人入籍等(Wang 1991)。1953 年美國通過了《難民救濟法》，原本只限歐洲移民，經過爭取之後中國得到約略五千個名額，爲此也成立了「赴美特別移民審核委員會」，最後協助了 807 位台灣人、5176 爲香港人和 302 位來自海外其他地區的華人移民美國(見僑委會(1957)《僑務二十五年》)。

²⁹ 僑務委員會(2002)《僑務統計》，頁 9。

後，到六零年代民權運動的風起雲湧，使得少數族裔的權益得到提升。同時當冷戰結束，少數族裔公開組織遊說團體也蔚為風潮，試圖影響美國對其祖籍國家的外交政策 (Shain 1994a,b)。因此，在結合了美國在國際上的霸權地位以及社會內部所逐漸發展出來的「自由的多元主義」(liberal pluralism)，國民黨的僑務工作在美國不僅不受限制，在恐共的意識型態下，僅剩的左派勢力也遭遇嚴重打擊，使國民黨勢力得以全面支配美國華人社會。另一方面，美國也利用台灣對東南亞的僑務政策，試圖影響東南亞華人的政治態度。

3.2 建國歷史、排華政策與戰後政治發展結構

在美國，除了一些已逐漸絕滅的印地安人之外，其人口的組成乃是由一波波的族群團體漂洋而至，再逐漸往西部擴張而成。從最早 17 世紀安格魯－薩克遜新教徒 (WASP) 的登陸，17-18 世紀大量的蘇格蘭和德國移民的湧入，以及大量黑人奴隸的販運，到 19-20 世紀初的愛爾蘭人和德國遷居，不同時期移入的白人族裔之間儘管也產生偏見和歧視，但大體上已形成了一種穩定的政治結構和主流文化，也佔據了國家上層的發言位置，成為了美國社會的重要主體。

其後美國在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往往依循勞力市場原則、接近放任的方式開放外來移民勞工進入，補充資本主義發展所需的勞動力。以華人來說，19 世紀 50 年代美國加州所興起的淘金熱，便是吸引華人橫渡太平洋的主要動力。同時，華人也常被雇用來建築當地鐵路，促進東西貿易發展等 (麥禮謙 1992)。在經濟誘因的影響下，華人從 1950 年只有 450 人抵達美國，到 1952 年突增至 2716 人，到了 1953 年更飆升到 20,026 人，其後一直到 1882 年美國頒佈了《排華法案》，每年平均有九千多人入境美國³⁰，但美國對於這些廉價的勞動力採取了排斥和拒絕的態度，也否認華人具有歸化當地的權力。因此在這期間有高達 47.6% 的回鄉率，其餘的華人一直到法令鬆綁之後，才逐漸構成了所謂的「老僑」世代。

從 1882 年到 1943 年之間是一段長達 61 年的排華時期。此時，美國西部的經濟基礎建設已大致完成，白人透過鐵路開始大量移居當地。1880 年美國與清廷簽訂合約，修改允許華工出洋規定，限制只有外交人員、教師、學生、商人和遊客這五類人才有資格進入美國。1882 年又宣佈十年之內禁止華工入境、規定禁止外籍華人美國國籍、禁止通婚等等，到 1988 年更禁止暫時離境探親的兩萬名華工重返美國。到 1924 年提出《移民限制法案》，更進一步明訂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東印度人和其他亞洲和大洋洲的土人不能入境，一直到 1965 年才

³⁰ 總數約三十萬人，數據主要參考 Yang (2000) 表一，作者自行計算。

取消（麥禮謙 1992）。在排華政策下，美國的華人人口從原來的十三萬人，到 1900 年已減少了三成。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流亡者也開始把勢力伸入美國，華人在具有敵意的環境下，對祖國的政治參與也顯得更加熱烈（麥禮謙 1992）。但無論如何，礙於地理上的限制，美國華人對於祖國政治的參與主要表現在革命籌餉和經濟投資之上³¹，土生華裔在美國所習得的飛行和技術，對後來北伐與抗日亦有特殊的貢獻（麥禮謙 1992）。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開始扭轉上述的排華政策。分據太平洋兩岸的大國，在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逐步擴張之下，轉而成爲利益的共同體。新一代在美國受良好教育的華人菁英，也開始在中國政治事務上嶄露頭角。抗日活動的迫切和激情將美國華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拉到最高點，從定額捐輸、抵制廢鐵運至日本、發動輿論譴責、義演募款、航空救國等等，美國華人透過綿密的組織網絡，全力將各種資源投入抗日活動，到 1942 年南洋一帶相繼淪陷，美國華人所捐款項更成爲了主要的抗日經費。中國如火如荼的抗日活動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同情，一些知識份子、傳教士和工商業領袖也發動籌款賑濟中國傷兵，使原來排華的氣氛逐漸轉變爲援華活動，一些社會領袖也開始組織「撤銷排華法律公民委員會」，會員分散各州，以遊說國會議員支持撤銷法案（麥禮謙 1992）。

二次大戰讓美國打破過去所抱持的「孤立主義」，透過其日益強大的國家實力取代歐洲帝國在東亞的政治勢力。但無論如何，美國作爲一個超級大國，其在建國意識上所抱持的自由民主原則，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提出的民族自決口號——「威爾遜主義」，終究使其在處理國際事務上顯得更爲保留和謹慎。1950 年韓戰爆發之後、國際冷戰結構隨之確立，美國以其長期反共的政策³²，成爲了領導資本主義對抗共產主義的世界領袖。

3.3 維持國際秩序的新角色：從扶植獨裁政權、打擊共產勢力到開放的移民政策

此一新角色的扮演，首先表現在其外交上的干預政策。在核武威脅的陰影中，美國和蘇聯在世界重要戰略地帶設置了一種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侍從關係」（patron-client），透過大量軍事上的援助、穩定經濟的金援等等，從屬國在外交

³¹ 從人口比例來看（約 100:3），美國華人對祖國政治的參與程度是偏高的，但多數表現在革命資金的捐獻和經濟投資之上。以革命起義捐獻來說，星馬佔了 25.86%，美國佔了 8.84%（陳樹強 1995）；另外根據麥禮謙的估計，1949 年以前美國華僑在中國投資便佔了 13%、抗日經費也佔了五分之一，這一方面當然是因爲美國華人生活水平和收入比較高，但也是華人在具高度敵意的環境下，受到民族主義鼓舞的具體表現（麥禮謙 1995:241,290）。

³² 美國總統威爾遜曾經介入俄國革命，試圖阻止共產黨取得政權，蘇聯成立後，美國也採取不承認政策。（張淑雅 1998）。

和軍事戰略上必須要配合支配國的利益 (Shoemaker et.al. 1984)。因此，美國在圍堵政策下的前線地帶，扶植了許多獨裁但卻親美的極權/權威政權。在追求世界秩序「穩定」的前提下³³，美國也縱容甚至是配合一些獨裁政府壓制其海外反對勢力和政治流亡者 (Shain 1989)。台灣在此結構中，也成爲了西部戰線下的重要集結點。而國民黨政權在存亡之秋，只能完全依賴美國以求生存³⁴。1953年11月，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在東南亞一帶作巡迴考察之後，發現南洋學生北歸情況極爲熱烈³⁵，隨後經過台灣時，便建議台灣擬定爭取僑生來台升學之計畫，擴大辦理僑生教育工作，所需經費由美援款項支付³⁶。

其次，1949年中國共產政權成立之後，實施「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在韓戰中又與美國直接作戰，使美中關係旋即又陷入冰點。美國開始下令凍結中國在美國的一切資產、禁止中國的科技學者和留學生返國、停止一切僑匯等等，切斷美國華人與大陸的一切聯繫。此時，美國社會的反共氣氛也日益高漲，參議員麥卡錫 (Joseph McCarthy)、尼克松 (Richard Nixon) 等開始散佈恐怖氣氛，以揪出共產黨爲名實則製造各種政治迫害，使得國內人心惶惶。美國華人頓時也成爲了「敵國僑民」，人人自危。因此爲了尋求自保，許多人開始需要披上一件「反共」的外套，並表態對美國的效忠。在此種氣氛下，直接助長國民黨在美國的聲勢。1951年初，舊金山的中華總會通過成立美洲第一個「反共救國總會」，接著各地紛紛成立反共分會，許多人在惶恐之下都紛紛加入。而一些國民黨黨員更乘機壓制一切在美的反蔣輿論，除了透過恐嚇手段對付報社組織之外，也向美國政府進行告密和誤陷，以打擊少數的左派勢力 (麥禮謙 1992; Bary at al. 1976)。

在此情況下，僑社中不管是中立或是偏左的報社組織、書店等，都遭受嚴重打擊而沒落。短短的十年之內，親國民黨的勢力便完全支配美國華人社會。透過各地「中華會館」理事的把持，國民黨控制了僑社輿論，同時透過對「忠貞」報社的支持，爲台灣國民黨政府進行各種宣傳。對美國華社來說，國民黨政府也成

³³ Robinson (1996) 認爲，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外交策略，事實上並不是以反共爲主，而是要確保其在全球的霸權地位，因此冷戰結束後，美國開始從扶植獨裁政府轉而推銷民主制度，事實上其內在理路是一致的。但此已超出本文範圍，謹記之。

³⁴ 有關美國對台灣政治的影響，至今仍多停留在政治經濟的層面之上，如吳聰敏 (1988)、陳玉璽 (1992)、劉進慶 (1995)、文馨瑩 (1990) 等。在政治學領域中，多半以背景方式出現，討論較多者有王振寰 (1989)。另外趙綺娜 (1991) 以最新公開的外交文件重構了五零年代美國國會議員在台美關係互動中的角色，頗值得參考，但主要是討論台灣問題在美國政治脈絡下的角色。

³⁵ 人數估計從三千多人到九千人不等。見 Marilyn Williams (1983)，新馬部分的情況見崔貴強 (1989)。

³⁶ 藉由「每招收一名僑生，補助硬體設備擴建費新台幣 18000 到 22000 元不等」的補助，台灣各大專院校爲了能夠爭取到美援的補助經費，乃大幅度增收僑生名額。以台大來說，當時僑生名額竟然占了近兩成之比例，爲此卻帶來了新的體育館、工學院等各項設施。另一方面，在美援優厚的政策補助下，原來許多經濟能力有限的華僑子弟，皆得以在全額旅費補助和生活津貼之下完成大學教育。直至 1965 年美援結束，共有 20,087 位僑生被「徵招」回國 (陳月萍 2004)。

爲了唯一與「中國」保留文化聯繫的唯一合法管道，台灣也有越來越多文化人士到美國訪問，國府也開始系統性的提供華文教材供僑校使用（麥禮謙 1992）。另一方面，國民黨也善於利用美國的民主機制，以僑社輿論壓力確保美國對國民黨的支持。國民黨除了聘僱了專業的公關公司爲國府化妝之外，每年的聯合國大會開幕前，總會在《紐約時報》刊登全頁廣告。例如 1966 年文化大革命時，當年標題便以“*The Real Voice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文則以書法寫上「全世界華僑譴責紅衛兵暴行，並反對中共政權進入聯合國」，並刊登了 43 個國家 285 個華僑社團的主持人全名，以博取讀者的信任（陸以正 2002）。

最後，美國在所扮演的新角色也表現在移民政策之上。首先，戰爭製造了大量的難民問題，許多不願意接受共產統治的東歐難民，在美國眼中成爲了宣傳鐵幕政權不受人民歡迎的活廣告。1953 年美國通過修正難民法，規定將「逃離社會主義國家」控制的人列在難民接收的第一位，同時授與司法部長在特殊案例中，可允許外籍難民進入美國。因此，台灣在《難民救濟法》中得到 2000 個持中華民國護照的名額、3000 個亞洲難民入境等。另外在 1954 年的頒佈的《難民疏散法案》也允許各國 21 萬 4 千人依法入美。此法原本只限定歐洲人，但在國府爭取之下，也得到 5 至 6 千個名額。到了 1965 美國實施新法案，以「家庭團聚的原則」允許四萬六千名移民配額給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三個地區，使華人在短短的二十年間，從 60 年代不及 24 萬人，增加到 80 年代的 80 多萬人，九零年代 160 萬人。1982 年美國又修訂新移民法，將每年兩萬個移民名額歸於中國大陸，台灣方面在「台美人」的爭取之下，也獨立爭取兩萬個移民名額³⁷。另一方面，留學生學成未歸也成爲另一種變相移民³⁸。到 1990 年美國更放寬投資移民，使企業家成爲另一支重要的移民來源（陳靜瑜 2003;夏誠華 1998）。

3.4 逐漸僵化的僑務政策

伴隨美國移民政策的開放，美國的僑社結構也逐漸產生變化。首先，隨著僑團許多老一輩的領導人物一一退休過世，年輕一代的土生華人已逐漸融入當地生活，不諳中文、地域宗族觀念也薄弱，因此關心傳統社團的人數迅速下降（麥禮謙 1992）。其次，戰後移民的「新僑」大多數具有專長或資金，因此在生活適應上並不需要透過「華埠」的社會支持，同時不諳粵語，也難和老一代華僑溝通（陳靜瑜 2002）。在此情況下，在美國所謂的華僑社會團體也就更容易爲一小撮人所操縱把持了（麥禮謙 1992）。這些生活在華埠、長期以來對國民黨忠貞不二的老

³⁷ 即台裔美國人，以蔡同榮、陳唐山爲首，而後成立爲「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陳儒榮 2004）。

³⁸ 從 1950 到 1983 年台灣在外留學生有 8 萬人左右，但學成返台的只有 1 萬人（陳靜瑜 2003）。

僑，除了少數被「遴選」到台灣擔任立法委員、監察委員或國大代表之外，少數也為國民政府的編制下工作，或成為僑務資源的分配者，使原有政治性的僑團逐漸變成了「福利機構」（楊建成 1995）。到了八、九零年代隨著台灣政治上的改革開放，這些長期與台灣社會脫節的老僑，也就自然成為了反對者口中的「海賊」和「黑官」了³⁹。

3.4 從冷戰自由主義到自由多元主義

從外交政策上的干預、移民政策上的開放和對共產勢力的打壓圍堵，事實上都可視為是美國在戰後國際事務基本論述的體現—「冷戰的自由主義」(Cold War Liberalism)。簡單來說，就如 Hartz (1955) 所指出的：「所有的美國人都是自由主義者，在對自由的承諾中團結在一起，並相信未來的自由乃是依賴將自由的種子散佈到各地。⁴⁰」在此思維下，很弔詭的，美國必須要積極地干預全球的國際事務，以阻止任何具共產傾向的政權當政，圍堵共產思潮的蔓延，以免威脅美國人的自由權力。只是在干預政策下，為尋求政治穩定，由美國所一手攙扶的侍從政權，往往長期的獨裁與實行威權統治。此種思維與美國過去所提倡的「威爾遜自由主義」(Wilsonian liberalism) 卻格格不入，並直接表現在對越戰問題的分歧意見之上。(Stedman 1992)

無論如何，美國最終所信仰的仍然是自由主義。一方面由於二次大戰美國參與了「反法西斯」的戰爭，在此氣氛之下，過去許多具「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政策，已逐漸為人民所鄙夷拋棄，新的少數族群論述出現、取代過去的「同化」壓力，使得美國成為了「所有人的家」(house of all people) (Shain 1994)。在學術的討論中，Milton Gordon 在 1964 年開始提出「涵化」(acculturation) 與「結構同化」(structural assimilation) 等不同的概念，使過去「大熔爐」的同化壓力開始得到鬆動。Gordon 發現，移民完全地「被同化」並非是必然的現象，真實的現象是：少數民族在家庭、宗教、政治、經濟上，能夠與主流社會並行發展而不相衝突。在此情況之下，他進一步區分了「結構多元」(structural pluralism) 和「文化多元」(cultural pluralism) 的概念，使「多元主義」開始在美國萌芽。而後不管是「文化多元主義」的復興，或進一步往「多元文化主義」邁進，都確

³⁹ 「海賊」乃是相對於「老賊」而來，是反對運動者對萬年國會的諷稱。而所謂「黑官」是指未得「公務員聘用資格」的編制人員，引起立法委員的抨擊。

⁴⁰ 轉引自 Stedman (1992)。「冷戰的自由主義」綜合地代表二次戰後美國在內政與外交政策上的基本信仰，表現在下列立場之上：一、在經濟秩序上支持勞資雙方的權力平衡，表現社會民主的特性。二、在外交政策上以圍堵蘇聯和其盟國為主。三、支持「新政」下的社會福利與社會安全制度。四、擁抱「凱因斯經濟理論」，在軍事上也實行「凱因斯軍事開支」以刺激經濟。見 http://www.nationmaster.com/encyclopedia/Liberalism-in-the-United-States#Cold_War_Liberalism。

立了美國在移民政策上的開放性⁴¹。

3.5 小結

總結來說，透過回顧美國的建國歷程和對華政策，以及美國在二次戰後所扮演的國際角色、與台灣國民黨政府的戰略關係、其移民政策和對國內左翼的壓制等等，我們將僑務政策放在一個歷史、國際和國內的複雜肌理下進行理解。在瞭解了僑務政策在什麼樣的場域中開展之後，我們接下來要進一步去問：這種透過族裔的動員的跨國政治，究竟代表著什麼？其歷史意義在哪？其在國際政治的角力下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第四節 代理祖國？：國家體系中的僑務政策和少數族裔

4.1 三種相互關連的民族主義：

歷史社會學家 Brubaker (1996) 在研究中歐和西歐的民族主義現象時，曾提出了三種相互連結卻相生相剋的民族主義類型：

第一種被稱為「國族化民族主義」(nationalizing nationalism)。許多甫得獨立的新興國家，面對國內各種少數異質的族群團體，在政治核心族群控制之下，往往自認為是國家的「正當」擁有者，國家應該為其所擁有，更為其所服務。由於在獨立以前，這些族群不管是在經濟、文化或人口分佈等，處在相對弱勢的位置。因此儘管已獨立，但始終認為，這是一個「尚未實現」的民族國家，因此還需要透過種種文化、教育、語言政策的國家化，才能成為「真正」的民族國家。這些政策主要是透過國家的強制力，以「治療」或「補償」過去的偏差和不公。對於核心族群來說，「國族化」政策不一定是被有意識地論述 (articulate) 和表達的政治主張⁴²，但卻反映在「少數族裔」或「祖國」的抗議之上。因此，「國族化」所表現的壓制性質，不一定是「事實上」的，而是「被感覺出來」的。

第二種則直接挑戰「國族化民族主義」的正當性，則是強調自身具有保障其海外民族同胞的人身安全、正當利益和文化自主的政治主張，Brubaker 稱之為「祖國民族主義」(homeland nationalism)。在這裡，「祖國」的定義並不是人類學意義上的認定，而是一種政治立場，透過政治或文化菁英的建構，將跨越國境

⁴¹ 「文化多元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在概念上有所不同，前者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認為不同的文化可任其發展，後者則是「表揚多元性」(celebrated diversity) 而鼓勵更多元文化發展。

⁴² Brubaker (1996: 4) 指出，國族化民族主義往往被美化地稱為「打造國族」，而不被視為是一種民族主義，並且與「要求重新劃定民族界線」的民族主義研究比起來，這種「肯定領土界線」的民族主義長期為學術界所忽略。相關批評也可見 Connor (1972) 的分析。

但共享相同族群文化、血緣親族的僑胞，視為是祖國的責任和義務。祖國可以予以海外同胞道德上的支持、文化資源的提供、保留其在祖國的政治、社會、教育權利、移民回流的優先權等等。但祖國與海外僑胞在立場不一定上會一致。

最後，介於這兩種對立的民族主義，則是少數族裔民族主義（minority nationalism）。「少數族裔」是被認定或自我認定為「有別於」核心族群的群體，其要求國家承認這樣的差異，並要求在這基礎事實之上，賦予族群在文化和政治的權力。這種主張具有雙面性質：一方面堅持與國家相對立的立場，對內部進行族群動員，要求國家給予承認。另一方面，卻又強調一種「國族化」的願景，建立一種不分族群、語言、文化的國家。同樣的，這是一種政治立場，而非族群人口學上的事實，沒有清晰的族群邊界，內部的異質性甚至比外部差異來得大，形成了一種不斷透過區別和競爭（differentiated and competitive）的場域，個別的族群領導者則宣稱代表全體的族群，向祖國或是居住國進行協商。

4.1 概念模型的應用：

這三組相互牽連的概念架構，應用在本文所處理的個案上，具有明顯的一致性，但卻更為複雜。

（1）馬來西亞作為一「國族化民族主義」者

首先，馬來人作為在殖民時代被壓抑的族群團體，獨立之後主張「馬來人的馬來西亞」，國家必須為馬來人服務，享有憲法所保障的特權，以治療和糾正過去的偏差，成為一種「國族化民族主義」。因此，作為「國族化」的國家，馬來政府對於境內的華人，採取了單邊的同化主義：單方面要求華人在語言、教育和文化問題上，接受國家所界定和統一的內容；同時也要求華人承認馬來人的特權地位，不允許任何挑戰。

另一方面，馬來西亞政府對其境內少數族群的「祖國」所採取的態度，也因不同的政治計算而有所不同。例如 1951 年英政府拒絕中國的民間訪問團到馬來西亞「關切」排華事件，以避免國內共產勢力進一步擴張。但是到了 1964 年，獨立以後的馬來西亞政府選擇與台灣建交，除了與台灣一致性的反共立場之外，另一個可能原因是，建交可以安撫國內部分華人的情緒，把不確定政治因素降低，同時在美國對東南亞的政策影響下，打「台灣牌」無疑是當時的最佳選擇⁴³。戲劇化的是，到了 1974 年，當大部分的華人已取得公民資格，中共也取代台灣進入聯合國，馬來西亞執政黨領袖又為了安撫華人對「新經濟政策」的不滿，打

⁴³ 與台灣建交事實上是具有爭議性的。根據當時還是一個「馬來民族主義者」的馬哈迪所寫的《馬來人的困境》，內容便以政府在台灣設立馬來西亞領事館為例，認為是「藐視公眾道德觀念和普遍的期望」（Mahathir 1981:14）。

出了「中國牌⁴⁴」—宣佈與中國建交，希望藉此能夠來抬低迷的選情（楊建成 1982）。在此情況之下，「祖國情節」也可能成爲移民政府所利用的政治資源，在精密的政治計算之下，獲取實質的政治利益。

（2）中國（共）作爲一「祖國民族主義」者

其次，中國（共）在不同階段、不同事件中，也表現「祖國的民族主義」的立場，聲稱中國對東南亞地區「華僑華人」具有保障其人身安全和正當權利的權力。例如中國曾經因華人問題而和印尼斷絕外交關係，並接回大量的印尼華人；在中越關係史上，中國也以「保護華人利益」發動對越戰爭。改革開放之後，僑務政策儘管以技術、經濟、文化交流爲主，但仍強調海外華人與中國切不斷的文化和血緣關係。但這不意味著中國與海外華人的相互期待具有一致性，尤其是身處敏感的東南亞地區，輕者對於「稱謂」看法上產生齟齬，重者則是在排華事件上，譴責中國處置不當等。

另一方面，在上述零星的衝突之外，中國在處理東南亞各國的外交關係上，仍是以「外交—僑務」爲主要原則。例如爲了突破美國的圍堵政策，中國巧妙地運用「雙重國籍」議題，希望藉此取得東南亞各國的合作，一方面能協助各地政府解決境內華人忠誠問題，另一方面也能取得外交上的承認，確立其政權的合法和穩定性。

（3）馬來西亞華人作爲一「少數族群」

最後，馬來西亞華人作爲一種「少數族群」，不管是自我認定或是他者歸類，都有別於馬來核心族群。因此在文化和教育上要求國家承認華人具有保存傳統文化、維持族群母語教育的權力。另一方面，馬來西亞華人面對核心族群的壓力和挑戰，因爲長期處在「二等公民」的困境中而往往心生不滿。因此具文化或經濟資本的華人菁英，或許會選擇離開本國。留下來的華人，則會以一種低姿態和間接的方式來參與政治，以確保其經濟利益不受政治所傷害（王賡武 1986a）。在此情況之下，明確地表達其「親當地政府」或「親祖國（台灣或中國）」的人數永遠是少數⁴⁵。

事實上對於華人來說，不管是「居住國」或是「祖國」（套用 Bourdieu 的語

⁴⁴ 兩國建交一方面針對雙重國籍問題達到共識，兩國都不承認雙重國籍身份，加入馬來西亞國籍者，中國籍則自動喪失。但儘管如此，仍設下很多的限制，包括只有 65 歲以上的馬來西亞華人可以以探親或治病的目的到中國去。

⁴⁵ 王賡武曾以甲、乙、丙三種群體試圖勾勒不同華人的政治立場，表達了華人在立場上的異質和多變性。簡單來說，甲群體親近中國、丙群體則是親近當地政府。在中間的乙群體較是機會主義的，基本上保留基本華人性質，但視需要會參與不同團體。進一步說明請見第二章第三節。

言)，兩者都能夠決定不同「資本⁴⁶」之間相互轉換的「兌換比率⁴⁷」，兩者（儘管是不同程度地）都會影響了資本累積的速率。但如果從「世界體系⁴⁸」角度來看，不同的國家實力之間的相對位置、不同的全球影響力，也會間接影響/調整各國國內的「兌換比例」⁴⁹。在此情況下，當華人無法改變「居住國」所設下的「兌換比率」時，只能把希望放在「祖國」身上，因為一個強大的祖國，一旦發揮其全球影響力，則亦會間接地影響居住國內的「兌換比率」。依此邏輯，海外華人普遍上都認為，只有中國強大，海外華人才有保障。

但這裡的「中國」代表的只是一種「祖國態度」，並不是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事實。因此，如果進一步想要瞭解華人在中國和台灣之間，究竟會選擇支持（或同情）哪一方？雖然很多人會對此感到非常有興趣，但王賡武卻認為，「它永遠是一個不可能很精確或富有意義的區分」（王賡武 1986b:197）。但比較無疑問的是，華人與兩個祖國之間的聯繫，必須取決於當地政府究竟選擇和哪一個「祖國」建立外交關係⁵⁰（陳鴻瑜 1991；王賡武 1986b）。這不只是因為民族國家具有管理人民和領土主權的最後決策權，同時只有在一個相互承認的國際體系下，才可能「共商」一種相互掛勾且動態調整的兌換比率⁵¹。

另一方面，分裂的祖國和冷戰結構卻進一步複雜化了上述的三角關係。

（4）台灣作為一（代理）「祖國民族主義」者

僑務政策，對於流亡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來說，是具有利用價值的歷史遺產，也是在政權的危急存亡之時，保衛其政權的必要手段。因此，就如 Brubaker 所強調的，「祖國」並不需要具備人類學意義上的真實性，而是一種政治立場，聲稱其對於海外僑民具有不同程度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從戰後以來，國民黨在台灣建立了一套持續穩定的僑務建置，儘管其中有些是為了供應內部消費而來（如僑選立委），但無論如何，至少在五、六零年代，台灣在「自由世界」中負

⁴⁶ Bourdieu 認為資本可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

⁴⁷ 例如，作為一個接受母語教育的華人，當國家把官方語言只限定在馬來語，並全面禁止出現華語，則「華語」作為一種「文化資本」，若想要轉換成為「經濟資本」，則其兌換比率是「零」，因為完全不受承認。因此 Bourdieu 認為，國家成為了一種「元資本」（meta-capital），決定了不同資本之間的兌換比率（Bourdieu 1998）。

⁴⁸ Wallerstein 定義下的世界體系。

⁴⁹ 以剛剛的「華語」來說，如果華語進一步成為了「世界語」，成為各國之間主要的溝通語言，則那位接受母語教育的華人，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也將進一步提高其「兌換比率」。

⁵⁰ 陳鴻瑜（1991）曾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以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三地的知識階層為母群，以「對中國統一問題的態度」進行調查，發出問卷共 123 份。其結果是儘管受訪者有超過 70% 到過台灣，但在政治態度上多半持有中立立場，在統一態度上有 54% 支持統一，30% 反對。

⁵¹ 必須注意的是，儘管七零年代許多國家紛紛與台灣斷交，但這並不影響兩國之間的非正式交流，台灣在經濟上的強大實力仍然會影響國家的「兌換比率」，例如九零年代以來台灣的南向政策，大批台商進駐東南亞，留台學生的就業市場隨之也水漲船高。

起了「集結」全球華僑反共的時代使命，成爲了「代理」中的祖國。

在這裡，使用「代理」的概念並不意味著國民黨「真正的」只是祖國的代理人，或是國民黨自身自認爲是那樣，而是一種「被認定」而來的事實。因爲相較於中共政權，國民黨作爲美國所扶植下的右翼政權，其威脅性較低，同時在美國爲首的全球秩序之下，台灣也被視作是領導華人反共的中國政權代表。在此情況下，在東南亞國家中，菲律賓長期與台灣保持良好外交關係，與日和美國的殖民淵源，不無關係。因此，儘管在理論模型中，美國作爲移民接受國，在國際主權原則之上，理應對台灣的「祖國立場」保持批判。但在反共的思維下，美國卻是反而促進（promote）台灣的「僑務立場」，縱容國民黨在國內的政治活動，同時也協助國民黨辦理僑教政策，「以防止中共毒化海外青年」。

在國際強權的介入下，至在七零年代以前，台灣被披上一件虛構出來的「中華民國」政體，不管是自我認定，或是（重要）他人的界定，使「虛構」暫時成爲了「真實」的結構。因此，如果用歷史制度論的語言來說，1950 年韓戰爆發的「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美國選擇了改變原來對台灣的「放手」策略，將台灣納入圍堵防線之內，使「中國民國制度」在台灣勉強延續，並在往後至少二十年的時間，透過制度再製的過程，產生了「自我增強序列」（self-reinforcing sequences）的效果，滲透在社會的各種角落，成爲根深柢固的結構。因此，即便在後來的時間中，許多「反應和逆反應」（reaction and counter-reaction）試圖挑戰結構（例如國內反對勢力的挑戰、國外政權影響力的流失等等），但往往也只會是「有限制的變遷」（bounded change），直到某一事件（如李登輝當選總統）侵蝕了制度的再製機制，或使其陷於困局，根本的結構變遷才有可能（cf. Mahoney 2000; Pierson 2000）。據此，依附在「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僑務政策」，在短時間內只能進行有限的改變。台灣依此路徑拾級而下，從海外華人的「代理祖國」，到海外華人眼中成爲分裂「中國的一部份」，也就不令人意外了⁵²。

（5）美國作爲一「逆向的國族化民族主義」者

美國作爲一個「移民天堂」，特殊的建國歷史，使其缺乏具有清楚界線的「支配族群」。因此相對的，國境內的各種文化團體也很難被稱爲是「少數族裔」，美

⁵² 這句話試圖回答的是：爲什麼海外華人要「干預」台灣內政？不是早就分了家嗎？前者的質疑發生在 2004 年，由於台灣總統大選決定要同時辦理公投，馬來西亞華社爲此成立「一中協會」，表示要動員所有力量，表達反對台灣辦理公投的立場。此時，馬來西亞「留台總會」會長公開呼籲華人應多關心華社問題，避免干預「台灣內政」，引起華社一片撻伐。事實上海外華人的態度，反映的也是其在居住國內的尷尬處境和願望，並將之投射在兩岸問題之上（所以，這又跟海外華人「不懂」民主無關。）。另一方面，許多主張台灣獨立的運動者，常常希望將台灣問題「國際化」，但當遇到阻力，則又以不應干預「內政」來搪塞。或許在台灣，「國際」的意義只限定西方大國，這是實力政治的問題，但卻忘了，台灣問題在歷史中，就是被這些大國們的政治計算中，被利用或控制的。後者是一位長期關心東南亞研究學者之語，以此簡單回應之。

國也並不具有「國族化民族主義」的傾向（Brubaker 1996：60）。

但事實上真是如此嗎？

在移民政策的研究領域中，美國往往與澳洲、紐西蘭、加拿大並列為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遷佔者國家（liberal democratic settler state），接受移民對她們來說是國家肇建的重要部分（Freeman 1995）。但是由於二次戰後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包括長期以來在亞洲和加勒比海盆地實施各種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上的干預，又使得其有別於其他遷佔者國家。除了讓美國成爲了全世界最大的移民接受國家（Rumbaut 1994），更使美國可以實行另一種「逆向的國族化民族主義」（reverse nationalizing nationalism），換做成爲具體的政策來看，則是一種「逆向的僑務政策」。

我們就以台灣、美國和新（台）僑之間的三角關係來進行解釋。

前面提到，戰後美國爲打擊共產主義，曾經對國內的左翼勢力進行肅清，使得國民黨勢力在美國僑社「一黨獨大」，許多傳統的華僑團體也爲了自我保護，也接受國民黨的操控⁵³。在此階段，儘管美國和台灣在軍事上已建立了緊密的合作，但這一段「不確定的友情⁵⁴」仍使國民黨必須要重視美國僑社的動員，以建立安全閥機制，同時國民黨政府也利用美國的民主制度，在國會中拉攏親國府的議員，以保障國民黨的政治地位（趙綺娜 1991）。此時，美國、台灣和僑民之間的在利益上並不相衝突。僑民在兩國所界定的互動關係之內，也可以自由地參與兩國的政治，而不會背負忠誠問題。

但隨著新移民人口的增加，華僑社會逐漸產生人口結構的變化，大量的留學生赴美，有別於國府的政治立場也開始浮上檯面。在黑名單政策下，這些政治異議份子開始以美國爲舞台，在美國倡議新的政治理念，並以學校爲單位，吸收每年赴台留學的新成員，以試圖改變過去黨化教育下的政治思維，試圖擴大海外反對國民黨勢力⁵⁵。在這期間，儘管海外運動者試圖透過各種宣傳技巧，希望能把政治理念輸入島內⁵⁶，但一直要到八零年代以後，隨著冷戰結構的鬆動，國內反對勢力與海外運動者勢力進一步結合、美國的全球戰略也逐漸進行調整之後，情況開始產生改變。

如果說，上一個階段是美國和台灣政府聯手，控制和監控僑民的政治活動

⁵³ 一般上本土的華人研究者對此抱著批判的探度，見 Wang Ling-chi (1980)、Bary et al. (1976)、Lai (1976)。

⁵⁴ Nancy Bernkopf Tucker (1995)。

⁵⁵ 關於海外反對運動的歷史目前仍在起步當中，其中針對美國部分可參考陳佳宏 (1998)，其他當事者說法可見陳銘城 (1992)、王美琇編 (1992)、Shu (2002)。

⁵⁶ 包括希望在菲律賓設立電台，向島內廣播、在台灣紅葉棒球隊赴美比賽時租用飛機宣傳台獨理念等等（見王美琇編 1992）。

⁵⁷，則到了此階段，美國在外交戰略上的調整，則使原有權力的結盟關係開始產生微妙的改變⁵⁸。1982 年「台灣人事務協會」(FAPA) 在美國成立，因循的是美國長期以來的遊說文化 (lobbying)，其主要特點乃是透過各議員的「選民服務」，試圖影響國會決策⁵⁹。一般人認為，FAPA 在美國國會的影響力已超過國民黨的官方代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⁶⁰。但事實上，如果配合美國的外交政策來看，美國在隔年的 1983 年，也成立半官方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公開以「促進民主」(democracy promotion) 為宗旨，以協助世界其他國家完成民主化的進程 (Robinson 1996)。因此，幾乎於此同時，有越來越多來自非民主政權的族裔團體，也公開地組成遊說團體，希望能透過對美國國會的影響，推翻或支持其祖籍政權 (Shain 1994, 1999)。換句話說，在此新的政治氣氛之下，美國與其國內的族裔團體之間的政治利益開始趨向一致，美國在冷戰結束之後新的戰略調整，也使得其在外交政策上，對於國內各類遊說團體能予以更多的回應 (Shain 1994)。因此回到台灣的例子中，美國的「民主輸出」是否影響了台灣民主化，儘管還需要進一步去檢視⁶¹。但較無疑問的是，美國外交態度上的轉變、對台灣民主政治的關切，勢必為國民黨帶來政治壓力⁶²，迫使其進行有限的改革，以維持美國對其政權的支持。

在結合美國於世界各地的政治干預和人道主義的思維之下，可以預期的是，其所接受的新移民往往都是來自戰亂或政治高壓的政權⁶³。因此，如果美國持續性的進行「民主輸出」的政策，再配合著其強大的國家實力，則可預見的是一種「逆向的僑務政策」。

⁵⁷ 海外台獨運動團體的暴力訴求，曾經引發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員處處長克萊恩 (Ray S. Cline) 的批評，認為「台獨份子放棄以民主方式取得政權，而改採激烈的暴力作風，如此，對國際穩定構成威脅」。轉引自陳佳宏 (1998:106-107)。

⁵⁸ 最根本表現在美國對於「江南慘案」的態度。見 Kaplan (1992)。

⁵⁹ 有關 FAPA 的歷史和運作狀況，目前研究還在起步階段。請參考林美呈 (1999)、陳儒榮 (2001; 2004)。

⁶⁰ 例如首任會長蔡同榮便認為：「由於歷任會長及美國各地台灣同鄉的奮鬥打拚，FAPA 已由一個默默無聞的組織發展成聲譽卓著的遊說團體，在美國國會山莊的國會外交成就，比起國民黨華府官方代表團有過之而無不及。」(轉引自陳儒榮 2001)

⁶¹ 目前為止只有林美呈 (1999) 從美國人權外交的角度討論其對台灣民主化的影響，另外 Lynch (2002) 則從海外運動者如何受到「全球文化」的社會化而影響台灣民主化進行剖析。

⁶² 有趣的是，在民主轉型期間，由於許多遴選僑選立委皆來自美國，結果在 1989 年，反對者便要求美國國務院針對「美籍台灣人到台灣擔任立委，是否會喪失美國國籍一事」表態，當時國務院答詢模糊，並表示一個人只有在其自願從事放棄國籍的行為，並有意放棄公民身份時，才會喪失美國公民資格。最後私下表示，這是台灣的政治問題，應該由台灣人決定這些人到底有沒有代表性？見聯合晚報 (1989)〈來台北當立委，將喪失美國國籍？〉十二月六日。

⁶³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便是，1991 年的波灣戰爭中，有幾千位伊拉克士兵和戰犯以難民身份移民美國 (Rumbaut 1994)。

第五節 本章結論

本章的分析取徑主要是將「僑務政策」放在民族國家體系中進行檢視。首先，透過回顧中國（共）在不同階段中對東南亞的外交與華人政策，本文發現儘管在戰後初期，中共在面對華人問題時仍然強調其具有保障華人利益的基本義務。然而，在有限的國家實力之下，中共在面對華人問題時，乃是以「先外交，後僑務」為主要原則，並試圖透過華人國籍問題的解決，取得外交關係的突破。相較之下，台灣的僑務政策儘管相對穩定，並且在特定的華人問題的態度較中共強硬，但無論如何，國民黨的僑務政策仍是以「黨務為核心、僑務為外交後盾」為原則，以保障其政權的存續。其次，將鏡頭轉進個別民族國家的政治結構，本文選擇以馬來西亞和美國作為討論個案，以理解在「建國意識」、「少數民族政策」和「國際位置」的差異如何影響國家對其境內少數族裔的「祖國政策」採取不同的態度和反應。最後，藉由 Brubaker（1996）所建立的三種相互關連的民族主義模型，以進一步釐清遷台之後的國民黨政府，在國家體系之間的相對位置，如何使其成為冷戰結構下「代理的祖國」。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解答問題意識與主要論點

本論文所處理的問題，主要可分為下列三個層次。首先，作為一名九零年代末期留學台灣的「僑生」，身份與稱謂上的「繼承」位置，以及認識到政策背後的爭議性質，自然地便逼出了這樣一個直接的疑問：為什麼國民黨要執行僑務政策？其如何可能？其次，為了回答這樣的疑惑，則又不得不去追問：遷移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究竟該如何界定其性質？僑務政策對政權來說，其意義或功能在哪裡？最後，在往上推一步，僑務政策作為一個挑戰現代國家主權的制度，其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其如何可能？

帶著上述的問題意識，本文回頭檢視既有對僑務政策的研究和討論，卻發現既有材料和中文文獻儘管俯拾即是，但多半從政策評估和政策建議出發，或是僅停留在制度的描述與政策說明的階段中，往往千篇一律，少有突破。另一方面，在國外的學術討論中，大多數的外國學者卻往往關心的是中國（共）的「僑務政策」，或是二次大戰以前的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對於遷台之後國民黨的僑務政策，相關研究幾乎完全缺席，或是僅在討論中國僑務政策之餘，一筆帶過¹（Ng 1991；趙綺娜 2001）。為此，本論文試圖沿著上述的問題意識，將僑務政策放回到歷史脈絡、政權性質和國際政治結構中，以試圖解答上述的疑惑。

本文研究發現，可分兩大部分。首先以「個案」層次來說，依序為下列幾點：（一）僑務政策與清末以來的海外民族主義息息相關，在海外政治異議份子的積極動員之下，海外僑社經歷了「祖國政治化」的過程，在國境相對開放的殖民時代，海外華人在政治和文化上逐漸形成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並延續至二次戰後。僑務政策意外地留下了「海外」的政治遺產。

（二）1949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帶著一百多萬的官僚與軍民「退守」台灣，伺機而動準備反攻。但冷戰結構讓返鄉的路徑無限延伸，流亡一旦開始，便無法結束。流亡政權握著手中的權杖，在全然否認和遺忘現存的物理時空下，不可自抑地複製大量的大中國的象徵符碼，建立具防衛機制的象徵秩序，以試圖掩蓋戰敗的恥辱與偏安的創傷。海外僑社，立基在上述背景之下，成為「看不見，

¹ 研究議題的選擇，多少也反映了國民黨「僑務政策」並不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因此較少人研究。因此，從這方面來看，更進一步支持了本文所強調的，僑務政策對於國民黨政權來說，「內部消費」的意義大於國際上的族裔動員。

卻存在」的政治腹地；僑務政策，提供了無限的想像空間，成爲保護政權的政治羊水，即便是一戳就破。因爲，如果沒有「僑務政策」，國民黨在 1954 年仍然會與美國簽訂共同防衛條約、1972 年仍然會退出聯合國、1978 年仍然會與美國斷交。

（三）僑務政策作爲一挑戰國家主權的跨國政治實踐，其得以完成，乃是由「外部因素」所決定的。新興國家在面對殖民的歷史遺產、國內的原生情緒，在追求民族自尊與現代化道路上，選擇了不同的建國意識與少數族群政策，「補償/修正」過去殖民留下的偏差結構，因而形成了一種「選擇性的國族建構」與「單邊的同化主義」。被排除在國族之外的少數族群，政治上的失落只能尋求文化教育上的補償，華文教育與僑生政策一拍即合，在「無僑教便無僑務」的務實口號下，延續了另一階段的僑務政策。

（四）此外，在國際冷戰結構下，右翼的國民政府遠比赤色的北方巨鄰來得和善。在美國所安排的國際秩序下，居於前線的國民政府更化身爲「團結全球華人反共」的主要旗幟，成爲了「代理的祖國」。各個民族國家之間「共同聯手」管理國境內的族群情緒，或是縱容「祖國」在其國境內進行監控，或是大打「祖國牌」獲取政治利益，在主權國家之間的共謀下，管理浮動不安的族群性。

（五）另一方面，美國在二次戰後迅速填補了歐洲殖民國家所遺留下的政治空間，使之無法與一般的移民接收國混爲一談。在「冷戰自由主義」的思維之下，美國爲防堵共產勢力蔓延，在各「前線地帶」扶植親美且往往獨裁的右翼政權，以維持其全球性的政治利益，並且也制訂了相對開放的移民與難民接收政策，以「號召」人民反抗鐵幕，獎勵「反共義士」。

（六）儘管冷戰結構已鬆動，美國仍然維持其在全球的軍事部署計畫。但在政治修辭上，卻開始轉變爲「輸出民主」，配合其境內的少數族裔對其「祖籍」國家的控訴，試圖把「民主推銷出去」。在此情況下，美國形成了「逆向的僑務政策」，與國境內的少數族裔「共同聯手」推翻不義的政權。

總結來說，戰後國民黨的僑務政策，乃是結合了清末以來海外民族主義與僑務政策在「海外」的政治遺產、國民黨作爲一流亡政權下所需要的象徵秩序，以及在冷戰結構與國家體系中管理族群性的結構脈絡下，所共同產生並延續至今的大型政治劇碼。

其次，從「理論」層次來說，又可分為下列兩點：

(七) 對「方法論民族主義²」的批判：從研究取徑上來看，過去有關僑務政策的研究，大體而言都犯了兩種毛病。首先在歷史分析中，僅強調以「祖國」為中心的史實結構，忽略了比較僑居地的歷史發展。其次，在國際政治的分析上，則是過度強調「內戰格局」，卻忽略了「冷戰結構」的關鍵影響。兩者綜合來談，便是犯上了「方法論民族主義」的毛病。以前者來說，單一地強調「祖國」脈絡或是「僑居地」的主體性，事實上都是武斷地切割了歷史主體的能動性，認為主體必然承服在民族國家所磨塑的貨櫃社會當中，成為民族國家的一份子。儘管在從二十世紀開始，民族國家政體的「制度同形化」已逐漸確立 (Meyer et al. 1997; Boli et al. 1997)，全球各地紛紛為「民族國家」所佔據，並且程度不一地實行「祖國化」的政治工程 (cf. Kaiser 2002, Connor 1972; 1986)。因此也就間接地影響了社會科學的研究單位的選擇，使得此時「異鄉人」成為了被問題化的主體，「大熔爐」的概念被強調，「同化」成為了規範性的命題，「方法上」的民族主義也開始出現。但無論如何，此種「本體論上的民族化³」現象並無法構成知識方法上的必然性。相反地，隨著政治局勢的逐漸鬆動，我們反而要回頭去尋找遺留在民族國家縫隙間的歷史片段，才能更完整地瞭解人類所經歷過的歷史軌跡 (Wimmer & Schiller 2002)。

(八) 「意識型態」的討論與「國家從未停止說話」：「僑務」作為一充滿國民黨體味的政策制度，在對其進行分析以前，必須要能夠界定國民黨政權的性質。然而過去在黨國體制主導下的社會科學研究，國民黨政權以中性化的「我國」、「政府」等代名詞所置換而，政黨隱身其後。直到解嚴之後，更多元的參考架構逐漸浮出，屬於國民黨特定的「意識型態」也才折射出來，全新的一套概念語言浮出檯面，帶動了全新的研究視域。在這當中，「後殖民話語」和「民主話語」平行對應了解嚴之後台灣的「本土化」與「民主化」現象，也成為了社會科學當中最流行的概念參考體系。在此概念體系下，若回頭對照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所施行長期四十年的戒嚴體制，所折射出來的意識型態分析，往往也就容易偏向馬克斯學派意義下的意識型態界定：虛假的面具、扭曲的現實。同時在此界定下，更暗示

² 「方法上的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的概念最早由英國 Smith A.D (1983) 所提出，批評過去社會科學研究都將「國家社會」(national societies) 視為分析的自然單位的問題。

³ 也就是說，儘管「普天之下，莫非王(民族國家)土」(汪宏倫語)，民族國家體系已深入民間，成為「凡常民族主義」(Billig 1995)，或成為牢不可破的「國族現實」(nationalist reality) (Wang 2000; 2002)，形成了「本體論上的民族主義」，但歷史主體仍具有相對的能動性，因此若在方法上亦隨之「民族化」乃是不智的。相同的批評見 McKeown (1999; 2001)。

了下列的預設：「只要拋棄被扭曲的意識型態就可以宣布大功告成。」Žižek (1989)。但在本文的討論中，則選擇採用 Geertz 對意識型態的界定：一套爲了把握真實而努力建構的符號。因此，在結合討論國民黨政權內部「流亡意識」面向，「意識型態」便成爲了具有象徵功能的「詩歌與道路圖」(Geertz 1999:261)。甚至，借用 Žižek 的看法，歷史的必然性是通過誤認完成的，實在界並沒有對它的「符號化」過程提供任何支援。因此，就如同所有的民族主義都需要「傳統的發明」一樣，所有政權的維繫，也必須要靠國家「不停地說話」(Corrigan 1985) 才能夠成爲一「想像的共同體」。不管這些話語中間多麼地浮誇、扭曲，但無論如何，穿上「國家」外衣的流亡政權已經深入本土社會的肌理深處，成爲身體的一部份，而放血治療或許並不是明智的選擇，反而是需要進一步逼問：在什麼樣的結構處境下，這套扭曲的「話語」確有人聽得進去？誰在支撐？誰在傳播？以及，在現階段，「話」又該怎麼說⁴？

總結而言，僑務政策是一個極爲複雜的政治現象，若謹守單一的參考架構便容易喪失其所能折射出來的理論牽連 (implications)。因此，透過上述兩點的反省，我們瞭解到生活在民族國家體系中，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所可能犯上的分析盲點；另一方面，透過對「意識型態」概念運用的討論，也讓我們瞭解到「意識型態」的象徵功能，並且說明此一歷史的誤認，乃是貫穿於解嚴前後，甚至是人類歷史的。

第二節 分析取徑與研究方法的反省

本文在分析取徑上，儘管試圖突破過去的研究典範，分別將「僑居地的歷史發展」、「政權的性質」與「國際冷戰結構」拉至前景進行討論。但無論如何，在處理這些面向上，除了受限於時間與經費之外，本文在「材料的取得」與「方法論上的克服」上，仍有許多必須努力的部分，因此必須提高至清晰的意識層次，以尋求解決的可能性。

首先，在歷史與國際政治發展的面向上，本文只能仰賴二手研究和有限的報章資料，以「體驗」當時的歷史境遇，重構行動者的意向和選擇。由於無法回到當時的歷史現場，也無法進入「田野」，因此所能觸及的材料幾乎都來自編目整齊、裝訂成冊的圖書館藏。在這當中，有多少歷史片段被遺漏了，多少被記下了，

⁴ 講明白些，也就是戰後以來儘管國民黨不斷地以「內戰話語」來合法化其專政獨裁的特性，但無論如何，這套話語同時也是由「冷戰結構」所共同撐起來的，隨著冷戰結構的鬆動，「內戰話語」也自然會受到挑戰，「後殖民話語」登場之後，卻不應忘記其背後的「冷戰結構」仍然持續存在。

研究者無法判定。儘管本文已盡可能對照不同來源的觀點，以判定資料的可用性。但除了會受到自身經驗立場的影響之外，缺乏嚴格的「史學訓練」，也使得本論文在歷史材料的消化和整理的功力上，顯得力不從心。因此，本文在有限的經驗材料上，主要是結合社會學訓練下對社會結構的掌握⁵，以詮釋和理解歷史境遇中「選擇性的親近」的互動關係為何？其如何限制了下一階段的發展，並嘗試開啓新的研究視域，對研究現象進行不同方式的解讀。

其次，由於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以「政權」、「國家」為單位，在資料上除了能夠參考官方或半官方的政治宣傳品之外，對政策的制訂和操作上的理解，更必須要仰賴相關部會的行政檔案、日常開會記錄、事件處理報告等材料。這些資料在《檔案法》的保護下，加密檔案的部分必須要沈澱一段時日之後（例如英國規定30年以後）才能對外開放。另一方面，除了一些較為敏感的檔案官員有權銷毀之外，即便送至「國史館」予以館藏，但仍須等待專業史家編排整理過後，才會對外開放。以僑務工作來說，目前便有一批高達上千筆的「僑選立委遴選」材料已為國史館接收，但近期內尚未計畫整理，故不會對外開放，因此只有繼續等待。

其三，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國際政治？以和本文高度相關的「冷戰結構」來說，所謂的「冷戰效應」應該如何被想像？影響程度該如何拿捏？如何作用在人們身上？如果沒有冷戰結構，結果又會是如何？一般來說，若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在理論上便有所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理論」與「建構主義」等對現實國際政治的不同解讀，不同的理論支持者以不同的研究透鏡進行探究，都可以找到支持其理論的經驗現象，一方面反應了國際政治複雜多面的事實，另一方面夾雜規範面的偏好，最後也容易變成立場問題。事實上就如同對「社會」的想像一樣，所有研究的分析最終仍必須落在具體的主體及其文化人造物一樣；在國際政治中，也唯有透過具體的歷史主題，追蹤其如何限制了其他可能的發展路徑，如何集體地形塑（或持續）了各個主體的選擇偏好，並進一步探究承載歷史主題的主體，如何構成了歷史的一部份。但可惜的是，在本研究中，「冷戰結構」的處理仍過於簡化與單一，對於其如何具體的影響東亞區域的政治結構，其如何具體地座落在個人身上，內部較細緻的論證仍是極為缺乏的。儘管在僑生政策部分，透過有限的訪談資料使分析不致於完全闕如，但在論證架構的細緻化能有許多進步空間。

總結來說，本研究主要是希望能提出新的參考架構，以取代過去過於單薄的研究視域。但在材料的取得和分析的能力上，仍具有可努力的空間。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除了藉助一手的檔案文獻，也需要更進一步穿透人民記憶，瞭解歷史的主題如何刻畫在歷史的主體之上。

⁵ 本文在研究定位上，乃鎖定在「歷史社會學」的分析範疇內。

第三節 未來的研究展望

透過上述的研究反省，無疑地指出了本論文僅提出了新的研究綱領，但在材料和方法論上仍具有努力的空間，以期能夠填補既有論證上的不足。因此對於未來的研究展望，可分為下列兩點。

首先在歷史事實的掌握上，本文仍需要對國際政治歷史有更全面的認識，尤其在二次戰後美國在東亞的角色，隨著冷戰時期的結束，國家檔案資料的逐步透明化，國家決策的過程與爭議將逐漸浮出檯面。這將有利於我們判斷國內政治結構中的「外部因素」，以理解在各種政治事件中，行動者所處的結構視域如何影響其選擇偏好。另一方面，對東南亞各國「地方性知識」的掌握亦是未來可加強的重點。本文在研究的初步構想中，原擬在東南亞的馬來西亞之外，也應該將印尼和菲律賓和越南此三個國家一同納入討論，才能夠全面的比較兩地僑務政策與國內脈絡的互動變化。以印尼來說，不僅是「光顧」僑務政策的重要來源國之一，同時長期以來的排華歷史、獨立初期與中共的密切關係、美國在 1965 政變中的角色、其國內特殊的族群結構等等，相較於馬來西亞來說，變異性來得更大大且更加複雜。因此作為一個案，可預見的是其巨大的分析潛力，值得更進一步進行比較分析。另外在菲律賓的部分，作為美國殖民地的歷史以及在七零年代中期以前和台灣的政治結盟關係，使得其成為東南亞國家中成為最親台的政權，因此對僑務政策的延續上亦扮演關鍵性的影響。最後，在越南華人的部分，由於地理上的特殊性，越南的政治發展不僅能夠折射出美國在冷戰思維下的國際戰略，也能夠展現出兩地祖國僑務政策的異同點。

其次，在人民記憶和底層研究的面向上，更是刻不容緩的必要工作。由於許多的歷史見證人（包括各地僑社的國民黨黨員、共產黨黨員、當地華社的耆老與許許多多第一代移民）相繼逝世，對於瞭解歷史的主題如何刻畫在歷史主體之上，將會隨著時間的流失而飛灰湮滅。因此在未來的展望中，如何尋覓這些即將被遺忘的片段，以及如何探討主體對歷史意義的詮釋，將成為下一階段必要的工作。

徵引文獻

(一) 中文文獻

Anderson, Benedict (1999)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吳叡人譯。台北：時報文化。

Bourdieu, Pierre (1998) 《實踐與反斯：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

Geertz, Clifford (1999) 《文化的解釋》。韓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Hall, D.G.E (1983) 《東南亞洲史》。張奕善譯。國立編譯館。

Mahathir, Mohamad (1981) 《馬來人的困境》。劉鑑銓譯。吉隆坡：世界書局。

Said, Edward W. (1999) 《東方主義》。王志宏等譯。台北：立緒文化。

于剛主編 (1987) 《中國各民主黨派》。北京：文史出版社。

文馨瑩 (1990) 《經濟奇蹟的背後：台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台北：自立晚報。

方俐懿 (1989) 《中美斷交後我國與中共對美國華僑政策與工作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美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

毛松年 (1981) 〈階段僑務政策概述〉。見華僑通訊社編，《僑政論文選集》，72-79 頁

王思嫻 (2002) 《1971年以來的僑務政策》。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暨南大學歷史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王美琇編 (1992) 《追尋一種生命的情調：張燦濤三十年的台獨運動生涯》。台北：前衛。

王振寰 (1989) 〈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 (1)。71-116頁。

王梅香 (2004) 〈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試論五〇年代美援文化與文化中國建構之權

力邏輯)。發表於台灣社會學年會暨研討會。新竹。12月4日-5日。

王賡武(1986a)〈「華僑」一詞起源詮釋〉。見王賡武撰和姚楠編譯編，《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120-192頁。北京：中國友誼。

——(1986b)〈南洋華人民族主義的限度(1912-1937年)〉。見姚楠編，《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132-154頁。北京：中國友誼。

——(1986c)〈馬來亞華人的政治〉。見姚楠編譯編，《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北京：友聯。

——(1986d)〈東南亞的華人少數民族〉。見姚楠編，《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132-192頁。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

——(1994a)〈中文歷史著作中的東南亞華僑〉。見王賡武編，《中國與海外華人》，27-37頁。台北：商務。

——(1994b)〈華人移民類型的歷史剖析〉。見王賡武編，《中國與海外華人》，4-25頁。台北：台灣商務。

丘正歐(1982)〈彥棻兄與駐法總支部〉。見陳伯中編，《鄭彥棻八十年》。台北：傳記文學。

任貴祥和趙紅英(1999)《華僑華人與國共關係》。武漢：武漢出版社。

安煥然(1996)〈內在中國與鄉土情懷的交雜：試論大馬旅台知識群的鄉土同意識〉。資料與研究21-22。89-103頁。

朱法源(2000)〈中華民國僑務政策重建芻議〉。見陳鴻瑜編，《中華民國之僑務政策》，87-112頁。台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1998)〈華僑名詞界定及其應用〉。發表於近代海外華人與僑教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6月28日。

吳主惠(1981)〈華僑之本質〉。見華僑通訊社編，《僑政論文選集》，1-10頁。台北：華僑通訊社。

吳前進(2003)《國家關係中的華僑華人和華族》。北京：新華。

- 吳聰敏（1988）〈美援與台灣的經濟發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145-158頁。
- 李明儀（1991）《僑生回國就學政策之研究》。中山大學碩士論文。
- 李明歡（2002）《歐洲華僑華人史》。北京：華僑出版社。
- 李長傅（1983）《中國殖民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李盈慧（1994）〈國民政府的國籍法與華僑總登記〉。亞洲研究雙月刊8。68-95頁。
- （1995）〈1949年以前的華僑參政權爭議與落實〉。海外華人研究3。51-75頁。
- （1997）〈1949年以來中華民國的華僑教育政策〉。暨大學報1（1）。165-194頁。
- （1997）《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一九一二～一九四九）》。新店：國史館。
- 李哲禧（1984）《台灣地區大學生對海外華僑映像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雲漢（1994）《中國國民黨史述》。台北：國民黨黨史會。
- 李靜兒（2004）《近半世紀的「華僑」教育（1950-2000）》。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杜巧霞（1993）〈海外華人在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與前瞻〉。發表於世界經濟中的華人角色與台灣經濟發展。台北。
- 沈松僑（2002）〈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685-733頁。
- 林佳龍（1999）〈解釋台灣的民主化：政體類型與菁英的策略選擇〉。見林佳龍和邱澤奇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87-152頁。台北：月旦。
- 林美呈（1999）《台灣民主化與美國人權外交政策(一九八〇年代)》。台灣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
- 林若雱（2000）〈從優勢到競爭：臺灣的僑務政策（一九四九-二〇〇〇）〉。立法院

新聞29(9)。37-47頁。

林開忠(1997)《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林滿紅(1999a)〈日本政府與台灣籍民的東南亞投資，1895-194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52頁。

——(1999b)〈印尼華裔、台商與日本政府之間：台茶東南亞貿易網絡的拓展(1895-1919)〉。見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585-636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柯玉枝(2000)〈中華民國對拉丁美洲的僑務政策〉。見陳鴻瑜編，《中華民國之僑務政策》，61-86頁。台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和陳慧麗紀錄整理(1997)《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新店市：國史館。

郁漢良(2001)《華僑教育發展史》。台北：國立編譯館。

崔貴強(1989)《新馬華人國家同的轉向(1945-1959)》。福建：廈門大學。

張存武(2003)〈對中國海外移民發戰的新省察〉。見張啓雄編，《近二十年來的海外華人》。台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張亞中(1997)〈多元文化整合的困境：以馬來西亞為例〉。東南亞季刊2(1)。23-42頁。

張騰蛟(1988)《文學、藝事、外交：葉公超傳》。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梁志明(1999)《殖民主義史》。北京：北京大學。

郭傳璽、溫淑華與李友仁(1993)《中國國民黨台灣四十年史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陳文峰(1986)《我國當前僑務政策與措施之研究》。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

陳月萍(2004)《美援僑生教育與反共鬥爭(1950~1965)》。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陳玉璽（1992）《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研究》。台北：人間。

陳光興（2001）〈為什麼大和解不／可能？〈多桑〉與〈香蕉天堂〉殖民／冷戰效應下省籍問題的情緒結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3。41-110頁。

陳佳宏（1998）《海外台獨運動史》。台北：前衛。

陳明通（1995）《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

陳柏壽（1984）《吸引華僑回國投資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華僑組碩士。

陳銘城（1992）《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

陳儒榮（2004）《FAPA與國會外交(1982-1995)》。台北：前衛。

陳樹強（1985）《國父革命宣傳與華僑革命行動》。台北：武陵。

陳靜瑜（2003）〈美國台灣移民的社會結構、適應與同析探(1980-2000)（上）〉。海華與東南亞研究3（3）。1-37頁。

——（2003）〈美國台灣移民的社會結構、適應與同析探(1980-2000)（下）〉。海華與東南亞研究3（4）。37-74頁。

陳鴻瑜（1991）〈中國分裂與東南亞華人社會〉。問題與研究30（1）。70-85頁。

陸以正（2002）《微臣無力可回天：陸以正的外交生涯》。台北：天下。

麥留芳（1984）〈華僑的重釋義：從經驗到概念〉。台灣大學法學院社會科學論叢

——（1985）《方言群的同：早期新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麥禮謙（1992）《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

彭懷恩（1997）《中華民國政府與政治》。台北：風雲論壇。

曾薰慧（2000）《台灣五〇年代國族想像中「共匪/匪諜」的建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華僑革命史編纂委員會（1981）《華僑革命史》。台北：中正。

黃建淳（1993）《晚清新馬華僑對國家同之研究：以賑捐 投資 封爵為例》。台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黃錦樹（1990）〈僑生稱謂之再探討：與曾慶權商〉。大馬青年8。16-21頁。

——（1998）《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

——（2002）〈漫遊者、象徵契約與卑賤物：論李永平的「海東春秋」〉。中外文學30（10）。24-41頁。

楊建成（1992）《華僑參政權之研究--中華民國僑居國外國民對祖國政治參與實例之統計分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5）〈中國國民黨海外黨務工作的理論與實踐(一九二四至一九九一)〉。海外華人研究（3）。31-50頁。

楊聰榮（1992）《文化建構與國民同：戰後台灣的中國化》。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7）〈文化同與文化資本：印度尼西亞華語文問題的新發展〉。發表於第五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台北。12月30日。

葉啓政（1995）《台灣社會的人文迷思》。台北：東大。

廖建裕（1998）〈東南亞華人：華僑？海外華人？或東南亞人？〉。東南亞季刊3（1）。20-39頁。

廖炳惠（1994）〈族群與民族主義〉。見施正峰編《台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

廖書賢（2003）〈陳水扁政府的僑務政策（2000 ~2002）〉。見張啓雄編，《近二十年來的海外華人》，63-80頁

管訓美（1982）《階段我國僑務政策之研究》。中興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趙林（1998）〈近十五（一九八四—一九九八）年來中華民國的華僑教育政策〉。發表於華僑教育學術研討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6月2、3日。

趙彥寧（2000）〈流放的政權與流亡的身體〉。見何春蕤編，《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台北：麥田。

——（1999）〈國族想像的權力邏輯—試論五〇年代流亡主體、公領域、與代性之間的可能關係〉。（36）。37-83頁。

——（2002）〈家國語言的公秘密：試論下階層中國流亡者自我敘事的物質性〉。（46）。46-85頁。

趙綺娜（1991）〈美國親國民政府國會議員對杜魯門政府中國政策影響之評估〉。歐美研究21（3）。83-129頁。

——（1995）〈美國對東南亞華人的政策（1953-1957）〉。發表於第二屆「冷戰時期之美國」學術研討會。三月十一日。

——（1999）〈外交部亞太司檔案的內容與利用：從一九五〇年代台灣對東南亞華僑（華人）政策談起〉。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7。128-136頁。

——（2001）〈從越南國籍法案之交涉看我國對越南華僑政策(1956-1957)〉。發表於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

——（2001）〈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一九五一至一九七零)〉。歐美研究31（1）。79-127頁。

劉進慶（1995）《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王宏仁、林繼文、李明譯。台北：人間。

劉興漢（1993）〈華僑教育與海外華人經濟發展之探討〉。發表於中華經濟研究院。台北。

劉繼宣和束世澂（1971）《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蔡先容（1992）《中山先生僑務思想與當今僑務政策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

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啓城（1977）《鼓勵華僑回國投資政策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

義皇正胤（1983）〈南洋華僑史略（上）〉。民報25。3986-4011頁。

———（1983）〈南洋華僑史略（下）〉。民報26。4087-4112頁。

顏國裕（1991）《我國僑務政策之研究—民國六十年以後之發展分析》。台北：

顏清滄（1982）《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李恩涵譯。台北：聯經。

寶文金（1996）〈五十年代台灣當局在印尼的僑務活動〉。八桂僑史29。

龔宜君（1998）《「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台北：稻香。

龔宜君（2002）〈跨國投資與族群關係：台商在馬六甲的形成與發展〉。見蕭新煌、王宏仁、龔宜君編《台商在東南亞：網絡、同與全球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

（二）英文文獻

Anderson, Benedict (1998) 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 in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dited by Benedict Anderson Pp.58-76. London: Verso.

Ang, Ien (2001)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Bary, Brett De and Victor, Nee (1976) The kuomintang in Chinatown. in *Counterpoint: Perspectives on Asian America*, edited by Emma Gee Pp.146-151.

Basch, Linda G., Schiller, Nina Glick and Szanton Blanc, Cristina (1994) *Nations unbound :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Langhorne, Pa.: Gordon and Breach.

Benton, Gregor (2003)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in Britain: A longer history. *Identities-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10(3) :347-375.

Boli, J. and Thomas, G. M. (1997) World culture in the world polity: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2) :171-190.

Bourdieu, Pierre (1994) Retinking the Sta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Bureaucratic Field. *Sociological Theory* 12(1) :1-18.

Brown, David (1994) *The stat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Brubaker, Rogers (1996) *Nationalism reframed :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 Persia Crawford (1970) *Chinese coolie emigration to countries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P. S. King & son, ltd.

Chang, Chak Yan (1981) Overseas chinese in China's Policy: A Case Study of Malaysia.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12 :283-334.

Chang, Su -Ya (1988) Pragmatism and Opportunism: Taiwan'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49-1952.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en, Chao -ju (2003) *Who Constitutes the Nation? En/gendering the Lagal Regulat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 Membership*. Paper presented at Reimagining Taiwan: Nation, Ethnicity, Narrativ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ational Library in Taiwan: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Chen, Jie (2002) Qiaowu: Kuomintang's historical cross as new Taiwan's asset. in *Foreign Policy of the New Taiwan: Pragmatic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Pp.174-222. Glos GL50 UK: Edward Elgar.

— — (2002) Human Dimensions of Taiwan— Southeast Asia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Century:*

an Asian perspective, edited by C.K. Ku Samuel Pp.83-124. Kaohsiung, Taiwa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en, Ta (1967) *Chinese Migr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 Taipei: Reprinted by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Chun, Allen (1995) An Oriental Orientalism: The paradox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Nationalist Taiwa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9(1) :27-56.

Connor, Walker (1972) Nation-building or nation-destroying? *World Politics* 24(3) :319-355.

— (1994) *Ethnonationalism :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nnor, Walker (1986) The Impact of Homelands upon Diasporas. in *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dited by Gabriel Sheffer Pp.16-46. London: Croom Helm.

Corrigan, Philip Richard D. and Sayer, Derek (1985) *The great arch : English state formation as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OX, UK ; New York, NY: Blackwell.

Duara, Prasenjit (1999)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Era of Nation-States: China, 1900-1945. in *Globalization and identity : dialectics of flow and closure*, edited by Birgit Meyer and Geschiere Peter Pp.647-670.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Duara, Prasenjit (1997) 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 in *Ungrounded empires :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edited by Aihwa Ong and Donald Macon Nonini Pp.39-60. New York: Routledge.

Esman, Milton J. (1986)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in *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dited by Gabriel Sheffer Pp.130-163. London: Croom Helm.

Fitzgerald, John (1995)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3 :75-104.

Fitzgerald, Stephen (1972)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 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cy, 1949-1970*. Cambridge Eng.: University Press.

Foner, Nancy (1997) What's New About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Immigrants Today 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Diaspora* 6(3) :355-368.

Foucault, Michel (1991) Governmentality. in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edited by Graham Burchell, Gordon Colin and Peter Miller Pp.87-104.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eeman, Gary P. (1995) Modes of Immigration Politics in Liberal Democratic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9(4) :881-902.

Haque, Shamsul M. (2003)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Managing Ethnic Tension in Malaysia.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7(3) :240-266.

Harrell, stevan (1999) The Role of the Reriphery i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Imagining China: regional division and national unity*, edited by Shu -min Huang and Cheng -kuang Hsu Pp.133-160. Nanka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Hughes, Christopher (1997)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 national identity and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Kaiser, Robert John (2002) Homeland Making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Ethnonationa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edited by Daniele Conversi London & New York: Routlege.

Kaplan, David E. (1992) *Fires of the Dragon: Politics, Murders, and the kuomintang*. New York: Atheneum.

Lai, Him Mark (1976) China Politics and the U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ounterpoint: Perspectives on Asian America*, edited by Emma Gee Pp.152-159. Los Angeles: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jhart, Arend (1969)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21(2) :207-225.

Lynch, Daniel (2002)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as socialization to global cultures. *Pacific Affairs* 75(4) :557-574.

Mahoney, James (2000)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29 :507-548.

Marilyn Williams, Tinsman (1983) China And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Columbia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 Education

McKay, James and Lewins, Frank (1978) Ethnicity and the ethnic group: a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reformula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4) :412-427.

McKeown, Adam (1999)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 1842 - 194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2) :306-337.

— — (2001) Ethnographies of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Diaspora* 10(3) :341-360.

Means, Gordon P. (1972) 'Special Rights' as a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Malaysia. *Comparative Politics* 5(1) :29-61.

Merquior, J. Gordon (1979) *The Veil and the Mask: Essays on Culture and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Meyer, J. W., Boli, J., Thomas, G. M. and Ramirez, F. O. (1997)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 :144-181.

Esman, Milton J. (1986)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in *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dited by Gabriel Sheffer Pp.130-163.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Ng, Wing Chung (1991) Taiwan's Overseas Chinese Policy From 1949 to the Early 1980s. in *East Asia inquiry : selected articles from the annual conferences of the Canadian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1988-1990*, edited by Larry N. Shyu, Min -sun Chen and Claude -Yves Charron Pp.265-286. Montreal: Canadian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Nonini, Donald Macon (1997) Shifting Identities, Positioned Imaginaries: Transnational Traversals and Reversals by Malaysian Chinese. in *Ungrounded empires :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edited by Aihwa

Ong and Donald Macon Nonini Pp.203-227.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Ostergaard-Nielsen, Eva (200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ending countrie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Houndmills [Engl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ierson, Paul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2) :251-267.

Robinson, William I. (1996a) *Promoting polyarchy: Globalization, US intervention, and hegemon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 (1996b) Globalization, the World System,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in U.S.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Society* 25(5) :615-665.

Rumbaut, Ruben G. (1994) Origin and Destinies: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World War II. *Sociological Forum* 9(4) :583-621.

Schiller, Nina Glick, Basch, Linda G. and Szanton Blanc, Cristina (1992)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 : race,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 New York, N.Y.: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Shain, Yossi (1994) Ethnic Diaspora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5

— — (1994) Marketing the Democratic Creed Abroad: US Diasporas in the Era of Multiculturalism. *Diaspora* 3

— — (1999) *Marketing the American Creed Abroad: Diasporas in the U.S. and their Homelands*. New York: Cambridge UP.

Shain, Yossi and Barth, Aharon (2003) Diaspora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 :449-479.

Shu, Wei -der (2002) Who Joined the Clandestin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Some 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the overseas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Memories of the Future*, edited by Stephane Corcuff Pp.47-69. Armonk, N.Y.: M.E. Sharpe.

- Smith, Robert C.** (2003a) Diasporic membership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insights from the Mexican, Italian and Polish cas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3) :724-759.
- — . (2003b) Migrant membership as an instituted process: Transnationalization, the state and the extra-territorial conduct of Mexica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2) :297-343.
- Stedman, Stephen John** (1993) The New Interventionists. *Foreign Affairs* 72(1) 12
- Suryadinata, Leo** (1985) *China And The Asean States: The Ethnic Chinese Dimensio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Tan, Eugene K.B.** (2001) From sojourners to citizens: managing the ethnic Chinese minority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6) :949-978.
- Tang, Xiaobing** (1996)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eng, Yen -Fen** (2002) From "us" to "them": Diasporic Linkages And Identity Politics.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9) :383-404.
- Wang, Gungwu** (1970)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The China Quarterly* 43 :1-30.
- — (1991)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 (2000) A Single Chinese Diaspora? in *Joining the Modern World: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 — (2001) Upgrading the Migrant: Neither Huaqiao nor Huaren. in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edited by Gungwu Wang Pp.143-164.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Wang, Horng Luen** (2000) Rethinking the global and the national - Reflections on national imaginations in Taiwa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7(4) :93-117.

— (2002) Mind the Gap: On Post-National Idea(l)s and the Nationalist Reality. *Social Analysis* 46(2) :139-147.

Wang, Ling -chi (1980) Post-war Development in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Papers from the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Pp.269-272. San Francisco: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San Francisco.

— (1991) 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Daedalus* 120(2) :181-206.

Wang, Rosey Ma (2003) Chinese Muslims in Malaysia: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Paper* 62

Williams, Lea E. (1966) *The Futur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McGraw-Hill.

Wimmer, Andreas and Glick Schiller, Nina (2002)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beyond: nation-state building, 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Global Networks* 2(4) :301-334.

Wu, David Yen-ho (1991)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Identities. *Daedalus* 120(2) :159-179.

Wu, Rwei -Ren (2002) Toward a Pragmatic Nationalism. in *Memories of the Future*, edited by Stephane Corcuff Pp.196-218. Armonk, N.Y.: M.E Sharpe.

Yang, Philip Q. (2000) The "Sojourner Hypothesis" Revisited. *Diaspora* 9(2) :235-258.

Yen, Ching -hwang (1995a) The Nanyang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Studies in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Ching -hwang Yen Pp.119-134.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 (1995b)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Studies in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Ching -hwang Yen Pp.119-134. Singapore: Time Academic Press.

— (1995c)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s: A Historical Study. in *Studies in Modern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Ching-hwang Yen Pp.135-156.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Zald, Meyer (1996) Culture, Ideology, and Strategic.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 edited by Dough McAdam, John McCarthy and Mayer Zald Pp.261-27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Žiž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中譯：季廣茂譯 (2002) 《意識型態的崇高客體》，北京：中央編譯。)

